



PROBE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探 索



ISSN 1007-5194
CN50-1019/D

2024. 1

哲学社会科学 双月刊
2024年1月

探
索

二〇二四年第一期

本期作者简介



冯颜利，湖南临湘人，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批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纪委书记、副所长，《世界哲学》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编辑部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公平正义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库评审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全国吴玉章哲学社会科学奖评审专家、国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教材评审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著作16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别委托项目、重点项目等8项，多次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马俊毅，宁夏吴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民族研究》编辑部编审、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研究主题包括国家建构、国家治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政治、共同体、身份政治、民族主义、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等。专著《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获第四届国家民委“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在《民族研究》《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贵州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思想战线》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



PROBE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C S S C I 来 源 期 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致作者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探 索

2024 年第 1 期 总第 235 期

2024 年 1 月 15 日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谢金峰

副主任：张 健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

方 旭 孙凌宇 张志勇 陈 剑
周学馨 侯晋雄 黄建跃 温丙存
谢来位 谢撼澜

总编辑：金华宝

副总编：王 慧

本期执行编辑：赵 超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0-1019/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7-5194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局 78-84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号信箱）

国外代号：BM4024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 011153

地 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160 号

邮 编：400041

电 话：023-68593010

投稿系统：<http://www.tszss.net> 或 <http://suta.cbpt.cnki.net>

微信平台：tansuoazhi

印 刷：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每册 15.00 元 半年价：45.00 元 / 全年价：90.00 元

目次 | CONTENTS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蕴 冯颜利 1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涵与实践特质 于安龙 13

政治学研究

- 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马俊毅, 杨一凡 27
- 百年变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 王伟, 刘泽锋 41
- 治理体系韧性: 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 杨睿智 53

政党治理

-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系统化运作及其提升策略 颜德如, 张爽 65
- 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三重逻辑 商滢 79

公共治理

- 美好生活: 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 基于成都市的经验观察 谢小芹 90

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唐任伍, 史晓雯 103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

——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陈 锋, 王泽林 115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方略

..... 张伟军, 蒋 锐 129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新探 赵建超 144

Contents

No.1 2024 (Serial No.235) (Bimonthly)

1.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ENG Yanli	1
2.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YU Anlong	13
3.Civilization Resilience, National Resil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MA Junyi, YANG Yifan	27
4.Research on the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Change on a Scale Unseen in a Century	WANG Wei, LIU Zefeng	41
5.Governance System Resilienc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National Governance	YANG Ruizhi	53
6.The Systematic Operation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of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of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YAN Deru, ZHANG Shuang	65
7.The Triple Logics of Perfecting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 Norm System in the New Era	SHANG Tian	79
8.A Better Life: The Practical Logic of Urban Digit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in Chengdu	XIE Xiaoqin	90
9.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Risk Avoid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ing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TANG Renwu, SHI Xiaowen	103
10.Technology Reshaping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and Digit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Taking “12345” Hotline Driving City Governance as an Example	CHEN Feng, WANG Zelin	115
11.Building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Logical Generation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the CPC's Cultur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Weijun, JIANG Rui	129
12.The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O Jianchao	144

引用格式:冯颜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蕴[J].探索,2024(1):1-12.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蕴

冯颜利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精华与实践总结,贯穿其中的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厚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其价值观、主体观、创新观、问题观、系统观和天下观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邃光辉。坚持人民至上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价值观,即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由人民评判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强调文化自信与文化建设实践相互影响的实践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积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瞄准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不断深化对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系统性策略。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进不同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了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世界大同观与天下观。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新华章的谱写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强国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001-12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1]。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2]。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这些内涵要义与价值意蕴,需要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3]。从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等方面深入思考与深刻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研究”(20AZD017),项目负责人:冯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六观’研究”(2023YZD045),项目负责人:冯颜利。

作者简介:冯颜利,男,博士,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坚持人民至上:把握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观

坚持人民至上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价值观。要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至上的鲜明价值观,就要深入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由人民评判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首先是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只有党的全面领导、坚强领导下的人民至上,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并由人民评判。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取得成功的十大经验的首要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保障人民至上的前提和关键,坚持人民至上首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因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三位一体”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党对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领导作用,党是进行文化强国建设的政治保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确保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5],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由人民评判,从而确保党的文化强国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造福人民、依靠人民。

为了人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坚持人民至上的目的要义。习近平明确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6],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4]。习近平关于“江山与人民”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根本问题^[7],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维度说明了坚持人民至上的深刻道理。因此,“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文化艺术工作者进行无愧于时代的创作路径^[8]。新时代文化艺术工作者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3],坚持“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9]。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是文艺创作,无论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还是现代文明创新,都必须坚持反映人民需求、立足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唯有如此才不偏离文化强国建设的方向。

依靠人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坚持人民至上的主体性要义。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实践是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创作创新和文明创造性发展的不竭源泉。只有“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8],才能“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才能使理论“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3]。因此,“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10]。因此,文化艺术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强国建设立场观点和方法,彰显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人民主体性要义。

由人民评判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坚持人民至上的共享要求与价值要义。人民是评价文化价值的最公正裁判,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8]。习近平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11]满足人民的需求、增强精神力量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人民的信念、奋斗、诉求、冷暖、幸福、喜怒哀乐、美好生活憧憬,既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又是以人民的满足程度为评判标准的。坚持文化强国建设评判的人民性价值观,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文化自信:把握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观

坚持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突出主体性和主体观的精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来说,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必须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以文化上的自信自立、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保障和支撑现代化建设。”^[12]只有自信,才能自觉自强。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才能有坚定“走自己的路”的底气。坚持文化自信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13]。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观,独立自主探索开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道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经验,凝练中国理论,将其上升为主体自信,回到并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的实践中,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唯物史观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与哲学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的实事求是方法,又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把中国特殊国情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认识出发点,又作为实践改造的对象;既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国情党情民情的深刻变化,又着眼解决植根国情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要求的正确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从世界发展进步、民族复兴、文明建设、现代化、中国特色等维度分析中国国情的历史发展、现实特征、演变趋势,明晰不同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把握新时代应对世界大变局的主体优势,作出适合国情的应变决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自觉自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从客观国情出发,形成适应国情的文化强国建设方案,又用文化强国建设方案促进客观国情向好的方面不断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新的国情出发,形成新的国情认识并转化为新的国情现实,不断将适应国情的发展实践转化为文化自信自觉自强,将文化自信自觉自强建立在科学认识国情、改造国情的科学实践观上和文化生命体上。这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主体性的文化自信与国情相互影响的实践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坚持立足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实践为直接来源的主体性与主体观,而且坚持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发展的文明史,坚持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有机统一。正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明实践,塑造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富民厚生、义利兼

顾”“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从本质上说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实践创造沃土中。正是世代相传的凸显主体性的文化自信,才不断创造出中华民族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文化自信的目的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篇章。要谱写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篇章,既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中的创新发展,又要强调不断对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的科学总结。这就要求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继承发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面向未来的文化哲学理论和文化强国建设制度创新。习近平强调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14],其提出有利于在世界文明版图中找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方位,并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15]。因此,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要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不断进行理论总结,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不断强化文化自信自觉自强。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自信,突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性。主体性是文化立得住、行得远、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的本质属性。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植根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主体的独特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经验结晶,是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充分体现了自我建设、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实践主体性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既是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主体,又从根本上体现了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特征。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坚持文化自信突出文化的主体性,本质上是坚持强国建设实践的主体性,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主体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的主体性,彰显了中华文明在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鲜明文化特性,又进一步奠定了文化自信的主体性实践基础。

三、坚持守正创新:把握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观

习近平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3]对文化强国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文化建设的自我、不迷失文化建设的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文化时代、引领文化时代。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观与核心要义。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守正创新彰显了文化强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的辩证否定

观。这是一种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根本制度之正,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之正。这就必然要求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篇章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文化制度。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的根本制度就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和制度保障。

习近平文化思想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之正。习近平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16],又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只有赓续历史文脉,才能在新时代谱写华章。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理想信念、治理思想、优秀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智慧、思维方法、交往之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继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基因,归纳总结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只有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优秀元素,才能延续转化历史文脉,达到守正创新的目的。只有坚持“古为今用”“辩证取舍”“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的辩证方法,才能真正守正创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成果,也才能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文化思想守“两个结合”之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3]。“两个结合”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最大法宝。习近平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才有可能结合;“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相互成就是“化学反应”,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强调“两个结合”具有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积极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与策略。在文化强国建设战略上,“两个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之新,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局面。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思路、话语、机制与形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时,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与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在夯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同时,促进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和融合。在文化强国建设策略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基于实践基础进行理论创新的文化强国建设思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经验,把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实践。

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文化强国建设话语。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将中华文明传统话语创新

发展为现代话语。在关于文化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创新发展为“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创新发展为“人民至上”“以德治国”,将“大一统”创新发展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将“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创新发展为“锤炼党性”“责任担当”,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创新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知之为知之”“格物致知”创新发展为“实事求是”“实干兴邦”等,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新话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创新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话语体系,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文化强国建设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13],创新向内凝聚机制,坚持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各民族文化一体性,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的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全民族坚定不移的共同信念。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化解冲突”“凝聚共识”的新机制,坚持构建56个民族文化差异与共同体辩证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在中华文化“根”和“魂”的基石上,推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的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夯实民族自觉融合的精神文化家园。

四、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导向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6]。突出的问题导向、强烈的问题意识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重要的内生因素,也是其鲜明的理论特质^[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起点与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起点与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瞄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充分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破解难题、解决问题,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的发展导向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为“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18]和文化教条主义,坚持文化强国建设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直面临着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的对立问题。厚今薄古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文化,是时代发展的沉重包袱,主张进行新的文化重建。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发展了“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等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等政治智慧,创新发展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等中华文化大一统传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定了丰富而宝贵的传统文化基础。厚古薄今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精华,应全盘继承。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辩证扬弃观,要求科学对待,反对全盘照搬,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古为今用、鉴别性对待,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并为我所用。扬弃就是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对文化建设的侵害,坚持用大历史观、唯物史观看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坚持将唯物辩证的方法作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方法。

针对不时出现的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加强党的理论教育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就需要重点加以回答”,需要“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19]327}。事实上并不存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针对“宪政民主”的错误思潮,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既不同于西方宪法,也不同于近代以来我国曾经出现的旧宪法”^{[21]21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21]229}。“新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之所以是错误思潮,是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集体主义、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既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对这些错误思潮予以批判,也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针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到位的“三化”“三失”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习近平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问题,以及“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具体问题^[6],并指出这种“三化”“三失”问题是长期以来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落实不到位所造成的,产生的危害极大,必须高度重视予以解决。有效解决这种“三化”“三失”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2]153}。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维度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策略,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层面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合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从而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23]。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自信自觉自强,注重文化强国建设的形式创新、内容创新与目标导向的有机统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正是这种自觉形式筑牢了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的认识论基础,强化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强国建设的“第二个结合”形式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有机“结合”、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3]。“两个结合”创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容,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有机统一的现代文明综合创新形态,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创新发展。

五、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观

“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3]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注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全局性、整体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和新政策。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其中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最重要思想和总思想。同时,

习近平文化思想又包含着一系列的文化强国建设的具体思想,表现为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教育、意识形态、“两个结合”等诸多方面的重要论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既有战略机遇又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围绕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使命新任务,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思想,从整体上谋划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系列新观点。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三个事关”观点强调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根本制度”观点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领导权”观点突出了党在领导文化工作中的核心作用。习近平提出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观点坚持文化传承发展的辩证否定,“赓续历史文脉”的观点指出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3]的观点深刻把握了“结合”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定文化自信”的观点夯实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根基和底气。习近平正是坚持系统观念,提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系列新观点,形成了文化强国建设的观念系统,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系列新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论断的提出,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新目标与新发展战略的提出提供了根本依据与基本遵循。习近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的新论断要求文化艺术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坚定“四个自信”为灵魂,“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4]的新论断指明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5]的新论断强化了“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旧邦新命”“重焕荣光”的新论断坚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习近平关于“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以及新时代文化战略、文化发展、网络强国、教育强国、民族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体化的新论断体系,从整体上揭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规律与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系列新政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着力点,形成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政策系统,并为系列政策出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系统政策出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文化政策为轴心,《“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形成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政策体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政策推进了文化强国建设政策的系统化,进而为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六、坚持胸怀天下：把握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天下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进不同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中华民族致力于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世界大同观与天下观。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提倡的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强调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携手共建人类美好家园^[26]。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全球视野、世界情怀，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秉持全球不同文化相互包容中推动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海纳百川、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展现了开放包容的天下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27]284-285}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秉持开放包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外来文化本土化，对内提升民族文化凝聚力，对外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正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才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3]。习近平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和“秉持开放包容”的气魄展现，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使人类文明向着进步的一面不断发展^[28]。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天下观。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各民族创造的各具特点的文明形态，以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给予尊重，并强调交流超越隔阂、互鉴超越冲突、共存超越优越，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交流超越隔阂”主张当今世界文明发展不走刻板、封闭的老路，而要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新路，打破阻碍人类文明交流交往的精神隔阂，建立各种文明和谐共存的世界大同文化环境。“互鉴超越冲突”主张人类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纠缠，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抗，“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29]。“共存超越优越”主张反对自认文明优越而否定他国文明的观念，坚持国与国相处需要平等相待、互尊互信，主张不同文化和谐共处、互学互鉴，倡导文明对话、求同存异。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30]的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促进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进步，推动了世界和平发展，为进一步开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征程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31]。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局观和天下观。习近平在“全球文明倡议”中站在全世界人民的立场，以全球视角运用最大公约数的方法，构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运用最大公约数凝练全人类共同价值,认为只有找到全人类共同价值认同的聚焦点——最大公约数,才能形成全人类认同的共同价值;只有找到不同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共生共享共担责任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才能“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32],从而共同治理全球事务、推进世界和平发展。“最大公约数”的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时代需要的重要体现,揭示了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国家相互依存、命运相连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规律,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鲜明特点,是凝练多元文明追寻共同价值、世界各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论。

七、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原则,坚持文化强国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由人民评判的人民至上理念,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石,即将人民至上的唯物史观及历史方法一以贯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从根本上保障了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的人民至上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国情实际出发,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实践,强化坚定文化自信的主体性和文化自信自觉自强,夯实了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不仅彰显了文化主体性,而且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巩固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不断分析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回应文化强国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守正创新的策略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守“根本制度”“两个结合”“主体性”之正,创思路、话语、机制、形式之新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而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思想理论武器。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由一系列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体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系统性、全面性、整体性,也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把握和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的系统观。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奠定了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华章的哲学基础,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也为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
- [2] 姜汇泳,王旭东.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进路[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8-14.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 [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
- [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
- [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
- [7] 何锡辉. 江山与人民: 习近平关于人心向背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J]. 探索, 2021(4): 14-25.
- [8]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0-15.
- [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 人民日报, 2014-01-01.
- [10] 习近平.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J]. 求是, 2019(8): 4-8.
- [11] 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23.
- [1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会. 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N]. 人民日报, 2024-01-11.
- [1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4-11.
- [14]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23-34.
- [15] 李包庚.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逻辑[J]. 探索, 2023(5): 163-176.
- [16] 习近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4-03-28.
- [17] 关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问题”的科学理解和求解[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1-12.
- [18]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1(7): 4-17.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20]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9-29.
- [21]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23] 蒋英州, 刘芳.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逻辑[J]. 政治学研究, 2023(2): 61-73.
- [24]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03-19.
- [25]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1-08-29.
- [26] 吴凯. 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J]. 探索, 2023(4): 1-14.
- [27] 列宁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8] 辛向阳. 科学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36-38.
- [29]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17-12-02.
- [30]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3-16.
- [31] 谢小飞, 吴家华.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意蕴[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9-26.

[32]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10-26.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ENG Yanli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practical summary of the CPC's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build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 standpoints, views and method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self-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problem-oriented,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that run through it fully demonstrate the profound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heritag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ts conceptions of value, subjectivity, innovation, problem, system and worldview shine with the profound brilliance of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mong them, adhering 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 demonstrates the distinctive valu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hat is,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standpoint, viewpoint and method of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power for the people, relying on the people, sharing with the people, and being judged by the people. Adhering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hich emphasizes the practical dialectics and scientific epistemology of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Upholding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is the core ess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hich profoundly reveals the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s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dheres to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ims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China, the world, the people, and the time in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power, and gives systematic advice in developing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rity.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sists on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learns from and absorbs all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a broad mind that embraces all rivers, promote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demonstrates the worldview of great unity and worldview that creates a better future for mankind.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have laid a soli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developing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provided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for the CPC to better shoulder its new cultural mission, and provided a new guiding ideology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two combinations",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developing a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责任编辑: 牟 怡 蒋英州

引用格式:于安龙.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涵与实践特质[J].探索,2024(1):13-26.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涵与实践特质

于安龙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鲜明的实践特质。从其理论魂脉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从其理论根脉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滋养,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弘扬,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党的百年历史发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植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承继,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拓展与文化发展战略的递升。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远,蕴含和体现着“危”与“机”统筹把握、“体”与“用”有机贯通、“党”与“群”协同联动、“一”与“多”兼顾并举、“中”与“外”交流互鉴的实践特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文化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013-14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从其思想内核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重要思想之间根脉相通、枝叶相连,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有机一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孕育萌发、不断发展、日益深化的过程,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和经验。在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全面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以及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成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其更加科学化、体系化、学理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后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重点。以明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标志和界线,相关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明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扶贫、文化安全、文化育人等重要论述为题,或聚焦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或探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文化基因、文化根基等。这一阶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2BDJ010),项目负责人:于安龙。

作者简介:于安龙,男,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关于习近平文化观、习近平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初步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如认为其包含六大内容、六条主线,且它们共同支撑起了习近平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整个理论体系的立体结构^[1]。在明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后,学术界围绕这一重要思想丰富内涵、生成逻辑、内容体系、鲜明特征、时代价值等进行了研究。从整体来看,前一阶段的研究主题明确、内容丰富,为后一阶段奠定了研究基础,而后一阶段研究则是前一阶段的拓展和深化,二者之间构成了不可分割、前后递进的密切关系。从研究视角来说,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回溯式、功能共生式研究,还是系统阐述式、中外比较式研究等,都各有所成、各具特色。本文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动几种研究视角的集成与融合,以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性研究。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魂脉

科学性是思想理论的本质特性,也是其形成发展的根本所系、灵魂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表现为思想内容的客观真理性和逻辑形式的严密性等方面,归根到底来说,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理论观点,还是在世界观、方法论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是魂脉相连、大道相通的,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一) 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魂脉”主要是指灵魂和核心,在事物发展中起着统摄、蕴涵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魂脉”表现在它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及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守住“魂”、把好“脉”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文化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文化问题时,多数情况下通过精神、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哲学等概念术语来表达,以此阐释文化的内涵、本质与作用等。他们认为,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的形成发展受到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制约,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虽然文化是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文化对物质生产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者,“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¹¹。尤其是先进文化和科学理论,能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引领、激励、熏陶和教化等积极作用,从而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和转折,无不是以文化的变革和思想的启蒙为先导的;人类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也是以文化发展、思想进步为基础和标识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归宿。正是基于文化影响的广泛性、深远性和文化作用的极端重要性、不可替代性,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¹²⁰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及其负面影响予以深刻剖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就打破资本主义的精神枷锁、推动人们的精神解放、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等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建设性的构想。列宁也对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积极探索。这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5]¹⁶⁴。如在文化内在本质上,强调其是人类劳动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文化基本特征上,认为其具有阶级性、继承性、民族性等;在文化功能作用上,强调其具有认知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等;在文化运行规律上,认为其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它们;在文化立场上,强调人民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力量,要坚持人民立场等。总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之基、精神之源,其中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无论是在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在理论旨趣、价值指向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内在一致的;无论是在文化属性、文化价值,还是在文化地位、文化功能等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髓。

(二) 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并非一成不变、自动激活的。只有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才能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虽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但在中国文化发展实践中总会遇到各种新问题、新挑战,需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予以分析和解决。在此过程中,科学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及时总结文化发展经验,必然会形成一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新的东西”,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构成要素。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重要产物,其生命力也在于继续推进“两个结合”。“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6]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困境下传入中国的,百年来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两个结合”。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得到了不断证明和持续彰显。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内容,而且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实际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内在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发展,而且发展是主要的和主导的方面。”^[7]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强调精神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肯定文化的阶级属性,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继承无产阶级文化的党性原则,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习近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发展为了人民,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其中,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的重要指示,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而且明确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任务目标和着力点。这些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而形成的创新性新认识、新观

点,是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的内在奥秘。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特质的基本要素和内在力量,是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纽带和桥梁。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在传承、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中承载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文化因子,“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8]。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了民族文化基因,赓续了民族文化血脉,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滋养

“根脉”主要是指思想文化的根基与血脉,亦即文化发展的历史根源、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9]342}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既有其特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也有其文化逻辑,这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底蕴、文化根脉等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内在的民族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和力量,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情感认同、风俗习惯等,内蕴着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价值导向和思想品格,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鲜明特点,塑造了中国人内在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烙印在民族心理、彰显在民族行为之中,以一种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的力量影响着整个民族及其个体,使其深受浸染和熏陶。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进和升华中,蕴含了诸多独具一格的文化思想、构造出了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凝结出了丰厚饱满的文化元素,这些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精神源泉和历史资源。如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崇德贵民与孝亲尊长、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贵和持中等,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赋予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特有的历史厚重感和恢宏的历史纵深感。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从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精华和文化汁液,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9]82}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地包含着道德文化、精神文化、廉政文化、伦理文化等方面内容,涉及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等诸多环节,无论从哪一方面、哪一环节来说,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滋养和基因传承,如在道德文化建设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理念,包括“为政以德”、“兼爱”之德、“仁爱”之德以及传统的修身立德思想等。这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导入了文化基因、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弘扬

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传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塑造民族文化性格的决定性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蕴含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而使其内蕴着鲜明的民族性;另一方面,文化基因总是与一定的实践活动和时代条件相结合,从而

彰显出一定的与时俱进性、动态发展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民族文化基因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中世代相继、弦歌不辍,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勾勒了民族的文化脉络。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就在于它对民族文化基因“因循”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结合时代条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了民族文化基因新的生机活力,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弘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9]12} 这实际上明确揭示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立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应该在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与时俱进的补充、拓展和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方面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其中“精华”与“糟粕”混杂、积极与消极并存。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复制,而应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做到辩证取舍、去粗取精。即不仅对其中陈旧过时、不合时宜的东西予以舍弃,也对其中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东西充分挖掘、予以激活,以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0]164}。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了民族文化基因,赓续了中华历史文脉,从中萃取思想精华、吸取有益成分,从而拓新了民族文化空间,激活了民族文化生命,使其展现出了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思想感染力和时代感召力。坚持在守正与创新、继承与弘扬的有机统一中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坚实支撑、深厚滋养,又富有强大生命力、感召力的根本所在。

(三) 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不仅体现在民族维度上,更体现在世界维度上。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世界文明格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性、资源丰富性和博大精深性而享誉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具有深刻的导引性和启示性,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9]2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拓展提供了历史积淀、文化基础,蕴含着“中国之治”的文明元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国特色”的根源就在于“文化特色”,“文化特色”是“中国特色”的重要支撑。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和合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问题的重要启示。它们既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也内含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对各种现代危机、破解人类发展困局、回应“世界之问”的卓越智慧。充分凝练和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使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多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宝贵资源,更是一种强大力量。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

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凸显。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9]90}正因为如此,需要把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使其在统一人民意志、培育民族精神、实现思想共振、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世界文化相互激荡、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的深厚沃土。事实上,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本民族独特文明与世界多样文明之间的关系,相互尊重、交流互鉴,“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9]69},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解放和价值引领作用,不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辐射力、竞争力。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担当,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贡献,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也赋予了其更加高远的境界、更加宏阔的格局。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理论与实践基础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文化工作的延续和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理论和文化建设实践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辉映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昭示着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只有坚持大历史观,从百年党史中梳理发展脉络、明晰历史逻辑,才能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来龙去脉。

(一)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承继

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为什么进行文化建设、如何推进文化建设等,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663},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857},强调文艺发展要坚持正确方向,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建设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文化的继承、借鉴和发展问题,指出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1]663}。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3]208}。不仅如此,邓小平明确地把精神文明从内容上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既突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又指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具體路径。此后,江泽民、胡锦涛等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建设方略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索,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建设思想。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先后经历了文化翻身、文化改造、文化反思和文化自信四个发展阶段”^[14],其演进脉络清晰、内涵愈益充实,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文化发展的卓越智慧。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文化建设思想具有实践性、科学性、时代性、人民性等鲜明特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智慧源泉,且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以服务人民为价值理念,以立足国情为基本依据,以尊重规律为鲜明特点,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基本导向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战略框架。这些也深深融入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and 实践基础,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如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功能作用,党百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喉舌论”“武器论”“阵地论”“生命论”等不同认识和定位,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5],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要意义;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培育和创造出的伟大精神形态,习近平不仅丰富了其精神内涵,拓新了其时代价值,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源,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力量。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探索与实践基础上的,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最新理论结晶。

(二)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的拓展

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而走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归根到底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决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不同,决定了各国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不尽相同、各具特色的。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生成和发展来看,它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懈探索紧密相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它与政治发展道路、社会建设道路等是相互支撑、相互辉映的,并决定着文化发展方向的确立、文化纲领和文化政策的制定等,具有根基性、支撑性的重要作用。文化发展道路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推动文化发展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者和拓新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6]⁴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特点,即它是具有深厚文化根基、悠久文明积淀的文化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文化发展道路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者、拓展者和引领者,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最大保障。

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特点和演进逻辑,需要充分把握文化的独特属性,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又是在社会整体发展道路中运行演进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契合、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刻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总结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文

化发展的新观点、新认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思想起点、逻辑起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以什么为指导、围绕什么任务、沿着什么方向、按照什么要求、达到什么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文化领域中坚持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属性特征、目标方向、战略规划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正确方向,提供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结晶,是不断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重要成果。

(三)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战略的递升

在不同语境下,文化发展战略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多数情况下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文化的基本指导思想、目标、方法和策略等,反映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功能、作用的认识和定位。文化发展战略体现着“战略”的一般要素特征,即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政策性、可持续性等鲜明特点。制定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文化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到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再到习近平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战略在继承与发展中日益充实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战略,既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与其他发展战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统一。文化发展战略是根据国家社会发展情况和国际环境,对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作的长远的、全局性的系统谋划,深刻体现着文化领域的战略目标、方向和任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建国”,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目标。

如果说党的十八大之前是文化强国战略的探索期、孕育期,那么党的十八大之后就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升级期、深化期。尤其是习近平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学回答了文化建设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承什么、怎样传承、谁来传承,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如进一步巩固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将文化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明确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即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出发点,即要增强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动力支撑;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支撑点,即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即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应表现在文化领域的文化复兴、文化强国”^[17]。总之,习近平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在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特质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从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定位、谋划和布局文化建设,统筹把

握文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应然性,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事关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具有鲜明科学性、引领性、人民性、开放性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特定的理论渊源、文化底蕴、思想根基和实践依据,同时又坚持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质。

(一)文化发展的“危”与“机”统筹把握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文化竞争尤为如此。在全球化浪潮和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成为常态”^{[18]215},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一个无时不存在竞争和较量的特殊战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分歧,中国已成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对象和目标之一,中国的文化安全由此受到严重威胁。在西方社会思潮影响下,国内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等错误论调不时沉渣泛起,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依然暗流涌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9]221}。同时,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多样多变,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精神懈怠、消极颓废等现象较为突出。因此,有效应对西方文化渗透,维护我国文化主权和安全,就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而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需求更为强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9]104}。当前,中国的文化发展既面临着各种新挑战、新难题,也存在着各种新机遇、新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关照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文化环境、严峻的文化形势,也认识到了文化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难得机遇等。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15]。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现实所需,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的文化机遇之所在、使命之所在。新时代无论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都是重要因素、重要支点,具有铸魂、塑形、赋能的强大力量和功能。这也意味着,当前进行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发展有着更为坚实的基础、更为迫切的需求和更为充沛的动力。

(二)文化品格的“体”与“用”有机贯通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各有其丰富内涵和独特意蕴,但总体而言是有机互动、内在贯通的辩证统一关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新时代的‘明体达用之学’,它赋予‘体’‘用’概念新的内涵”^[19]。这里的“体”主要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性,即文化建设的本质根据、根本原则以及相关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用”主要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即文化建设的方法手段、实践路径以及文化工作的具体部署要求。这种体用贯通的文化品格,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凝结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智慧,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即作为“两个结合”的重要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实践性,是本体论与方法论、认识论与实践论的高度统一,是经义与治事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体”与“用”并非泾渭分明、疏离对立的,而是相互贯通、内在一体的。新时代以来,围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两大逻辑主线,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文化建设中实现了理论新突破、实践新升华,因此这几年“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

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体”是科学的、厚实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植根沃土,既内蕴着强大的思想伟力,又具有深厚的文化之源。“明体”实际上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文化使命“是什么”的明确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用”是鲜明的、明晰的,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世品格,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怎么办”的清晰回答。“达用”,主要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具体谋划、战略部署和统筹安排等。质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突出的理论创新,又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强烈的致用品性,“破解‘体用二分’的窠臼,极大促进了新时代文化建设”^[21]。从“明体”角度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之道、文化建设规律;从“达用”角度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6]。实现二者的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就是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以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真谛,实现“明体”赋能“达用”、“达用”反馈“明体”。

(三) 文化建设的“党”与“群”协同联动

高度重视和不断巩固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和重要内容。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舆论的主导权,它决定和影响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功能的体现等。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以更好地为文化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价值引领和组织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和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在文化领域坚持党的领导,是由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的生成发展需要一定领导力量的组织、引领和推动。作为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从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出发,把握文化建设方向、制定文化建设方略、确立文化建设目标,如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路径是推进“两个结合”,以及“‘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6]等,在文化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文化领导能力、文化治理能力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并非先天给定的,而是需要在实践中去争取和证明,同时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基础上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9]116} 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文化发展的受益群体。这就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各种形式调动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群众基础、凝聚磅礴群众力量;在文化发展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文化发

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导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总之,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固定的、孤立的,而是以在文化领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凝聚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为依托的。注重党群联动、党群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和有力法宝,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文化理路的“一”与“多”兼顾并举

正确对待“一”与“多”的关系,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念和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强调指导思想的“守一”“执一”,又兼顾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多样,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具体而言,一是一元引领、多样并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文化领域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是关系文化发展全局的根本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9]242}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强大感召力所决定的。而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又决定了社会思想观念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9]52}。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文化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实现“一”与“多”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排斥和否定社会思想文化多样化,相反,社会思想文化多样化是以指导思想一元化为前提和基础的。推动二者的相互影响、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

二是一个目标、多维构成。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来说,这一根本目标本身具有整体性、复合性,内在地包含着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的强国目标,如“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22]24}。文化强国从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同时又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能为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支撑、引领和激励作用。文化强国建设的顺利推进,又能为其他方面的强国建设产生一定的带动和依托作用,进而以其强大合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所以,既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方向、目标等,又要协同推进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强国建设,使之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发展。而从次级层面来说,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强国也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概念,内在地包含着多元要素、多维向度,是由出版强国、网络强国、艺术强国、学习强国、学术强国等共同构成的,涉及意识形态、新闻宣传、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涵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网络文化、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9]228}。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多措并举、多维推进、多向发力,如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等。总之,“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是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一条逻辑主线,其实质是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五)文明交往的“中”与“外”交流互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不仅在于它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建设

目标等,更体现在其更高的文化追求、文化格局和文化境界上。一种文化、文明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固然取决于“内”,但也关乎于“外”,即以什么方式和态度对待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决定了一种文化、一种文明能否持久存在发展。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深刻揭示和回答了不同文化相处之道、不同文明交往之道。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是因为不同地域、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语言、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等,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图景。文化多样性是指人类各群体和社会因价值观不同和生活方式不同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式,这些形式在各自群体和社会内部一直延续和不断传承。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和核心是文化差异性、异质性,但如何认识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呢?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宣扬“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普世文明论”“文明冲突论”等,其实质是以“西方中心论”为逻辑基础和前提,以西方文化、西方文明为标准 and 模板。这些观点反映了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对抗性、竞争性思维模式以及“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也曾出现过碰撞和冲突,但这并非文明发展的常态,相反,其主流和本质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与融合。世界上的文明具有多样性,多元文明之间可以并存共生、交融互通。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高远的站位、宽广的视野、宏阔的襟怀,深刻阐述了文明进步、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趋势,形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平等相待、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文明观,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6]所以,正确对待自身文化与外部文化的关系,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和优点,尊重不同文化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现实形貌,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成果的有益成分。“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23]82}习近平文化思想摒弃了西方差序性文明理念,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6]59}。促进万物共生、和而不同、包容并存的文明之间交流交融,在互鉴互促中实现共同发展,在兼容并包中丰富文明多元图景,“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治愈各种‘文明病’开出了‘中国处方’”^[24],也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之道,从而赋予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的道义力量。

五、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其体系结构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根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鲜明主题,“两个结合”是实现路径,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目标指引,它们之间相互融通、有机互动、彼此支撑,构成了一个思想共同体、逻辑有机体。其中,文化自信是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核所在^[25],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底色和内在要义,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和实践导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是接近于实现,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就越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6]349}在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地位重要、作用独特。因

为,无论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还是理论自信,都蕴含着文化的要素,也都离不开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力量的涵养、熏陶和推动。

文化自信不仅是面向“本来”的,更是面向“未来”的;不仅是面向民族的,更是面向世界的。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和比较优势的日益彰显,为强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支撑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滋养。“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2]无论是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还是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都不能离开魂脉和根脉这两个基本维度。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之“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中华文化品格,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深厚滋养。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指南和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 [1] 朱鸿亮,鲁宽民. 总体把握习近平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六大内容和六条主线[J]. 科学社会主义,2020(5):52-58.
- [2]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 求是,2023(20):4-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6]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7] 罗文东,李龙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贡献和指导意义[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6):4-15.
- [8] 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N]. 人民日报,2022-10-19.
- [9]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4] 张国祚,李哲.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变”与“不变”[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9.
- [15]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2023-10-09.
- [1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7] 王双印.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大历史观逻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5-13.
- [18]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19] 荣枢.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的辩证思维方法[J]. 学习与实践,2023(12):14-22.
- [20] 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9-23.
- [21] 陈绍辉,孙熙国.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架构、实践方略与重大意义[J]. 河南社会科学,2023(12):1-8.

- [2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4] 仰义方,武亿.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及实践路向[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3(3):8-15.
- [25] 曹劲松. 文化自信: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核[J]. 南京社会科学,2023(11):1-9.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YU Anlo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ch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distinctiv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soul,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dheres to and inherits Marxist cultural thought, but also innovates and develops Marxist cultural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theoretical root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not only originates from the nourish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carries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tinuously, highlight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roote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inherit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ought of the Party, expand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Party and upgrade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in meaning, which contains and reflects som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crisis” and the “opportunity”,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function”, the synergy of the “Party” and the “group”,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he “one” and the “many”, and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foreign”. As the latest cultural theory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with thriv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 building of modern civiliz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Marxis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owerful country with thriving culture

责任编辑:陈卓 蒋英州

引用格式:马俊毅,杨一凡.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探索,2024(1):27-40.

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马俊毅¹,杨一凡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关键词: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027-14

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在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将迎来更多的、更复杂的议题与挑战。如何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1]45}。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8}。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3]同时,他充分论述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五大重要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4]。笔者以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创造性论断揭示了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指明了韧性中国建设的方向。这是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使命下,尤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更快发展的深水区、攻坚区的阶段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政治命题。中国只有在充分坚定文化自信、文明自信,汲取五千年文明智慧的基础上传承文明韧性、加强国家韧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与改进民族工作研究”(23AMZ001),项目负责人:马俊毅。

作者简介:马俊毅,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杨一凡,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更好地践行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中华文明传统中的“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形成。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的韧性是中国政治发展、国家建设的文明基因与深厚政治哲学底蕴。中国国家建构的逻辑包含着“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五维逻辑^[5],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构成与深化发展包含着与以上五维逻辑相关的“五个认同”的实践过程。因此,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文明韧性,如以“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结合的整体文明观整合民族观,深植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依托于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6]之多元一体韧性,还需在现代国家阶段进一步提升。这种提升体现在国家与民族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等方面贯彻“真正的共同体”的韧性理念,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理念。尤其是在新时代要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奠定国家长治久安、各民族平等团结、能够化解风险挑战的具有韧性的共同体基底。新时代,需要继续以韧性的理念整合、贯通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以及现代中国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的既有经验,提升中国的韧性理论自觉,有利于不断运用中国特色的韧性治理方法论应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所面临的重要议题,这是当下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理论与现实路径。

一、韧性的概念及国家韧性理论研究

韧性概念及理论的普遍运用说明了其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和实用性。在厘清韧性概念的内涵以及回顾韧性理论运用过程的基础上,需要明晰国家韧性、文明韧性、共同体韧性等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进而为本文的分析提供有效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

(一) 韧性、国家韧性与国家建设

“韧性”概念以弹回(原来状态)为原初含义,基于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视角^①,韧性被界定为系统面临外来冲击时吸收干扰和重组以保持功能、结构、性质和反馈基本不变的能力^[7]。韧性概念与韧性治理理论的提出及其运用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即从基于生态系统的稳定而提出,扩展至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涉及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各个领域。韧性概念及理论的普遍运用说明了其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和实用性,这是因为韧性概念的特性实际上是与其反面“脆性”相关。与韧性相对的“脆性”,既包括系统的软弱,也包括系统“刚则易折”缺乏弹性,二者共同导致韧性不足。与“韧性”相关的因素包括系统性、抗风险性、适应性、包容性、稳定性、灵活性,这些因素越来越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有效治理的运行环境,以及效能的评价要素。因而这一概念和相关理论也开始运用于现代国家建设及国家治理。

国家韧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建设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两个层面。有不少学者

^① 韧性治理源自“韧性”这一概念,在生态学领域的研究中“韧性”概念由加拿大生态学家克劳福德·霍林 1973 年提出,并应用于生态系统稳定的研究中,描述的是系统内关系得以持续的能力。参见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1): 1-23.

对国家建设的韧性展开研究,提出为什么有的国家长盛不衰,有的国家却易于崩溃,这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治理、社会治理、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韧性。比如,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反复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经济体现出强劲的韧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韧性也必然包括民族事务治理的平等、稳定与民族关系的和谐,以及团结各个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安全,以及防范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等。实际上,能够避免系统脆性、能够通过自身建设与治理减少外力对系统的冲击与破坏,是由各种复杂系统交叠形成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必备属性。“国家韧性就是避免国家崩解、保证国家秩序、维护国家体制既沿着现代主流政治轨道运行又避免完全疏离既定政治轨道,从而展现国家弹性,应对挑战、维护国家既定结构免于崩溃的特性”“国家韧性是一个可以用于诊断任何国家究竟是否具备抗压能力缓释脆性、保持国家自我维系和发展的弹性普适概念”^[8]。

(二) 韧性中国建设必须结合中华文明韧性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也需要不断完备与提升,韧性中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理论命题^[9-10]。在近年来的理论发展中,中国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理论,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其中已经包含了很多“韧性中国”的元素。韧性中国建设所包括的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民族建设等多个方面都要立足于中华文明智慧,如此既可以总结中国两千多年何以成为“治理得最好的国家”的经验,更要深入总结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制度韧性与治理韧性。韧性中国应包括文明韧性、国家韧性和共同体韧性,其中的共同体韧性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来自国家韧性、文明韧性,同时又促进国家韧性和文明韧性,更体现为一种强大的共同体信念,即“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11]39}。

笔者以为,韧性中国又是以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作为根基的。本文将文明韧性界定为,在历史上长期形成与传承的文明体系内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理念与智慧,这种理念与智慧可以看作是促进该文明体系持久存在与有机生长的特质。这种韧性也深刻影响着国家组织与运行,渗入其他群体生活组织和运行之中,包括社会建设、民族关系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具有强大的韧性,应对其韧性进行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特性的概括,应该说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韧性。延续几千年而不辍的中华文明,以及作为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能够以“多元一体”延续转型为当今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具有卓越的韧性,其独特的文明韧性深刻融汇于国家建设与治理、社会建设与治理中,至今依然构成中国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包含了形成我国文明韧性所具有的重要特质。

“文明型国家”是中国国家的一个重要特质,因而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展开系统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提升文化自信,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由此也决定了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更需要结合现代政治哲学与政治学进行研究。例如“韧性中国”的理论命题,就应该结合中华文明的韧性进行深入研究、挖掘,使中国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能够将传统文明智慧与现代治理结合,从而不断增强国家

韧性,对抗现代性的不确定风险。这对于以长治久安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学界在国家建设方面必要的“思想解放”,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方向^[12]。

(三) 共同体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文明的韧性成为中国政治发展、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文明基因与深厚政治哲学底蕴,助力于形成以中华民族主体性为底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就,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该遵循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进一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此才能从容应对现代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与风险。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支撑,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凸显中国特色的共同体韧性,并将其贯彻于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建设、民族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如何在中国政治哲学的语境下找到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这需要我们深刻认识自身民族所处的文明范畴和时空范畴,要具有深刻的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例如,着力将中国传统的文明韧性与国家韧性的经验运用于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盘接受,而是一定程度上必然内含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反思性”建设。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表现为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复兴,同时也经历了从传统的“神论”到“人论”的变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反思性,但只有基于对自身文明的深刻理解与传承,才能实现本体性的反思与升华,建设具有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例如,民族政治是韧性中国研究非常典型的领域,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与韧性紧密相关。中国保持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的平衡,使其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笔者曾提出“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的解释框架,对中国大一统的韧性及其内部的多元文化边界的流动性、包容性,以及由此而形成大一统文化的系统性、坚韧性进行了充分论述,总结了多元一体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机制和机理。中华文明对于中华多元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凝聚效应和主导效应三大机制,形成了中国多元一体的韧性而不是紧张与二元对立^[6]。

中国古代政治治理中的民族事务治理也顺应与促进着这一文化韧性,深厚积淀了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相互成就与促进的机制,形成了中国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中的重要政治韧性机制和特色,即多元一体主义。多元一体主义是一种更平衡、更灵活、更包容与更具有弹性的理论主张,因而也是更具有韧性的民族政治理论,也更有助于国家韧性建设。从中国的历史到现实,多元一体主义实际上一直隐藏在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之中,因而也促进了中国国家韧性的形成,加强了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民族政治或民族事务治理为观察场域,对于中国的政治韧性能够提供一个较好的解读。由此,我们也可以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下的民族事务治理道路的中国特色。新时代以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关的民族政治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深刻蕴含着中国特色的政治韧性品质,也凸显了中国的政治韧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底层逻辑。

如何理解民族共同体韧性,首先需要明确国家的内涵。笔者以为,国家包含历史、文化、人民、民族、国土及政体等多个要素,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人民由各族人民共同组成。民族共同体

作为构成国家的重要载体,其含义跨越时空,不仅包括当下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国族,还包括在悠久的历史中各民族共处一个文明体系、一个国家而长久进行共同奋斗、共同生活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目前,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为“国族”的讨论引起了一些争议。毫无疑问,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是国族,这一点与西方民族国家“nation”的意义对称,但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来说,还需要重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明基因。“国族”的内涵略显不充分,因为这一概念更多承载了与现代的“state”“people”等相对整合意义上的、相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整合性、同一性”的民族建设功能。如该民族应该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采用和保持同一套科层治理体系、行政机构、法律、公民文化、教育体系、国家认同、国家文化、国家忠诚等,这无疑是成为民族国家之“国家层次的民族”必需的因素。除此之外,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命运共同体,是鲜活有机的、包含情感与连续性的历史记忆,是“四个共同”“四个与共”历程中形成的真实共同体。中华文明的韧性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共同体属性,同时这一属性也需要现代政治的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来深化与稳固。西方国家总体上缺乏统一、稳定、持久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经验,其国族更多是在近现代以民族主义、工业化、印刷资本主义等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既需要依托政治意义上的、建构主义的国家工程,又需要基于自身历史、人民与文化的惯性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促进共同体的有机生长。这种有机的、历史连续性的创造,更大程度上成就了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与建构主义的国族建设相得益彰。因此,如何构建共同体韧性,除了依托现代国家的国族建设,还要充分重视民族共同体韧性的自发生长,民族共同体韧性是指这一共同体能够长续而存的特质与信念。

二、中华民族的文明韧性

从学界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中华文明韧性的研究还不多见,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薛江太的《中华文明韧性发展的根源探索》一文。薛江太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持久韧性的根源,从自然环境、农耕定居文明、血脉文化、包容精神及作为文明载体的汉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3]。应该说这一论述触及了文明韧性的一些重要内涵,但还不够全面。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游牧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中,中华文明的特性除了连续性、包容性还包括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后三者同样是造就这一文明长盛不衰的、充满活力、与时俱进的根源。因此,中华文明的韧性就深刻蕴含在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之中。

第一,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体现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的连续性。由商而周,周朝实现了从部落国家向封建国家的迈进,创周礼而定天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哲学流派与思想形成中华文化盛景。“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谱系中四大古文明之一,而且是唯一延续数千年不曾断裂的文明。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和哲学与古希腊文明几乎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峰,一东一西,相互掩映。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无论从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亚于古希腊哲学,中华文明发轫久远、思想深邃。”^[14]孔子结合了周礼与儒家思想,为中国的国家政治与治理模式奠定了政治哲学基础。围绕这一核心的政治哲学,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机构、文官体系、科举制度等不断发展成熟,形成了一定的国家韧性与文明韧性。这种韧性成为中国人不断凝聚交往交流交融的稳定器,无论是汉民族建立政权,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都认为自

已在维系中国,采用、延续和发展既有的国家政治哲学和政治运行系统。

第二,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锻造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的创新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等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历史上有很多的文明走向衰落或完全融入其他文明。对于中华文明,需要看作是一个具有一定稳定性但不断发展更新的系统。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经历无数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环境地理因素变化,即使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机时期,也在不断改革国家治理模式、解放思想、转变生产方式,不断因时而动、革故鼎新。因此,“变革与创新”同样是中华文明韧性的重要特质。商朝以奴隶制结合神权信仰;至周易商,则推行周礼;至秦朝,改革周朝遗留的分封制所造成的春秋战国之纷乱,创制历史上较早的统一的国家制度;至汉朝,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从国家行政治理体系来看,经历了从汉朝察举制到魏晋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后科举制的变化;中央官制也经历过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到唐宋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清内阁制和军机处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创新与发展,体现了中华文明崇尚“变则通,通则久”的创新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受到最为猛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面对新的生产方式、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中华民族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与深刻的自我变革。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索能够使中华文明复兴强大的道路,不断探索经验、不断尝试,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既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又敢于变革、勇于创新的特质。中国依靠自我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整体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形成更强大的生命力,正在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具有韧性的创新,即善于将自身的实际与外部变革的创新元素有机结合,在保持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是一个韧性的体系,具有不断吸纳创新并有机结合自身体系的弹性与生命力。

第三,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铸就于“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的统一性。较为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相依赖的经济互补和统一的书写文字,都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多元不断趋向统一。秦朝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打造统一国家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的标准。由此,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大一统国家形态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历史起点,也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形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深刻形塑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领土空间、民族结构、价值观念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遗产。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各族人民在文化上的共同性,同时也逐渐铸就了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统一、中国国家统一的坚强信念。这一信念的背后是对中华文明整体性存在这一事实的认同与坚守。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原的民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认为自身为中华正统,同时不断推进中华正统。无论是继续编纂历史典籍,还是使用汉字,以及沿袭上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与治理模式。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实际上加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及统一性维度上的韧性。

第四,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形成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

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15]从文明与国家的关系看,尽管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毕竟在内涵、外延上都有重要区别,不能简单以政治体范畴的时空性来替代文明范畴的时空性。严格来说,早期中国是与最早出现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相关的政治体概念,也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如《尚书》《诗经》等文献中阐述的与中原王朝国家和都城(京师)相关的概念。它所意指的“文明”是指黄河中游以中原王朝国家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以及这种文明形态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及影响。但近年来各地区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证明,也存在先后崛起或各领风骚的不同文化重心。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程中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最终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格局^[16]¹⁷。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七大区域,为多元发展的讨论奠定了基础^[17]。

中华文化成分丰富博大,与善于借鉴、吸纳其他文化元素有关。历史上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与西亚、欧洲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佛教传入中国则形成了中国的禅宗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充分结合形成“清真”文化,这些都为中华文化增加了丰富性。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宗教战争和种族主义的战争,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超越了将文化、信仰、血统本质化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思想。相比“文明的冲突”,中华文明更提倡文明的互鉴、包容与和谐并存。中华文明作为较早成熟的文明体系,体现出其能够充分吸纳其他文明范畴的文化、宗教元素,或以自身的丰富博大与深厚使其本土化,或使其能有一席之地。

第五,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体现在中华文明“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的和平性。先秦文献中就已使用“和平”一词,《易经》中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8]²³⁶之语。古语亦有“协和万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农耕文明“安居乐业”的传统,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的太平盛世,也不可避免有战乱,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歌颂了和平盛世,对于战乱造成的百姓痛苦十分同情。长期的历史经验影响下,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对于和平盛世的追求,能够平息战事、休养生息的朝代被称为盛世,君主则为明君。此外,秉持和平、和谐的理念,中华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明往往能够优容之。在天下体系下创造出很多以和为贵、和谐共处、以经济贸易、礼尚往来、朝贡、和亲、教化等维系和平的方式,尽可能避免战争与冲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秩序。这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文明,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互补、文化交融,并以多元文化碰撞所不断产生的创造力推进中华文明的丰富与活力,因而也加强了中华文明的韧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研究价值在于我们要从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民族韧性三重角度的结合看待民族共同体建设,认识到其深沉性、复杂性、历史性,加强文化自觉与文明认同,深刻总结中华文明体系下独特而又包含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体建设经验。这一主张也恰好符合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

三、文明韧性如何影响与加强现代国家韧性

国家韧性无疑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韧性需要排除历史上通过极端暴力专制,或者近现代以来通过对外发动战争等非常规手段力图增强国力的行为。事实证明,这些路径往往会破坏国家韧性。例如,“一战”后的德国遇到的战争赔款、制裁所造成国家困

境,以及“二战”后日本的艰难重建。现代国家韧性的特质往往通过民主、协商、共有共享与治理效能的优化来体现,民众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参与性与代表性,而国家对民众诉求保持比较高的回应性。“规范的现代民主国家确实不会落在兜底意义上避免国家崩溃,因此不会挣扎在艰难维护国家体制的底线上。它们会在保证不坠入底线的情况下,寻求国家在规范条件下的强劲国家弹性,因此国家韧性的劲道会相对足够。”^[8]相比前现代国家或高度依赖外部力量的非自主国家,民主的、强大的、自主的国家表现出较高的韧性。在国家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治理系统良好运行的前提下,无论是自然灾害、突发事件还是来自其他领域的风险,韧性高的国家都能够予以应对并保持国家秩序稳定。但这也不代表着现代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其韧性是稳定的或者自足的。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从简单社会转变为复杂社会,尤其是由于气候变化、科技与数字技术发展、国际关系变局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治理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增高。由此,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增强国家韧性是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中华文明韧性促进国家与社会相互塑造

周光辉从大一统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国家韧性,指出“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特定国家形态的长期延续,也就表现为人们所观察到的国家韧性”^[19]。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属性,而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又聚合、发展着中华文明。在中国,文明与国家的结合尤其紧密:一方面,经过早期国家的探索以及春秋战国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充分交流,国家选定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论,由此“文治”“礼制”国家传统的延续超越了国家政权的变迁;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域的人群统治中国,都不断沿袭、发展和完善着这一文明国家的传统。政治文明的稳定性也造就了国家的韧性,同时国家的文化成分也越来越丰富,客观上保存和发展了文明韧性与国家韧性。

因此,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形成了系统化的伦理规范,并作为文明之重要基底而稳定传承几千年不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伦理思想及其打造的“礼制”等规范着上层建筑、社会生活、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而且其伦理道德本身还是构成人们个体生活的意义所在,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体、家庭与国家联结在一起。在现代治理的韧性研究中,学界倾向于将韧性的面向分成国家韧性、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家庭韧性、个体韧性等层面,现实中这些面向其实是统合在一起。以韧性的文明造就韧性的国家,并形成跨地域、跨民族的对于“中华文明+中国”的认同,而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因素又为建构这一文明类型与国家提供创新性元素,使其更加壮大。

(二) 中华文明的韧性促进国家与民族相互塑造

考验现代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其包括国家建构与有效治理两个层面,这无疑是政治学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国家聚合与崩溃”“文明的冲突”“多元文化主义”“多元一体主义”等,都致力于研究或解决人类多样性与合作性、一致性之间的张力,尤其是需要由此而助力于国家与民族建设,使其更具有坚韧性与包容性。国家凝聚力并不会自动实现。例如,中国在历史上具有大一统的传统,但也是通过各个朝代的治理方略、民族政策经营所得,这些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创新以应对变化,同时又保持系统性稳定,即大一统的总体趋势。中国在历史上积累了民族事务治理的大量经验,这些经验随着朝代的更迭继承、发展,不断创新出一些新的制度、机制,而且非常务实与灵活。但不管如何创新变革,在治理理念

上始终强调政治上的大一统。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的民族政策、民族事务治理机构与重大的民族事务治理行动。从秦朝开始,朝廷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官职和机构,在民族聚居地区设“道”;制定民族法“属邦律”;少量征收,贡献方物;修筑通往边疆的道路;移民边疆屯垦。汉朝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实施对匈奴“和亲”、对百越“和集”,以及徙汉民实边、移夷民到内地等措施。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十分重视通过这一制度加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自唐朝以来,每年的科举考试少数民族地区入仕的人数不在少数,“元朝从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到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共举行了16次廷试,每次录取进士最少时50人,最多时100人”,其中蒙古族就有16名状元^{[20]41-42}。

(三) 中华文明的韧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1]中华文明韧性的社会基础在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由此各民族形成了对于大一统政治哲学与文化理念的认同,以及各民族对于中华文明及中国的执着信仰。以此为基础,历代统治者在大一统的原则下,采取合理而灵活的体制机制进行民族事务治理。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底层逻辑依然是大一统的主权原则基础上的韧性治理,体现为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基础上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具有韧性的共同体。因此,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造就了国家韧性,二者相互浸润与造就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凝聚、壮大与发展。

“尽管‘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近代以来兴起的观念,但它是历史上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文化形态的总和,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遗产的自然结果。”^[22]在中国,文明韧性的特点之一是其包含且进一步超越了西方民族学意义上狭隘的“族性”中的显性因素——如语言、风俗习惯、大致的经济类型等。这表现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礼仪、伦理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历史连续体、文明体和命运共同体,而地域性的民族及其族性很少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本质内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历史潮流中总是被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观所超越。中国人也不以族性作为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边界,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与时空范畴也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族,即中华民族并不只是因为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属性才成为超越各个民族的“民族”,而是因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国家韧性的叠加,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在历史上就不断汇聚的、以文明型国家为底色的超大型民族共同体。

(四) 中华文明的韧性促进形成中国独特的政治共同体哲学与治理智慧

在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背景下,应该深刻认识到对中华文明探讨的意义并不只是寻根,而是具有强烈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诉求。也就是说,只有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与重要特性,才能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政治文明具有强大的韧性:一是体现为很早就摆脱了神权政治而重视人性;二是重视政治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三是体现了政治的包容性与教化性;四是政治治理的稳定性、灵活性与创新性有机结合;五是体现了以天下为情怀的对人类共同价值的伦理关怀。

中华文明的韧性应该是体系化的、整体性的,由五大特性相互交织而成就,呈现历久弥新、

恢弘博大、协和万邦、崇礼明德、自强不息的文明气象。只有秉承这一文明的优秀传统、把握这一文明的总体气象,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中华民族文明的现代化。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文明向度的规范性和方向性指引,有利于将民族事务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统筹,建立共同的逻辑起点。

四、以中国特色的共同体韧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文明韧性基因不断沉淀,从哲学意义上不断影响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发展与交流、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民族建设等多个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依然需要建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曾经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建构的是“虚幻的共同体”,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致力于建设真正的共同体。中国在许多方面形成了自身的共同体逻辑和治理经验,凸显了韧性特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汲取中华文明、中国国家的韧性基因,在中国特色的共同体价值理念与共同体韧性建设中践行与推进。

(一)以中国式共同体韧性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韧性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成熟的国家治理体制的历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智慧,致力于善治的政治传统,以及行之有效的国家、社会、民族之间能够实现整体性治理与协同性发展的经验。进入现代国家以来,由于与西方国家建设的政治传统、政治文化不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亦不同。中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及其韧性,突出表现为实现“全国一盘棋”“整体性治理”和党政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等。这是由中国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复合逻辑所决定的^[23],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资本主义国家建构的底层逻辑不同。但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国家治理的诉求和面对的问题具有相似之处,因此治理概念的中西话语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而是可以对话的。我国的治理现代化是在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同时,也要认识到随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增强,需要充分释放社会多元主体的活力,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进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之道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西方国家在现代社会治理技术方面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其难以克服资本、市场的逐利逻辑,政府难以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进行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当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重要路径就是探寻真正的中国之治。我国的治理现代化始终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依法治理为前提,同时也广泛吸纳与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无论是协同治理还是多元治理,都始终是以国家为主导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国家主导的治理逻辑与西方立足资本流动的治理取向保持差异,而且为全球治理指明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就是在社会主义法治范畴内,通过民主政治协商方式,将坚持党的领导、国家理性干预、市场竞争机制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这些在西方治理视域下互不兼容的要素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共识与强大活力。”^[24]

(二)以中国特色的共同体理念深化“国家—社会”共同体韧性

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中国则致力于建设真正的共同体,这与中国古代的共同体观念有着相通性。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

政以德的治理理想”^[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竞争十分激烈。一方面,要完善法治,使社会、个人在有序的法治环境下竞争与合作,实现经济社会效益与活力的充分施展;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国家对于社会的公共服务与保障职能。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其对社会的服务与保障功能,周代即有“保和六息”,汉高祖则制定了养老孝亲制度等。传统的“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等思想与现在所倡导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重要目标具有相通性。这些目标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由此提升了“国家—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加强了共同体的韧性。此外,这一共同体的建设还需将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构建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共生相统一的画面。这就需要巩固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所设定的真正共同体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发展、相互支持。“国家—社会”共同体的韧性有助于改善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 and 行为。提高“国家—社会”共同体的韧性可以更好地培养人与人之间和睦共处、服务社会的意识,激发每个人的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力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牢固的社会基础。

(三)以中华民族整体文明观深化“国家—民族”共同体韧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关于中华文明的论述既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文化哲学基础,同时也指明了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如何通过汲取文明韧性来推进国家韧性,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并由此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无论是理论奠基还是实践推进,都应该加入中华文明的韧性内涵,都应该以传承发展中华文明韧性和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基础。因此,必须以中华民族整体文明观整合民族观,深植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形成中国的、现代的民族观。国际上,不少国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以语言、风俗习惯、经济类型等要素确认族群、民族的多元性,承认多元一体的民族与文化格局,同时在国家层面再进行“国族”建设。然而,多元与一体的张力在很多国家成为国家建设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者说是国家治理难题。我国对于民族问题的治理要立足于各民族充分的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共同推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同时要在包容中推动文化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例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指导下,学界深刻地批评了“新清史观”“内亚史观”“崖山之后无中华”等错误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深植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观、大中华民族观。

(四)以中国式共同体理念深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共同体韧性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具有相通性,“富民”思想发展为“共同富裕”。我国即使“人口规模巨大”也要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创建更加公平、正义的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诉求。中国崇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郑和下西洋进入各国是展开友好邦交,而不是殖民掠夺。在一个由游牧经济、农业经济、渔猎经济共存的经济体系内,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生产体系与市场交换、分工合作体系,形成了经济共同体和经济韧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中国的经济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其中,经济共同体的韧性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不断革故鼎新,出台具有创造性的国家经济战略,与国际经

济体展开广泛的经济合作。海外侨胞胼手胝足、艰苦奋斗,侨胞之间互帮互助,一旦事业有成,便报效祖国与回馈乡里。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海外知识分子能够在义利之间作出正确选择,体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新时代的数字芯片技术竞争中,有来自政府、企业的无数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取得重大突破。这些来自中华文化的共同体韧性和经济伦理使得中国既能够自信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又能够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公共产品带动当地和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共赢。这无疑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提供了持续发展的韧性。中国经济伦理还表现为能够以中国式共同体理念深化人与自然的共同体韧性,持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建设“美丽中国”。这将有效地纠正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竭泽而渔的无限索取和破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韧性提供了思想和哲学智慧。

(五) 以守正创新的理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观是不断创新而不是封闭守旧的。如何看待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以上几个问题中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这就要敢于创新,实现文化的时代性汇聚、碰撞与升华。例如,在西方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释总结基督教改革的新教精神对于神学的发展,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与“工作、节俭、积累财富与增加资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中个体的进取解除思想束缚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25]。虽然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贪婪性,但“勤奋、节俭”“创造财富推进社会发展”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敬业精神、进步主义的信念基本一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家庭精神、仁爱精神、人本主义等,以及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追求大同精神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如何进一步实现现代性转化,如建立公共精神、法律意识、自主精神、冒险精神、理想主义、创新精神等,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发展。随着现代性发展,基于精神的认同成为一种趋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高涨,这体现为一些民族、族群甚至国家对于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论证是以诋毁其他族群、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为前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坚持中华民族整体文明观,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我们需要以创造性的治理方法和创新性的理论来弥合可能存在的一些隔阂心理,通过融通一体化的文化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成熟发展。

五、结语

百年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全球经济增长不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民粹主义上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已被战争打破,并使得国际关系充满变数。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技术迭代升级,各种经济体和产业之间竞争激烈同时风险增大。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贸易摩擦、技术合作限制等重重压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面临日益增长且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亟需强化弱项、补齐漏洞、消弭短板,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应对不确定风险、具有强大凝聚力、同时充满活力的共同体?韧性治理成为实践之应和理论之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及共同体建设需要韧性政治理论提供智力支持和

理论保障。

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作出了阐释。“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建设韧性中国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当下,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凸显与内化中华文明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智慧,不断总结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政治韧性的形成机理,包括政治制度韧性、治理韧性与社会建设韧性的经验。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维度上,结合文明韧性与国家韧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凝聚力。韧性政治之于中国,既要文明互鉴,充分汲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更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引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韧性理论。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的、具有韧性的治理路径,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韧性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行动,提升与打造共同体的柔韧性,扩展与丰富共同体的包容性,增强与筑牢共同体的稳固性,能够修补社会系统的脆弱地带,化解不确定的现代性风险带来的冲击,培育正向的共同体生长机制,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具有韧性的共同体基底,提供强劲的社会动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2023-06-03.
- [5] 马俊毅. 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建设[J]. 探索,2019(3):43-50.
- [6] 马俊毅. 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多元一体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2):14-27.
- [7] 易承志,龙翠红. 风险社会、韧性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 人文杂志,2022(12):78-86.
- [8] 任剑涛. 扶危翼倾与踵事增华:政治变迁中的国家韧性[J]. 探索与争鸣,2021(4):35-52.
- [9] 周光辉,赵德昊. 荒政与大一统国家: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J]. 学海,2021(1):5-13.
- [10] 周光辉,赵德昊. 教化: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形成路径[J]. 探索与争鸣,2021(4):53-64.
- [11] 于铭松. 文化自信: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2] 任理轩.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N]. 人民日报,2023-08-16.
- [13] 薛江太. 中华文明韧性发展的根源探索[J]. 经济研究导刊,2020(31):132-134.
- [14] 马俊毅. 试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方位[J]. 民族研究,2022(5):15-25.
- [15] 《求是》杂志编辑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指南[J]. 求是,2023(17):12-21.
- [16]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 [17] 夏鼐. 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J]. 考古,1977(4):217-232.
- [18] 邓球柏. 白话易经[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9] 中国独特的国家韧性从何而来? [EB/OL]. (2022-10-1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087007851370494&wfr=spider&for=pc>.
- [20]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2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 [2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9-28.
- [22] 李禹阶. 早期中国文明具有独特演进路径[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1-20.
- [23] 马俊毅. 民族事务治理的中国道路[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6):20-28.
- [24] 赵中源.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的逻辑与遵循[N]. 光明日报, 2022-01-21.
- [25]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Civilization Resilience, National Resil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MA Junyi¹, YANG Yifan²

(1.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resilience shows that it has good exten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Political scholars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political science, the theory of resilience is a vision of a political system with long-term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e essence is to construct the endogenous resilienc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China's national tradition of a civilized country has formed a resilience that has been shaped by the state, society and nation and continu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qu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ve made the best explanation for the civilization resili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for how to absorb the civilization resilience of China'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lea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uperposition of resilience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a's national resilience forms the resili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t presen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resilience tradi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pply i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tudy of strengthening national resilience is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mmon promotion and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cess, drawing on the factors of resilient civilization, building a resilient country, and shaping a resilient politics that confronts the risks of modernity, its experience can provide Chinese wisdom for hum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ivilization resilience, national resilie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责任编辑: 赵超

引用格式:王伟,刘泽锋.百年变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J].探索,2024(1):41-52.

百年变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

王伟,刘泽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是指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生存本能与精神品质,具体表现为居安思危的意识、自强不息的气质、自尊自信的品格、创新务实的精神、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共同体结构的外柔内韧,即社会层级结构中的家国一体传统凸显整体的向心优势,以及民族关系圈层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巩固持久的文明核心;另一方面则源于功能上的有序调适,即大一统国家的荒政与体制变革建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制度机制,思想传承与教化则强化共同体成员的韧性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历经淬炼,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得以彰显,并熔铸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之中。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给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带来全新的挑战。对此,必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进一步加强韧性建设;突出韧性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韧性功能;立足“两个大局”的时代大势,积极转变韧性策略。只有在变中求稳、稳中求进,不断强化韧性的张力与应力,才能真正维护和平稳定的大环境,最终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百年变局;中华民族共同体;赤字;韧性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041-12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虽历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英雄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1],未曾断绝而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独有的韧性息息相关。当前国际局势风云诡谲,“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不确定的“变”与不稳定的“乱”俱增,给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挑战,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首先要坚定信心,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我多次讲,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3]45}在这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年代,“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4],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未来。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百年变局这一重要背景下,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聚焦于铸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与改进民族工作研究”(23AMZ001),项目负责人:马俊毅。

作者简介:王伟,男,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锋,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上的认同建设,并围绕近年来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所强调的一些理念而展开讨论,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等。学者们在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与动力源泉的过程中,发现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沉浮而依旧迈向复兴的历史现实与“韧性”紧密相关,于是开始将韧性同党和国家、中华民族结合进行研究。

学术意义上的“韧性”(Resilience)一词由国外传入,国内学者在梳理“韧性”概念时,根据应用场景延展出了城市韧性、经济韧性、社区韧性、组织韧性等内容。邵亦文与徐江较为完整地呈现了韧性概念的源起与演变,包括韧性的词源、应用领域的变迁、概念认知的转型等^[5];单宇、李平等人在考察组织韧性时,提出了韧性的“反弹”与“反超”这两个内在的核心特征^[6];谭俊涛、李连刚等人也提到韧性这一概念在国内仍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而将其引入经济领域也是这几年才逐步开始的^[7];韧性治理则是组织韧性、社区韧性的进一步延伸,例如唐皇凤、王豪把社会与国家间在基层治理上实现有效的张力与协调看作是一种韧性的治理选择^[8],房亚明、古慧琳探讨了超大型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对于韧性的提升与保持^[9]。

近年来,“韧性”同党和国家相结合的研究逐渐增多。范嘉祥用“政治韧性”来描述中国共产党因应“两个大局”演变过程中体现出的政治品质,并推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韧性政党”^[10];田旭明、李智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坚定的人民立场、卓越的理论思维、真实有效的民主制度、开放包容的政党胸怀和气度、中华文明韧性基因的涵养等要素共同铸就的结果^[11];张诚指出,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需从刚性治理转变为韧性治理,并从结构、社会、技术与制度四个维度搭建韧性治理的运行机制^[12]。此外,一些著作也以中国的韧性为主题回望艰苦岁月、探讨未来发展,如董少鹏与窦国庆的《坚韧的中国》、秦朔的《时刻: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韧性与创新》等。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国内学界也有论及。严庆认为,内在有机性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性与韧性,其中的韧性即表现为“顽强持久、富有建构力”^[13];袁东升将韧性与调适性并列,用于描述族际生态系统,其韧性可大致理解为“面对复杂社会的整体关联性具有应变及吸纳能力”^[14];马俊毅则关注多元一体背后的柔与韧,并认为一体的韧性反映的是共同体对于差异性所具有张力的包容性,同时又保持着建设共同性的坚定性^[15];常轶军在谈论中华民族认同的结构韧性时提出,这一结构韧性主要体现为纵向结构的根基性、内在结构的复合性和横向边界的包容性^[16];周光辉和赵德昊对大一统国家的韧性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从教化、荒政与体制变革的角度描绘出大一统国家的韧性智慧^[17]。

总的来说,古代中国虽无“中华民族韧性”一词,但其精神早已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在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中不断提升。韧性包含坚强与持久两层含义,前者侧重精神力量的强度,后者侧重个体在困境下的持续性状态,二者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前者强调时间上的持续,后者强调深度与力量^[18]。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中,其韧性表现为居安思危的意识、自强不息的气质、自尊自信的品格、创新务实的精神、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就是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本能与精神品质,使其能够可持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以适应内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冲击和挑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内在与外显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不是凭空而来,它作为一种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精神力量,有着自

身的“源”和“本”^[19],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并在无数次外部冲击与内部整合的重大危机之中得到提升。要真正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就必须追根溯源,深挖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并明晰韧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处于困境时的多维彰显。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内在机理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正是其在结构上的外柔内韧与功能上的有序调适形塑了这一共同体的韧性,故其韧性的形成可从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1. 结构上的外柔内韧

“共同体”(Community)有两种类型:一是地域性共同体,如村庄、邻里、城市、社区等地域性社会组织;二是关系性共同体,如种族、宗教团体、社团等社会关系与共同情感^[20]。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这两种类型共同体的复合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形成与社会层级结构和民族关系圈层具有内在联系性。

在社会层级结构上,传统的家国一体结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家和国具有天然的对应关系,家国一体观念的形成与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家就是一个缩小的国,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国之不存,家将焉附^[21]。这种理念将个人的生存推及共同体的集体安全,最终延伸至整个文明的存续,由此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将自觉地为了集体的安全而作出让步。在家国思想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家族文化的主流均将国家利益和中华大一统摆在首位^[22],数量众多的个体随着家庭统合凝聚在国家这个庞大的组织之中,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国家、再从国家到天下,最终形成了“家—国—天下”一体的结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上的递进使共同体的成员获得了稳定的向心力,汇聚为共同体的发展合力与生存韧性。同时,层层递进的组织结构统一了共同体的思想和行动,提升了共同体的应急能力,从而助其渡过种种难关。

在民族关系圈层上,作为一个稳定且复杂的人群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其独特的内部结构。多元一体的格局促成了中华民族整体上的柔与固,它既是该民族的本质内涵之所在,也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整体面貌^[23]。如果将共同体视为一个活态的有机生长体,则共同性与多样性可以在其中融汇共生。实际上,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与历史事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共同性与多样性的紧张对立关系^[15],从而使共同体的结构更加和谐稳定,能够适应各种变化。在多元的包容下,各民族既有融合到中华文明核心的部分,也拓展出了自己文化的生存空间,这一空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柔韧外壳,可以应对各类冲击;在一体的稳固下,中华文明凝为坚固的核心,锚定了共同体的过去与未来,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坚实的根基,以抵御种种挑战。在这一格局下,历代政治共同体在分分合合的争斗中始终执着于大一统的理念,战乱无法摧毁几千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共同体结构,更不能消磨由这一结构所保护着的文明内核。外柔内韧的多元一体结构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面对冲击时更具张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形成的重要源泉。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家国一体的理念,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实现了整体系统与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有条不紊地开展自我恢复与环境适应的实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构造出民族关系圈层下以中华文明为内核、以各民族文化为外壳的完整架构,从而获得强大的抗压能力。结构的外柔内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具张力,以此应对各类冲击,这便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韧性形成的源头之一。

2. 功能上的有序调适

韧性作为一种特质,通常是在系统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互动时得以呈现,具体表现为系统功能的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也概莫能外。

其一,功能层面上韧性的形成主要源自大一统国家在荒政、体制变革等方面的实践与经验积累。一方面,荒政为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与防护机制。国家针对各种自然灾害的预防、应对和处理的方式、政策与制度安排统称为荒政,其实施强化了国家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为民众培育了朴素的家国共同体意识^[19],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此外,荒政留下的制度性遗产、基础性设施和宝贵经验为应对之后的挑战提供了牢固的基础,使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在一定的承受限度内可发挥持久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体制变革则是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通过体制变革,多权力中心分立的低水平均衡被打破,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秩序得以长期维系。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变革既源于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得益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革故鼎新的文明传统,这为我们塑造现代国家韧性提供了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24]。

其二,大一统理念下的教化功能培育并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心理韧性。教化是塑造大一统体制下国家韧性的重要路径。经由学校教化、礼乐教化、民间教化和家庭教化的具体路径,教化形成了对统治者的道德约束,巩固了基层治理秩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最终形塑了大一统国家的韧性^[25]。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在大一统的教化中汲取充分的养分,促进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有机融合,最终使共同体在意识、认同与文化上独具韧性。此外,以认同培育为导向的韧性生长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不同的环境下不断丰富韧性的精神内涵。在古代先秦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宋明理学等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以及近代中华民族为延续民族历史、传承民族文明和涵养民族精神而与“形变力量”的斗争下^[26],逐渐构筑出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重要内容,即居安思危的意识、自强不息的气质、自尊自信的品格、创新务实的精神、开放包容的态度。

质言之,大一统国家对荒政的持续投入是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行动机制;体制的变革是长期维系且不断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制度机制;教化的深入开展则巩固了大一统国家的基层秩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培育机制^[27]³。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形成还有其独特的优势。史学家亨利·梅因曾从地理构造对社会影响的角度谈到,“亚细亚国家的地理构造促使各个社会比西方社会的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根据公认的社会规律,一套特定制度传布的空间越广,它的韧性和活力也越大”^[28]⁶⁹。中国的三层地理构造、多样化的自然环境、较大的人口规模为共同体的生存发展赋予了更大的张力与活力,这些客观优势为韧性的发挥提供了可控的试错空间,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外在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29]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深深内嵌于这样的共同信念之中,在整个文明与共同

体生存发展的关键时刻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战胜了一次次的困难。

首先,“国土不可分”是在各族人民保卫国家领土时所体现出的韧性。领土是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存续与发展的物质基础。“韧者笃行,韧则行远”,在守卫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中华儿女展现了顽强拼搏、坚忍不拔的韧性品质。无论是郑成功收复台湾、赵尔丰收复西藏,还是左宗棠收复新疆,都表达出古代中国“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豪迈气魄。即使近代以来饱受侵略者压迫,中华民族也从未放弃守卫祖国的土地,不断努力收复失地。例如,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英国和印度在中国的西藏边疆地区发起蚕食中国领土、教唆民族分裂势力试图分裂中国的行为。针对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共同采取了抵抗侵略、外交抗议、回击民族分裂等措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30]。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始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守卫祖国领土完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31]。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争中,在与“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已凝聚成为维护祖国统一的磅礴力量,并始终秉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

其次,“国家不可乱”是在大一统国家长期延续中彰显出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中国古代王朝迭代更替,虽历经分合,但在“大一统”理念的影响下其大势始终是统一,疆域统一、中央集权、文化凝聚,“大一统”理念所带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国家由乱到治、由分到合的重要助推力。从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来看,王朝的统一时间远超分裂的时间,统一是王朝国家发展的主流,可见以国家不可乱的信念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延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展现。这种韧性不仅体现在以中原华夏民族对于道统、正统和学统大一统思想和行动上的建构,也显现于中国少数民族对于大一统思想的践行之中。在大一统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少数民族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华夷一统”的理论框架下,以炎黄血脉认同为共识,创建了多个局部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在金、元、清三朝,少数民族则在“我本中国”的理论框架下,以国家认同为共识,建立了统一(或局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中,以北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创造性地践行了“脱夷统华”理论;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沙陀人凭借“政治正统”完成正统建构;契丹人更是在“脱夷统华”理论中增添了“北极之下为中国”的内容,扩大了“中国”的内涵。金朝建立后,多民族的中国观被创建出来,大一统思想开始进入“我本中国”的理论进程。元、清两朝都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者^[32]。

再次,“民族不可散”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爆发出的强大韧性。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自在民族实体形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大韧性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而近代以来自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则是其韧性的迅速凝聚期和作用凸显期。韧性凝聚期的重要助推力之一,就是近代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试图借所谓的“一族一国”“民族自决”理论来瓜分中国。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大肆鼓吹蒙古自治、策划成立“西北回回国”等错误行径都是这套理论的实践。值此危急关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纷纷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议题对西方理论进行回击,最终激起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之情,抵御住了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猛烈攻势,避

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民族”话语的张力而走向分裂。此外,众多政治家也深谙民族不能散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政府,在领导革命时虽喊出了“驱除鞑虏”的口号,但民国建立后就很快转为“五族共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3]¹⁴,各民族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去。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交予我们的重要任务,以民族不可散的信念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其韧性的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各民族同胞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是民族不可散最形象的表达。

复次,“文明不可断”则是在延续中华文明的信念中所彰显出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29],世界上曾先后出现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都未能逃脱衰亡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在历经种种劫难后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只有中国在近代没有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只有中国实现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发展,也只有中国在短短的7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和平崛起。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王朝更迭、政权割据、民族也时有纷争,但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遭遇外侮内乱,中华文明都能生生不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都能薪火相传。文字传承了中华文明、历史承载着中华文明,历代王朝虽几经更迭但中华文化始终未断,中华文明的魅力不断彰显,以文明不可断的信念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共同韧性的彰显。

三、百年变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冷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合作共赢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交往理念。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矛盾错综演进,各种风险挑战相互交织催化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3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35]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赤字与挑战也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一) 全球和平赤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挑战

当前,国际大环境的和平赤字尤为突出,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剧,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频发,俄乌战争的持续发酵更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蒙上阴霾。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霸权主义与强权的政治行径,加之全球发展的不平等、不充分、不平衡,致使国际社会的现实环境不能满足人们对和平的需求与期待,由此形成了全球和平赤字。其突出表现为冷战思维重新抬头、大国博弈日益激烈、跨国争端频繁发生、热点冲突此起彼伏,极端势力屡禁不绝、恐怖主义祸乱全球,国际难民持续增加、人道危机复杂难解^[36]。对中国而言,全球和平赤字的背后还存在着“金德尔伯格陷阱”所带来的种种危机,这类理论污蔑中国没有承担起新兴大国的责任,导致世界治理出现领导力的真空而引发混乱。这类恐慌中国崛起、怀疑中国方案的话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诸多努力。同时,和平发展赤字也引发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

国民族事务的攻击。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和平崛起进行遏制打压。这主要通过制造虚假信息以利用国际舆论来抹黑中国;利用其惯用的长臂管辖的伎俩来妄图非法制裁与新疆、西藏相关的中国政府官员、中国企业及其相关人员;资助、蛊惑乃至培养境外极端势力来进一步破坏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团结;拉拢盟友一起向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发难。其次,地缘政治的变化给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带来极大挑战。例如,印度与中国领土边界的争端问题;中亚国家反华势力所涉及的国内一些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周边国家的民族冲突、安全问题的外溢给边境民族地区安全带来的冲击。再次,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冲击。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难;毒品治理问题给民族地区边境管控、安全造成的冲击;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对民族地区的冲击等^[37]。外部环境越恶劣,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抗压能力提出的要求就越高,需要逐一化解外部冲击。

(二)全球发展赤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挑战

当下全球发展总量不足、动能不足以及总体失衡,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加剧了逆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在如此发展颓势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需要直面的问题,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38],经济的持续减速或保持缓慢增长无疑会影响民众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从而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具体来看,发展赤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失衡。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而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则具体表现在生产力水平、科技与资源开发的广度与深度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39]。若长期无法有效缩小差距,将影响各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信心,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造成较大冲击。二是生态发展失衡。一些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导致当地生态环境走向恶化,不仅偏离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也破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所必需的发展环境。三是文化发展失衡^[40]。一些西方国家基于发展优势向国内灌输文化优越、文明冲突等思想,对各民族“美美与共”的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产生冲击,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三)全球安全赤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挑战

全球安全赤字主要是指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大国博弈、集团化、“小圈子”等依然在国际关系中盛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互相交织,严重威胁各国安全。这一赤字根源于国际上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横行^[35]。除传统安全外,卫生安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深,给全球安全增加了更多变数,使得全球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其一,国际安全风险的跨国性、联动性、多样性更加突出,新的贫困带、冲突源、脆弱点和动荡带等不断凸显,现有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难以应对。其二,大国对抗和地区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增多,重大疫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致使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受到强力冲击,治理机制协调难以为继。其三,美国继续以冷战思维处理大国关系,大搞大国竞争、军事集团扩张和集团对抗,严重侵蚀了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合作的互信基础,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赤字^[41]。全球安全赤字的加剧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也给中华

民族共同体韧性的限度提出了挑战。

(四) 全球治理赤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挑战

全球治理赤字具体表现为全球治理成效弱化、治理成果分配不均、国家供给公共产品动能不足、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困境等。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和加重,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球治理体系遭遇政治化风险,核心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致使多边主义受挫且单边主义盛行,全球治理体系分化危险加剧。第二,霸权国家“武器化”多边机制,合法性危机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撕裂程度。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制打破了以往的中立态度^[42],开始在一些事关全球稳定和发展的议题上站队,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致使全球治理秩序的客观性、民主性和制度性面临重大挑战。第三,霸权国家加紧在科技领域开展“小圈子”外交,构筑排他性规则体系。这种排他性的“小圈子”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单边管制措施,严重破坏了全球治理规则和秩序^[43]。在此形势下,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

总的来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是百年变局大态势下主要问题的彰显,而四大赤字背后的陷阱是中国必须应对的更深层次的威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再一次彰显,但大变局下的诸多挑战仍横亘在前,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建设任重道远。

四、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建设的路径

百年变局下风险多变、任务艰巨,各类赤字的背后隐藏着诸多陷阱,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带来了挑战,也对其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建设,就必须明晰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把握韧性自身的优势,立足“两个大局”的时代大势,在变中求稳、在稳中求进。

(一) 顺发展大势持续加强韧性建设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建设首先要透视复杂环境,把握战略机遇。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自我恢复时间持续缩短。在过去,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遭受重创后通常拥有较长的时间使民众休养生息,共同体内部结构的相对分散也使中华民族能够避免整体的倾覆。“两个大局”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容易遭受内外部冲击。反华势力的攻势愈发猛烈,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还面临一些风险挑战,给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建设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百年大变局下形势复杂、挑战诸多,但同时又给予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为把握战略发展机遇,需明确发展规划、夯实发展定力,从根本上提升民众的整体信心,从而进一步统合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

基于此,要找准历史方位、保持战略定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于内而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所面对的内部环境愈加复杂。于外而言,外部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

因素增加。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就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所处的方位,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建设必须立足新时代、大变局、大复兴和共同体的历史方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在短短百年内就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这也证明了中国的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战略是正确选择。因此,要始终明确前进道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而避免纷争给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带来持续冲击,专注国内的发展创新与改革,在百年变局下保持战略定力,进而为韧性建设提供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

(二)借结构优势充分发挥韧性功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经多次淬炼后韧性的抗压能力与适应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并注入共同体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国家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表现为国家治理的变革与社会风险的有效应对上,这在诸多国家战略中都有所体现。此外,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也是对古代荒政的进一步提升与完善。在民族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能力则表现在整体的意识铸牢与命运的休戚与共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守卫祖国的疆域、共同维护悠久的历史、共同传承灿烂的文化、共同发扬民族的精神,使中华民族能够抵御多方面的入侵与分化,让中华文明具有更强的适应力与生命力。在个人层面,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都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所在,并深刻感悟到韧性的背后指向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韧性精神在个体中的培育将极大增强共同体的应对能力,持续巩固共同体的稳定。在社会层面,韧性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支持,强大的工业能力保障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发达的交通网络将各地区联系在一起,便捷的信息传递促成了高效的沟通从而加强了社会各主体间的交往联系。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共同体韧性的提升使共同体整体的抗压能力与适应能力大大增强。

因此,要持续提升韧性能力,并汇集到共同体的发展信念之中。一方面,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层面的韧性。共同体成员要坚定“五个认同”,积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以此避免外来势力通过历史的歪曲与文化的侵蚀来动摇“五个认同”。坚实的“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层面的韧性。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高我国的经济韧性,以此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长期发展迟滞。同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此来整合社会与强化国家凝聚力以抵御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压力^[9],持续提高国家治理的韧性。

(三)以大国智慧及时转变韧性策略

新形势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正从一种被动的属性转变为主动的策略,这意味着韧性要在危机到来之前发挥作用。如今,“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发挥韧性承受压力与适应环境的功能,以大国智慧提前谋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策略。

一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与韧性精神。国家需定期组织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强化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与韧性精神,从而赋予每个共同体成员以强大的责任感,增强共同体成员积极应对冲击的主体自觉。二是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地

位,将其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体系之中。传播和弘扬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相关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通过精神培育来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三是优化应急措施,提升治理效能。在基层社会搭建不同属性的韧性系统,积极发挥社区在应对突发重大风险事件中的基础性作用。四是重视社会舆情尤其是网络信息的传播。建立更加公正、透明、可信的社会环境,同时政府也要加强自身公信力建设,及时公开信息、积极回应质疑、树立良好形象,以此来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从而避免塔西佗陷阱对韧性建设的阻碍。五是在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用中国声音、中国话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故事,使世界人民更加深刻地了解与体会中华民族共同体坚韧不拔的精神,回应西方的话语攻势。总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只有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形成具有更强适应性的系统,才能应对新时代下的众多突发挑战。

五、结语

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兴衰、更迭动荡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锻造了中华民族遇强不卑、遇弱不亢的韧性特质^[26]。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历经艰难险阻,无论是水、旱、蝗、雹、地震、瘟疫、饥歉等自然灾害,还是国家分裂统一、民族冲突融合背后的纷争战乱,抑或外来侵略者从物质和精神上的冲击与侵蚀,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压垮过。“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43]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共同体往往会爆发出惊人的生存信念,以共同体的韧性这一特质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深刻认识到韧性对于文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值此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至关重要,共同体成员要增强自身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自信,从整体上巩固韧性的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要积极汲取各民族在历史中的生存与发展经验,将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内涵当中,并转化为精神层面的民族品格,搭建起韧性的动力机制;党和国家需把握韧性智慧,凝聚共同体的最大认同,主动发挥韧性的调适功能,为全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出更为和平稳定的大环境。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 求是,2022(14):4-8.
- [2] 习近平.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J]. 求是,2023(1):4-14.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3-10-29.
- [5] 邵亦文,徐江. 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J]. 国际城市规划,2015(2):48-54.
- [6] 李平,竺家哲. 组织韧性:最新文献评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3):25-41.
- [7] 谭俊涛,赵宏波,刘文新,等.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20(2):173-181.
- [8] 唐皇凤,王豪. 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J]. 探索与争鸣,2019(12):53-62.

- [9] 房亚明,古慧琳.全过程人民民主:超大型国家韧性的形成机理[J].长白学刊,2022(5):43-53.
- [10] 范嘉祥.“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与中国共产党政治韧性[J].理论建设,2021(3):45-52.
- [11] 田旭明,李智利.韧性: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维度[J].探索,2023(2):115-126.
- [12] 张诚.韧性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1(4):119-125.
- [13] 严庆.认知与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思考视角[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5-43.
- [14] 袁东升.族际生态位育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关联性[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151-159.
- [15] 马俊毅.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多元一体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2):14-27.
- [16] 常轶军.中华民族认同:三维意涵、结构韧性与政治功能[J].思想战线,2023(4):81-89.
- [17] 周光辉,赵德昊.荒政与大一统国家: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J].学海,2021(1):5-13.
- [18] 朱佩茹.韧性一词之于“Resilience”的译法辨析及文化内涵[J].汉字文化,2022(22):147-149.
- [19] 王威峰,张明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走向更为主动:历程、动力与路径[J].探索,2023(4):164-176.
- [20] 周子伦,刘樊德.“共同体”概念词源、译介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脉络考察[J].北京社会科学,2022(11):14-24.
- [21] 家国情怀与文学书写[N].人民日报,2015-02-13.
- [22] 刘紫春,汪红亮.家国情怀的传承与重构[J].江西社会科学,2015(7):41-46.
- [23] 周平,郭志凯.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及其意义[J].探索,2023(6):28-40.
- [24] 赵德昊,周光辉.体制变革: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J].江苏社会科学,2021(5):78-87.
- [25] 周光辉,赵德昊.教化: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形成路径[J].探索与争鸣,2021(4):53-64.
- [26] 孙晴娟.民族韧性:民族复兴进程的透视[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5-21.
- [27] 赵德昊.形塑国家韧性: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延续与不断重建[D].长春:吉林大学,2022.
- [28] 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
- [29]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30] 张世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维护西藏边疆领土安全的协同行动——以民国后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考察[J].民族学刊,2021(4):1-9.
- [31]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21.
- [32] 武沐,冉诗泽.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J].民族研究,2022(1):110-125.
- [3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G].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 [34] 高祖贵.“两个大局”基本内涵与相互作用探究[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2):26-36.
- [3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21):4-35.
- [36] 吴志成,李佳轩.全球和平赤字治理与中国的责任担当[J].国家安全研究,2022(1):137-164.
- [37] 王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与理论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22(4):64-70.
- [38]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4-9.
- [39] 施琳.差异、差距与不平衡发展——兼论引起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因素[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96-99.
- [40] 吴志成,刘培东.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J].国际问题研究,2020(4):20-41.
- [41] 肖晞.全球安全倡议的中国贡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0-13.

[42] 任琳. 全球治理赤字与治理体系新态势[J]. 人民论坛, 2023(12):28-32.

[43] 习近平.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2-24.

Research on the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Change on a Scale Unseen in a Century

WANG Wei, LIU Zefe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resilience thought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it is a survival instinct and spiritual quality that has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long history. The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embodied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the temperament of 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 self-esteem and self-confidenc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pragmatism, and an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On the one hand, the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rmed by the structure composed of soft shell and solid kernel. The tradition of integrating the famil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highlights the centripetal advantage of the whole, and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in the ethnic relations circle consolidates the lasting core of civ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rmed by the orderly adjustment of functions. The means of famine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unified country creat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the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inheritance and education continue to cultivate the resilience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tempered, especially in the crisi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extinction of the species in modern times, and it is in this process that the common belief that the land is inseparable, the country cannot be chaotic, the n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and the civilization cannot be broken is manifested, and it is cast into the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day, in the midst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times and history, the global peace deficit, development deficit, security deficit and governance deficit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is regard, we must look into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world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strengthen resilience. Grasp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toughness source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toughness function. Based on the two overall trends of the times, actively change the resilience strategy. Only by seeking stability in the midst of change, seeking victory in the midst of stability, constantly strengthening the tension and stress of resilience, and not fearing any risks and challenges can we truly create a peaceful and stable environment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hange on a scale unseen in a century,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eficit, resilience

责任编辑:赵 超

引用格式:杨睿智. 治理体系韧性: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J]. 探索, 2024(1):53-64.

治理体系韧性: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

杨睿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韧性在文化观念场景与学术话语场景中形成了既联通又相异的丰富意蕴,就后者而言,韧性已经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概念,指向特定事物应对外部风险的适应能力。以政治学视角对韧性进行理论化的加工与透视,有助于探知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深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解。在系统梳理与有机整合政治学视域的制度韧性研究、政党韧性研究、国家韧性研究、治理韧性研究的基础上,在政治学对国家治理议题的知识建构与核心关切中,在韧性概念的基本内核与通约理解的前提下,可以明确将国家治理体系韧性的基本意涵界定为: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行敏捷适应和有效规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与优化的能力。从对概念的澄清出发,一方面,基于韧性呈现的情境与韧性呈现的要素回答“韧性何以识别”,基于所有可持续国家治理体系的普遍性质明确“韧性何以定位”,基于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与国家性、行动体系与政党韧性、价值体系与韧性精神的交互关系探究“韧性何以生成”,进而实现对治理体系韧性的理论化阐释;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发展困境、技术变革风险、群体关系危机、价值多元挑战、体制内部腐化、外部环境骤变与国家治理体系“冲击—应对”的互动,解析治理体系韧性的实际运作过程。

关键词:韧性;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风险挑战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053-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22},“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2]410}。这些重要论述蕴含着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议题与核心关切——国家治理何以实现可持续?更具体地说,国家治理体系具备何种特质与能力才能顽强生存、逆势成长、永续发展?立足“两个大局”交织激荡下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置身治乱交叠、极端多变、预期模糊的复杂时局,引入韧性这一形式简约、便于理解、意涵丰富的概念和新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在因应时代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源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深化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认识。

对韧性的理解与把握可以置于两个场景之中。其一是在文化观念场景中对韧性加以解读与阐发。例如,韧性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品质,往往用来形容敢于面对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特质,以及对坚韧不拔之意志和百折不挠之刚毅的追求。于苦难中崛起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革命话语、斗争话语、赶超话语,在更高维度上拓展和提升了韧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研究”(21&ZD006),项目负责人: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研究”(2023YZD045),项目负责人:樊建新。

作者简介:杨睿智,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的文化意蕴。其二是在学术话语场景中对韧性进行概念化的加工与建构,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基点与核心。在现代科学研究中,韧性是多个学科概念图谱中的重要元素:在物理学领域,韧性是指物体在承受外部压力后的复原能力;在心理学领域,韧性是面对逆境时的适应与成长;生态学领域中的韧性概念影响力较大,其最早用于概括生态系统在受到冲击扰动后恢复平衡状态的属性^[3],并逐步延展至对人类社会系统的分析之中^[4]。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学视角下的韧性概念发生迭代与演进:第一代是“工程韧性”,强调系统尽可能小的波动和变化,并迅速回归初始状态;第二代是“生态韧性”,强调形成新的稳态和缓冲能力;第三代是“社会—生态韧性”,认为韧性不仅仅是对系统原始状态的复归,还强调系统在应对压力时通过适应、调整、学习和创新实现持续发展^[5]。生态学的研究对于其他学科理解和把握韧性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综合来看,文化观念场景的韧性为学术话语场景的韧性概念提供了言说的背景与资源,而就更为重要的学术话语场景的韧性概念来讲,不同学科的理解具有一定的通约性,即韧性多在逆境的情景中展现,强调特定系统对风险挑战的适应与回应,进而确保自身结构和功能在冲击中得以可持续地存活与发展。

本文首先回顾和梳理政治学视域的韧性研究,对其中的分散化理论资源加以整合,尝试在政治学视野中对韧性概念进行学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将韧性聚焦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明确韧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特质与基本能力,从而实现韧性概念的理论化界定与阐释。由此结合政治实践特别是中国政治实践的丰富样本,研究韧性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动态化的展开过程与运行机制,以期在理论分析与现实实践有机耦合中挖掘韧性概念在政治学视野的核心意蕴,进而深入探析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提供国家治理议题的政治学新知识。

一、政治学视域的韧性研究

尽管韧性概念长期以来并没有在政治学中得到像在其他学科那样的系统性“开发”,但就韧性概念的通约理解来看,其与政治学一直聚焦的诸多基础性问题具有极高嵌合度与亲和性。政治学长期以来极为关注“政治系统是如何设法在稳定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的”^[6]²⁰,强调政治系统或国家治理体系“应能够适应变化,使自己适应条件,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内部结构,并变换自己的基本目的”^[7]⁹⁰,而能够不断适应挑战和环境的变化并作出适当调整在本质上来讲是治理体系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8]。这样来看,这些政治学的经典议题和独特观照与韧性概念的精神内核是相贯通的,将韧性视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重要能力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据。因此,最大限度地梳理和提取带有韧性意蕴的政治学理论资源,有助于在政治学视野中精准界定韧性概念。回顾过往,相关理论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 制度韧性研究

与制度韧性相关的研究具体在两个论域展开。一是西方学者对所谓“威权韧性”的论说。随着民主崩溃和民主质量低劣化现象的涌现,西方学者对西式民主转型范式进行反思,对“威权政体”的存续进行讨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较早提出威权韧性的概念,他认为权力交接制度化、政治精英晋升机制的变化、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专门化以及政治参与制度等因素,提高了“威权政体”的适应性^[9]。此外,选举特别是地方选举^[10],议会的运转^[11],国家的强制能力、发展能力、社会嵌入能力和学习能力等因素^[12],也有助于强化威权韧性。威权韧性概念看到

了非西方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和耐挫力,但其“民主—威权”的底层逻辑仍未摆脱敌友意识和意识形态色彩。围绕这一概念则没有对其涉及的各项制度加以全面关照和整体探讨,也缺乏就这一概念对发展、公平、治理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13]。二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制度韧性的探讨。在原因层面,李君如指出,中国的制度韧性以国家治理结构为基础,以历史文化积淀为根,以执政党先进性为关键^[14]。在内涵层面,辛向阳以“植根人民、抗风击浪、海纳百川”对中国的制度韧性加以刻画^[15];田旭明认为,原则性和边界性、灵敏性和适应性、抗压性和耐挫性是中国制度韧性的主要表现^[16]。在效能层面,姜辉指出,中国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韧性与活力,对创造“两大奇迹”具有重要意义^[17]³⁰⁴;张树华等人认为,中国之治以制度韧性推动了政治文明形态的发展,制度韧性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既能抵御环境的挑战与冲击,又能够实施高质量、见成效的政治治理,还能够解决公共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实现政治稳定^[18]。

(二) 政党韧性研究

亨廷顿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政党韧性一词,但他关于政党与政治稳定的研究包含许多与之有关的观念和理论分析。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强大的政党要求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群众支持;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强有力的政党制度一要能够通过制度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二要能够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参与政治,进而防止政治动荡^[19]³³⁶⁻³⁵⁰。在这里,亨廷顿强调政党的动员力、组织力、吸纳力和制度化能力,点出了政党韧性的基本要素。就中国而言,“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20]⁹⁶,使得政党韧性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更为集中、更高形态的展现:一是斗争性,这起始于内心的自主性,体现为持久性,最终呈现为斗争目标实现的复原性;二是适应性,表现为灵活性和吸纳性;三是牺牲性,这是最神圣悲壮的特性^[21]。此外,改革开放为观察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提供了新窗口,这一论题尤其得到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青睐。例如,李侃如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中国社会日益活跃和分化,便通过调整党的结构和政治程序来理解社会和经济的需求,并作出有效反应^[22]³⁴⁰;裴宜理指出,识别和吸纳新的社会力量、形成有效管控机制和运用历史传统中丰富的象征性资源,为党的韧性创造了能量^[23]¹⁻⁶;沈大伟比较了苏共和中共的执政过程,认为后者注重自身的调适性和灵活性,着力通过自我反省、调整和实施改革追求长期执政^[24]⁵。

(三) 国家韧性研究

围绕国家韧性展开的相关研究主要形成了三种分析进路。其一是历史分析进路,从国家变迁演化的长时段脉络与具体化史实入手,在历史的深处找寻国家韧性。例如,周光辉等人以“大一统”研究为切入点,认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具有长期维系、不断重建的国家韧性,而国家韧性是在荒政与教化中展开的,故而通过对“荒政与韧性”“教化与韧性”以及“体制变革与韧性”等论题的讨论对国家韧性加以具体剖析^[25]。其二是田野分析进路,侧重于从田野调查中获取启发并以此为据建构国家韧性的概念。例如,徐勇团队提出“韧性小农与韧性国家”的命题,认为中国小农虽然脆弱,但能够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特别是在各种压力下表现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等特性,“韧性小农”为国家形态的演进及其对危机的应对提供了延续和稳定的机制,形塑了中国的特性,即“韧性国家”^[26]。其三是比较分析进路,基于不同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延展国家韧性的概念尺度。例如,任剑涛从政治变迁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韧性并非仅限于转型国

家的场景,而是具有扩展意义,原因在于国家自我维系的先天倾向会使其具有明显可辨的国家韧性,维持国家的低点韧性抑或支持国家持续发展的高点韧性均体现出国家的韧性特征,同时国家韧性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进取型与惰惰性两种类型^[27]。

(四) 治理韧性研究

王炳权指出,政治学的治理研究涵盖治理意涵的本土化诠释、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建构和多维度治理经验剖析等方面,其中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国家治理有效性、国家在面对剧烈环境变动时的治理适应性成为重要论域^[28]。这些论题的精髓要旨在相关研究中被凝练为“治理韧性”“韧性治理”,并在相关成果中得以展现。一是国家治理韧性。俞秋阳从宏观视角出发,认为国家治理的韧性是在感知、回应、调适和处置国内外风险中体现的,这些风险包括社会层面政治反抗的垂直风险、执政力量团结问题的水平风险、新兴工具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和治理体系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外部风险^[29]。赵玉丽聚焦中国治理过程,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策实验、选贤任能的官员管理制度和协商式社会治理体系,是中国形成国家治理韧性的重要条件,展示出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活力^[30]。二是社会治理韧性以及更具体层次的治理韧性。姜晓萍等人将治理韧性置于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特定场域中,认为调适有度是社会治理韧性的本质,权力限度、结构密度、价值温度与目标精度是识别社会治理韧性的维度,并指出授权赋能、社会凝聚、共同富裕、敏捷治理等举措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韧性^[31]。此外,基层治理韧性^[32]、城市治理韧性^[33]、社区治理韧性^[34]等也得到了阐发。

二、治理体系韧性的理论阐释:何以识别、定位与生成

综合审视政治学视域的韧性研究,并将韧性置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架构之中便可以看到,“国家”构成了政治学中韧性研究的中轴概念,“制度”“政党”“治理”等则是韧性研究的关键概念与重要支撑。相较而言,作为国家的意志和活动的具象化呈现,以及作为容纳了“制度”“政党”“治理”等基本要素的整合性框架,“国家治理体系”的定义更为清晰,它现实地体现为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主导、国家治理行动体系和价值体系与之匹配、紧密相连、三位一体的系统^[35]⁷⁷,能够作为统摄政治学视域韧性研究的核心概念。根据这一认识并立足韧性概念的基本内核与通约理解,可以尝试对政治学视野中的韧性概念作出界定:韧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遇挫、应对与成长,即特定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行敏捷适应和有效规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与优化的能力。根据这一基本界说,可以从如何识别、如何定位、如何生成三个维度对国家治理体系韧性进行理论阐释。

(一) 韧性何以识别:韧性呈现的情境与韧性呈现的要素

韧性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各种风险挑战促动下能够得到清晰画像的,或者说韧性需要识别,它在国家治理体系置身各种风险挑战的特殊情境中才得以呈现。就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风险挑战而言,从属性上可以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风险挑战。同时,特定属性的风险挑战可以继续细分,如政治领域的风险挑战可以分为国家认同、统治权威、政策贯彻、大众参与、政治整合、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危机^[36]⁸⁰⁻⁸⁵。从主体上看,可以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国家治理运行和资源配置主体中的风险挑战。从形式上看,可以分为“外部冲击+突发式”“内部冲击+突发式”以及渐进式等类型的风险^[37]^{xxxiv-xxxv}。相较于学界更为注重理论思维加工,政治家

则侧重于对治国理政中的风险挑战加以详尽列举。例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要“准备吃亏”并列举 17 条困难,涵盖国内外舆论压力、军事斗争失利、战争、政权合法性、党员队伍散落、党内出现悲观心理和疲劳情绪、天灾流行、经济困难、暗杀活动、党的领导机关出现分歧、缺乏外援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事等方面^{[38]387-39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进入了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并具体分析了政治安全风险、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经济发展风险、科技安全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生态安全风险、生物安全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面临的风险等问题^{[39]25-151}。

在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下,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从隐性到显性、从潜能到释放,具体展现为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敏捷适应”,即国家治理体系迅速、敏锐、灵活地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行自我调适。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带来的挑战,中国加快多方面的适应性改革,积极推动关税制度、汇率制度、金融管理制度、贸易法律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系统性调适,促进中国经贸体制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进而较好地化解深度融入世界带来的外在大压力,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40]13-14,167-169}。二是“有效规制”,即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行有力规约、管控和处置,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动态稳定。“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41],也是有效规制的最佳效果。三是“自我成长”,即国家治理体系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提升对风险挑战的理论认识和应对能力,具体包括增强前瞻预见性、补齐制度短板和优化应对方法等方面。例如,疫情治理过程中暴露出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短板,因而中央提出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对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优化完善^[42]。“祸兮福所倚”“多难兴邦”“化危为机”,便是说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化不利为契机,在主动自省和查漏补缺中实现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

(二) 韧性何以定位: 可持续国家治理体系的普遍性质

韧性不是哪一类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性质,而是所有可以存续的国家治理体系拥有的普遍性质。这一点的重要例证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国家治理体系未像对方预期的那样在风险危机中快速瓦解。一方面,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呈现出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结论是“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43]124}。同时,资本主义又“垂而不死”。如胡乔木所言:“对世界形势则多着重资本主义总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而没有或很少想到相反的情况。革命(包括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由高潮转入长时期的低潮,而资本主义则转入强大的攻势,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所始料不及的。现在必须面对现实。”^{[44]694}对于这一现实,有的观点基于“两个决不会”,将之解释为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发挥出来;有的认为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府推行了若干缓和矛盾的举措;有的主张“缓一缓”,规避理论回应,先把社会主义自身的实力搞上去。总的来讲,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尽管不断丧失着历史合理性,走向衰败,但还在一定时期具有一定的韧性。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喧嚣一时,不少人预测中国会在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历史变动中崩溃。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以具有强大

韧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45]22},从而在成功化解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进程,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果回应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担心和忧虑,创造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真正捍卫、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显示出比较优势,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风险挑战的考验,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极大扭转,中国的治理体系愈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良政善治的重要参考。综上所述,界定韧性必须首先跳出“威权韧性”先入为主带来的偏狭和遮蔽,进而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与比较中明确韧性不是某个特定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定性质,而是所有实现自身存续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普遍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要赢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更广泛的优势,获得更强韧性是一个基本目标和重要基准。

(三) 韧性何以生成:国家治理体系基本要件的动态成长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内容是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同时包含着与制度体系密切联系的行动体系 and 价值体系^{[35]78},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便在这三个基本要件与诸多因素的互动中生成。

首先,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对国家性的有效维护,是国家治理体系韧性的重要前提。约翰·内特尔(John P. Nettl)最早提出“国家性”(stateness)的概念,国家性并非国家本身,而是根据不同指标、不同维度测评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们对国家基本属性的设定。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成为“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在实践中也可以看到,软弱或失败的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源^{[46]xviii},因而“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依旧是如何维护‘国家性’这个最根本的问题”^{[47]5}。国家性具有诸多面向,制度体系需要对其基本点加以维护与强化,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提供前置要件。一是“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即列宁所说的由“武装队伍、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组成的暴力制度坚强有力^{[48]28},进而能从根本上管控风险挑战的强力冲击。二是行政制度是有效的,为政府推行治理风险挑战的各项政策提供基本框架。三是税收制度是有效的,能够通过具备高度公共性和法治化的机制汲取收入,以支持各类国家治理主体参与风险防控。

其次,国家治理行动体系中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具有韧性,是国家治理体系韧性的重要支撑。政治权力主体与公民权利主体的双向互动是国家治理行动体系的实质^{[35]77},而执政党一方面主导国家政权运行,另一方面组织与代表公民权利对接国家政权,从而成为国家治理行动体系的运转中轴与核心力量。因此,作为国家治理行动体系中心的执政党是否具有韧性,与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具有韧性高度关联。执政党的韧性是其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思想体系、政策和策略体系在应对风险挑战时综合表现的高度凝结,包括组织体系兼具对内的高度整合力和对外的紧急动员力;制度体系高度稳健,确保自身建制和政治活动在风险情境中规范化稳定运行;思想体系能够以现实利益状况为根据,持续供给感召和团结各方力量的价值和愿景;政策和策略体系具有高度适应性、灵活性、艺术性和耐挫能力,基于历史方位和具体形势推行应对风险挑战的有效方案。总的来讲,执政党的韧性是支撑治理体系韧性的关键板块。

再次,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对韧性精神的涵化,是国家治理体系韧性的深层次基因。从中国传统来说,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基本思想体系的总纲,“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刚中”“及时”“通变”等元素构成了一个以刚健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则体系,作为其具象化表现的文物、制度、风俗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例如,愚公、大禹以及无数中国的脊梁构成的文学人物形象,青松、翠竹、红梅、苍鹰、猛虎、雄狮、奔马以及雄浑的石刻、边塞诗等文学艺术题材,以推动社会变革为旗帜的历史运动,等等。这些已经熔铸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49]23-30}。从一定意义上讲,以韧性精神为生命气脉的中国文化传统,既是历史中国治理体系延续五千年文明、促成两千年大一统的深层缘由,也是现代中国治理体系能够在历史劫难中破土建构、在内外交困中站稳脚跟、在改革转轨中处突应变的重要根源所在。由此来看,将韧性精神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内核与文化基因,对于治理体系韧性的形成具有重要助益。

三、治理体系韧性的现实展开:体系与风险的互动过程

治理体系与风险挑战的互动是韧性的现实运作过程与实际存在方式。具体而言,国家治理过程中凝集的各种风险挑战会对治理体系形成冲击进而触发治理体系韧性的启动,包含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价值体系的治理体系对这些冲击的应对则构成韧性的运行机制,其间的互动会从结果意义上揭示治理体系特定强度与梯级的韧性(见图1)。以下将围绕图1所展示的治理体系韧性的现实过程展开分析,并结合政治实践特别是中国政治实践对韧性加以动态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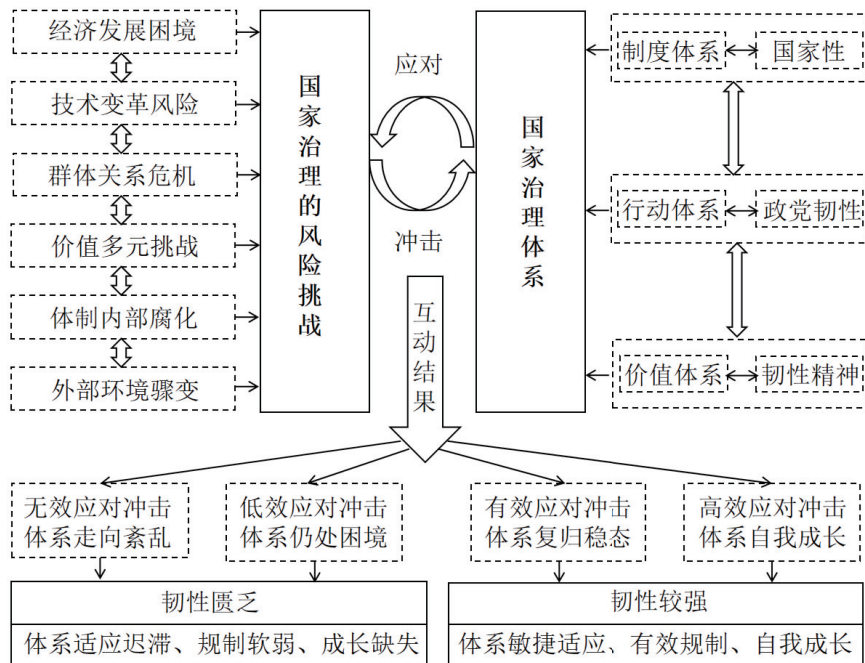


图1 治理体系韧性的现实展开过程

(一)韧性的触发机制:国家治理的基本风险挑战

各种不利情况、严重威胁、重大危机汇聚为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风险挑战,这些风险挑战构成了呈现治理体系韧性的基本情境与触发机制,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六个基本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困境。国家的活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促进经济发展是现代国家的一项核心职能,“经济化国家”的提法进一步凸显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即履行经济职能成为国家活动的主导形式^{[50]39-43}。这就意味着经济绩效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有效性的重要维度,经济绩效不

彰会侵蚀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支持基础和信任基础。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同样面临一定的经济发展压力:从外部环境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多边体系面临危机,世界经济在疫情短期冲击与深层次矛盾纠缠中持续低迷;从内部环境看,以往在劳动力成本、人口抚养比和产业结构等方面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而培育新动能和新增长点需要时间。中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的同时,也面临一定压力,需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二是技术变革风险。技术变革带有“天使”和“魔鬼”两副面孔,既可能为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提供重要工具,也可能对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个人发展等方面造成负面效应。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本身及其带来的后果具有政治意义,对暴力与秩序、统治与服从等根本性政治问题,以及社会分层、政府管理、组织架构和民主治理等基础性政治问题具有深刻塑造力。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全面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其颠覆性影响为国家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例如,大型数字企业使得政府监管感到“大而管不了”“多而顾不上”“快而跟不了”“深而看不透”“新而读不懂”^[51],它们还介入和分割了原来由政府负责的公共事务,并重构了法律纠纷、舆论生态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和样式。因此,如何化新技术冲击为新技术红利已成为检验治理体系韧性的重要因素。

三是群体关系危机。不论是荀子提出的“人之生,不能无群”,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强调的都是人的社会性、群体性。在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个人构成阶级、阶层、种族、族群、民族、党派、教派和各种社会团体等不同群体。防止这些群体内部和其间的矛盾冲突向群体关系危机转化,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挑战。以中国社会分层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有力推进,所有制形态变动,利益关系重组,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学家结合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分析,指出中国已形成若干阶层,并认为一段时期以来,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差距,客观上造成群体关系的紧张和摩擦^{[52]265-271}。由此来看,一个国家治理体系要想实现动态稳定和协调发展,就需要建立社会整合机制、矛盾调处机制与稳定合理的社会分层秩序,防范群体关系危机的发生。

四是价值多元挑战。人们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的丰富多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更加进步、开放和包容的体现。但价值多元化超过必要限度会使人走向放纵失度,导致维系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松散甚至崩解。当下西方以自由民主为内核的治理体系出现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价值多元化趋于无序化、无序化。国家治理体系健康运转的重要条件是整个社会共享基本的价值理念。这一条件如果缺失,必然导致共识瓦解、身份撕裂、群体冲突和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相互否决。从中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社会思潮并存,怎样在持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同时,能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党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挑战^{[53]284-291}。

五是体制内部腐化。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所导致的体制内部腐化是世界公害,严重的体制内部腐化会肢解政治生活的公平正义,危害行政管理的健康开展,污染经济生活的运行规则,败坏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最终侵蚀和消解国家治理体系的存在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剖析了新时代之前的形势,指出“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1]4}。新时代对腐化问题的强力纠治,反映出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自我规制、自我成长的强大韧性。

六是外部环境骤变。资本的全球扩张使得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54]404-405}。这一格局随着后发国家的追赶和崛起逐渐发生变化。近年来,世界“东升西降”趋势不断凸显,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导权和控制力相对衰落,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一变动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兴衰起伏,变与乱交错、危与机共存成为所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处境。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东方大国承载着百年屈辱的历史悲情,也拥有着恢宏盛世的历史记忆,再一次历史性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这一局势中的西方阵营对中国不断进行围追堵截和极限打压,而且这一既定政策可能会升级而不会松动,任何妥协也无济于事。因此,外部环境骤变无疑是现阶段对治理体系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巨大考验。

(二)韧性的运行机制:国家治理体系的“冲击—应对”

韧性的运行机制和现实样态呈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对各种风险冲击的应对,二者的互动或频繁或零散、或明朗或晦暗,塑造了现实政治实践的重要场景。对于这一动态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更为具体地把握。

一是“应激源”的出现与韧性的启动。卡尔·施密特指出,政治是从截然不同的人类活动,如宗教、经济、道德以及其他各种对立中获得动力的,它描绘了不同领域矛盾和对立的尖锐程度^{[55]154}。这一观点揭示了政治领域之于其他领域的独特性:当一个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无法在本领域得到解决,或者说它们尖锐到一定程度时,便会超越自身而向政治领域汇聚,转为政治问题。从这一意义上看,当经济发展困境、技术变革风险、群体关系危机、价值多元挑战、体制内部腐化和外部环境骤变等各领域的问题无法实现自主解决时,就会逐步传导到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层次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韧性运行机制的“应激源”和“启动器”。

二是“三要件”的应对与韧性的展开。其一,国家性的获致、国家建构的成功是治理体系韧性的根本,实际上也是政治发展的核心维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要件,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能否有效维护国家性,对于国家治理体系韧性具有最根本意义。其二,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是国家治理行动体系的核心主体,因而执政党的韧性,即其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思想体系、政策和策略体系应对风险挑战的综合性能,会有效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其三,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极强涵括性和支配性的精神因素集合,国家治理价值体系深刻塑造着特定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理想追求和道德习尚,将韧性精神深嵌于价值体系之中并使之成为重要支柱,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汇聚更为主动、更为勇毅的精神力量抗击风险挑战。

三是“应激源”与“三要件”的互动结果。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指出,历史进程表现为社会生活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历史发展最终呈现为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结果。国家治理体系与各种风险挑战的互动也遵循这一法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不同性质、不同烈度的风险挑战交互渗透,形成指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冲击力量;另一方面,国家性与制度体系、政党韧性与行动体系、韧性精神与价值体系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韧性的生成来应对风险。这些来自不同向度的力量在特定时空中交织、周旋和斗争,终而呈现为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国家治理体系韧性匮乏,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时适应迟滞、规制软弱,也基本无法实现自身的成长和优化,最终或是无效应对、走向紊乱,或是低效应对、仍处困境;另一种结果是国家治理体系韧性较

强,敏捷适应各种风险挑战并加以有效规制,最终或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复归稳态,或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学习、反思和优化实现自我成长。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对韧性概念在文化观念场景与学术话语场景中的意涵进行论说,着重对学术话语场景中围绕韧性概念形成的知识地图进行勾勒,以厘清其在不同学科中具有通约性的基本要义。在此基础上,系统回顾政治学视域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而尝试在通约性理解和政治学视角的结合与平衡中对韧性概念进行界定,明确韧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质与能力,具体指向国家治理体系的遇挫、应对与成长,从而根据这一概念界说与基本定性对韧性的识别、定位、生成进行理论分析。在韧性概念得到理论化阐释后,以国家治理体系与各种风险挑战的互动为中轴,挖掘政治实践特别是中国政治实践的鲜活事例,将韧性从理论的深处引向现实的场景,着力从运动的、过程的、发展的角度分析韧性的触发机制与运行机制。总的来讲,韧性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为国家治理研究拓展新的维度,能够有效回应政治学研究中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命题与关切——国家治理何以可持续,即治理体系何以自我维持、抗击风险、自我成长、永续发展。

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探讨还会产生理论溢出效应,为百年变局中不同国家治理体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思考理路,为阐释中国的治理体系过去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以及当下和未来怎样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挑战中继续取得成功延展思考空间。对于进一步深化政治学视野中的韧性研究而言,可以从澄清某些关键性术语的意义开始,然后转到一些基本的经验问题,再进行规范分析,最后转向具体的政策问题。也就是说,澄清韧性的概念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未来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和细化韧性的分析层次与问题域,并将之“沉降”到更为具体的问题上,形成丰富、流畅、综合的理论框架,进而有助于更为有效地把握国家治理可持续的内在机理与演变逻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1):1-23.
- [4] BERKES F, ROSS H. 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3 (1):5-20.
- [5] FOIKE C. Resil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3):253-267.
- [6]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王浦劬,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王沪宁. 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8] 王绍光,唐磊. 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强的国家能力——王绍光民主研究访谈录[J]. 政治学研究, 2023(5):72-81.
- [9] NATHAN A J.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3(1):6-17.
- [10] GANDHI J, LUST-OKAR E. Elec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1):403-422.
- [11] GANDHI J, PRZEWORSKI A.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autocrats[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

- ies, 2007(11): 1279-1301.
- [12] SLATER D, FENNER S. State power and staying power: infrastructural mechanism and authoritarian durabi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1): 15-29.
- [13] 张长东. 混合型政体与威权主义韧性研究[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5): 36-41.
- [14] 李君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韧性[N]. *人民日报*, 2015-06-12.
- [15] 辛向阳. 韧性彰显生命力[N]. *人民日报*, 2015-06-12.
- [16] 田旭明. 韧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特质[J]. *求索*, 2022(2): 28-35.
- [17] 姜辉. 旗帜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18] 张树华, 王阳亮. 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世界贡献——兼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 *世界社会科学*, 2023(2): 62-74.
- [19]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刘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21] 吴波. 韧性: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4): 21-30.
- [22] 李侃如.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M]. 胡国成, 赵梅,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23] 阎小骏. 中国何以稳定: 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4] 沈大伟. 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M]. 吕增奎, 王新颖,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25] 周光辉, 赵德昊. 荒政与大一统国家: 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J]. *学海*, 2021(1): 5-13.
- [26] 徐勇. 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建构: 路径、特性与贡献[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1(1): 4-13.
- [27] 任剑涛. 扶危翼倾与踵事增华: 政治变迁中的国家韧性[J]. *探索与争鸣*, 2021(4): 35-52.
- [28] 王炳权. 政治学治理研究的反思与前瞻[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5): 19-30.
- [29] 俞秋阳. 治理的韧性分析及其理论重构: 基于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视角[J]. *湖南社会科学*, 2020(5): 44-50.
- [30] 赵玉丽. 中国国家治理“韧性”研究的分析与展望[J]. *理论月刊*, 2020(5): 37-47.
- [31] 姜晓萍, 李敏. 治理韧性: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维度与效度[J]. *行政论坛*, 2022(3): 5-12.
- [32] 唐皇凤, 王豪. 可控的韧性治理: 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J]. *探索与争鸣*, 2019(12): 53-62.
- [33] 吴晓林. 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的形势研判与韧性治理[J]. *人民论坛*, 2021(35): 56-58.
- [34] 汪超, 宋纪祥. 新安全格局下社区韧性理论本土化的建构路径[J]. *探索*, 2023(6): 67-79.
- [35] 王浦劬. 国家治理现代化: 理论与策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36] 鲁恂·W. 派伊. 政治发展面面观[M]. 任晓, 王元,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 [37] 贾雷德·戴蒙德. 剧变[M]. 曾楚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 [38]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3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40] 江小涓. 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41] 习近平: 收放自如 这是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EB/OL]. (2020-04-01). <https://www.12371.cn/2020/04/01/VI-DE1585733639948849.shtml>.
- [42] 习近平.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2-24.
- [43]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44] 胡乔木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5]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6]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 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 郭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
- [47]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48]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9]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 [50]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51] 江小涓,黄颖轩.数字时代的市场秩序、市场监管与平台治理[J].经济研究,2021(12):20-41.
- [52] 李培林.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53] 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5]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Governance System Resilienc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National Governance

YANG Ruizhi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Resilience has formed a rich connotation that is both connected and different in the cultural concept scene and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cene. As for the latter, resili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that has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disciplines, pointing to the adaptability of certain things to cope with external risks. Theoretical processing and perspective on resil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can help explor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the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party resilience, national resilience and governance resilienc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core concern of political science on the issu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on the premise of the basic core and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we can explicitly focus the resilience in the field and context of political science o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define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resilience as follows: The abilit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to adapt and regulate risks and challenges with agility, and to grow and optimise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Starting from the clarification of concepts, on the one hand, answer “How to identify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resilience and the elements of resilience, clarify “How to position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universal nature of all sustainabl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explore “How to generate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state-ness, action system and party resilience, value system and resilience spirit. Then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oughness is realized. On the other hand, it analyses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ilemma, the risk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crisis of group relations, the challenge of value plurality, the internal corruption of the system, the sudden chang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resilienc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risk and challenge

责任编辑:赵超

引用格式:颜德如,张爽.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系统化运作及其提升策略[J].探索,2024(1):65-78.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系统化运作及其提升策略

颜德如,张爽

(东北大学 政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要:从政治系统来审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其具备系统的整体属性和运作体系,组织力表现为系统内外各要素有机结合的整体力量。在政治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下,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的复杂多样易引发组织力的滞后困顿,出现组织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以独特的政治优势规范了“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运作流程,通过与内外部环境的多维互动和功能互补形成反馈闭环,构成一体化的循环链,由此决定了持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解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运行工作,其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面临内外部因素共同刺激而导致的领导力弱化、凝聚力式微、执行力失范和服务力缺位之困境,组织力水平尚未达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性目标要求,这进一步倒逼农村基层党组织从各个环节入手构建提升组织力的有效策略:政治系统“输入”环节调动“党性—结构—民意”的整合性,政治系统“转换”“输出”环节激活“集成—巩固—共生”的驱动性,政治系统“反馈”环节释放“价值—功能—制度”的交互性。上述策略统筹保障组织的系统化运作及其组织力整合后的正向提升,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实践遵循。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系统化运作;提升策略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065-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矢志不渝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1]52},并从内、外两个维度对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进行了全面部署。“欲筑室者,先治其基”^{[2]13}，“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2]14},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指明了新方向并提出了新要求,“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问题也由此得到学界的广泛探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3]68-69},这进一步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的优势与力量所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国家与乡村社会联系的重要载体,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其组织力的强弱将直接关系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关系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实现。但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现状不容乐观,软弱涣散等问题仍制约着组织功能的发挥。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需要系统分析其面临的软弱涣散困境并全力破解,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综合效能,为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基金项目:教育部主题案例库项目“以‘五治’结合的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振兴——以沈阳市三地的实践探索为例”(ZT-211014507),项目负责人:颜德如。

作者简介:颜德如,男,博士,东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爽,女,东北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当前学术界紧扣时代性和政策导向性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聚焦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研究则大多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现实背景,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涵为始点,围绕组织力提升的经验与举措形成了阶段性研究成果。一是考察组织力的内涵界定方面。有学者基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国家治理与社会需求的纵向构架中发挥的作用,将其定义为“完成执政党从国家层面到农村社会自上而下嵌入过程中赋予的任务和使命”及“满足和帮助民众实现多样态的公共服务需求”的能力^[4];还有学者以“结构—功能—组织力”为视角,认为村级党组织的“各种结构要素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中生产并支持相应的组织功能,这些功能作用于村级党组织自身和外在环境而产生的效能,就是村级党组织组织力”^[5]。二是组织力提升困境方面。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组织涣散以及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等问题”^[6];另有学者从对组织力认知缺位、组织力与农村社会环境的变迁不适应、农村基层党建制度与实际契合度不高等方面剖析了组织力弱化的成因^[7]。三是组织力提升路径方面。学者集中于宏观的治理层面,如着眼于政治、组织、人才、机制等维度探索突破路向,围绕“力量整合、组织整合、治理整合、经济整合”的多维整合同步提升组织力^[8];还有学者从“结构—过程—文化”角度探讨,提出优化组织结构、完善组织运转过程和党群互动过程、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与培育农民的政治心理等组织力提升的具体路径选择^[9]。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通过界定组织力、政党组织力和基层政党组织力的概念,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基本内涵与构成要素、现实困境及提升路径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但对于突出创新和系统推进等领域的整体研究缺乏现实关照,没有基于党组织这一政治系统同其生存的内外环境间的动态交互作用来分析部分和整体之间、行为与环境之间信息的反应与反馈关系。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定义不同带来内涵的解释维度、涉及范畴和目标定位的迥异,概念的多样性易偏离研究主体的基本特质。基层党组织本身是运行于基层社会之中的一个政治系统,并凝聚成一个主体协同的治理共同体,组织力是维系系统稳定的直接因素,如若将党组织的设置、建设与组织工作分散,会导致系统紊乱而偏离民生轨道。其次,导致组织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覆盖于党组织系统“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动态循环模式之中,仅以主观意向和客观环境来解释党组织组织力的困顿忽视了全过程的具体实践,需综合考量系统运作中“要求”与“支持”^①、“决策”和“行动”等各个要素与环境之间的交互性,以此探究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子。再次,组织力提升不仅要注重扩大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着眼于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也要重视党组织自身的调节能力,发挥集体行动效能,将自组织和他组织整合为一体,在“党组织—党员—群众”的网格化制度中发挥政治系统的正向影响力,这是疏通系统管理通道的前提要件。

基层党组织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建立起党组织之间纵向的制度化联系,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上下贯通的严密组织体系,同时也以自身为起点通过压力输入、输出、信息互通、再输入、信息反馈的复杂程序形成循环系统,离开了党的组织力,系统内的党员不可能凝聚起

^① 为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深层原因,故这里主要将“要求”视为环境输入的“压力”,暂不谈及“支持”因素。

来,系统的各项工作也不可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外部动员也无从谈起。党的二十大亦明确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一,政治系统论为深入剖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运转结构及其组织力的提升厘清了实践理路,搭建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系统分析框架。

二、系统论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整体属性与实践理路

系统论从政治发展的视角为政治生活的分析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释框架,农村基层党组织本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生态,系统论赋予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一种整体性效能,在“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实践理路中构建了提升组织力的整合性、驱动性与交互性的三大动态策略。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整体性分析

总结来看,组织力的概念有“能力论”和“合力论”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解方式。“能力论”无法全面界定组织力的内涵,且多与个人的组织能力混用。“合力论”将组织力视为一种对内和对外的双重能力的整体显示,将组织力划分为内聚和外溢两个维度^[10],内聚维度包括党员管理、组织优化两大任务,外溢维度包括整合社会、增加认同两大任务;还有从政治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组织力是政党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是一种在互动与反馈中产生的“关系力”,体现的是作为主体的政党对于外部环境或者政党自身各个构成部分的作用或影响程度,是政党能动性的体现^[11]。综合已有观点,我们认为,应从整体上来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它是通过整合系统各要素和调节政治行为对内外环境作出合理反应而展现出的整体合力,是一种以领导力统筹部署的系统力量,包括增强党组织引领韧度的领导力、促进党组织内外团结的凝聚力、锤炼党员政治品格纯度的执行力、提升党群关系温度的服务力,广泛融于党组织的各项组织化、结构化的工作中。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系统实践与整合理路

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属于政治组织范畴,并在统筹建设中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系统,现实生活中政党基层组织所具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特征,使得系统各个结构与功能处于相互支撑或相辅相成的状态,维持着紧密的联系。现代系统论的开创者冯·贝塔朗菲把系统定义为“处于相互作用中的各要素的集合”^{[12]35}。戴维·伊斯顿的一般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输入—转换—输出—反馈)将政治系统归结为“系统分析构成了其通贯整个复杂结构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13]7},并强调一个由环境包裹着的行为系统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并反过来“可能影响环境中的条件和行动”^{[14]36},且“系统之间的交换或互动,则被看作是系统之间以输入输出关系的形式出现的一种联系”^{[14]30-31}。结构功能主义则是该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认为任何现代政治组织和政治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结构”“正式的政治结构通常都履行多种功能”^{[14]61},核心在于探求系统构成部分及其运作机制。反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与组织力,立足于党的领导优势,同时由于存在执行主体、实施对象、运作范畴、结构功能等复杂多样的差异化因素,在“一体化”的组织系统中具有更加突出的政治功能和引领作用,实质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综合力量。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与内外环境进行着物质与信息等的交换,促使系统结构由量变

到质变,系统内部各要素与系统及环境三者之间存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嵌套关系,并对系统的整体性与有序性有显著影响。环境的刺激与压力是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产生的动力源泉,如果不能维持并强化内在组织力的稳定性,外部组织力也就失去了根本载体。在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中,反馈回路是增加系统有序程度和控制系统平衡状态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必须找寻系统“主回路”中的核心结点^{[15]360}。可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系统稳定以内外输入模式的“要求”或“支持”为基础性前提,能够以组织结构将“党性”与“民意”整合起来保证各个单元之间的良性运作,继而从系统整体出发,以实现多元主体互惠共生的目标,保证“转换—输出”环节的畅通,为做好反馈工作提供重要支撑点,促使政治系统在价值、功能与制度的交互中推进组织力的系统提升。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力是其内外各个方面有机结合而成的一种整体力量。组织为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面对环境的干扰或压力,同时又反馈于环境乃至改变环境。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以期建立一种能使人们为实现集体目标履行职责的组织结构能力,如何有效提升组织力直接影响到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基于系统论分析基层政治生活的整体动态过程,系统是由多个具有适应性的单元或机制以复杂的构成方式和结构相互连接或动态协调形成的互联型网络。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能够在“红色单元格”的联动机制中实现信息互联互通,能够模拟政治系统各个环节对环境作出反应,通过汇聚“党性—结构—民意”的整合性、“集成—巩固—共生”的驱动性和“价值—功能—制度”的交互性的策略,使得系统在信息输入和输出层面都呈现千变万化的处理方式;经过对信息要素的时空整合,在信息反馈中实现多元互动,形成基层党组织系统的整体合力。较之于西方政党制度失灵和治理失效频发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组织建设中显现出政治系统的独特优势。根据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的多元性、关联性、整体性等特性采取一系列系统性举措,这些具体措施又自成系统,每一个系统环节都是正向迁移、层层推进,促成了强化组织的长效发展机制。

三大动态策略揭示了党组织从形式上建立互动调和机制和从内容上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内在功能。一个运作良好、成熟稳定的基层党组织只有发挥好自己应有的功能,才能将周围环境对政治系统造成的压力进行外向疏解,实现“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渠道的畅通。随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传统的干预已经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要求,应通过自我调节与环境系统形成良性互动,在相互调适中达至平衡。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的组织力困境及其运作逻辑

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的动态转化与有序运转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系统支撑,但在实践过程中会出现现实短板,需进一步精准研判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组织力面临的困境,梳理系统的运作逻辑,以确保构建起合理有效的提升策略。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的组织力困境

党的十九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在内生性激励与外源性支持下不断提升。然而,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及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内政治生态系统面临的多种挑战等因素,制约了党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和组织力量的系统强化。

1. 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弱化

领导力是党组织引领正确政治方向、组织一切工作、统筹各种资源及要素的根本力量,也是农村党组织在重大关头能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还包括思想上的引领,表现在宣传、教育、动员党内干部及党外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上。如今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期,时代要求党组织以政治领导力强化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党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也是当前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的首要任务,但部分农村党员综合能力偏低及政治思想意识淡薄等因素极易造成政治系统“局部空转”,构成政治领导力“韧性断裂”的潜在风险。

一方面,由于农村党员流动性较大及政治能力整体不足难以保证基层党组织的“双面覆盖”(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这就间接地削弱了政治领导力的效能,在城乡政策的限制效应与城乡经济势能的刺激下,农村人口的结构转移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面临“空心化”困境。沉淀在农村社会的知识人才渐次转移于城市,村庄中务工人员不断流出,留守农村的大多为缺乏参与意识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部分农村党组织逐渐成为以年长体弱、受教育程度较低等群体为主体;政治系统由于缺乏中坚力量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积极性。此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纾解农民生产生活困难及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具有权威性,但老龄化组织队伍政治能力有限或发展动力不足、创新意识薄弱和缺乏灵活性等易引发领导不力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仍存在政治思想意识淡薄的情况,党内集中教育次数有限,组织学习不深入,且一些党员应付了事,基层党组织形式主义、痕迹主义的倾向明显^[16],这就无法呼应群众需求,影响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因此,需强化组织学习,以系统的多维互动促进党组织领导力的切实提升。

2. 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式微

凝聚力是党组织凝聚共识与巩固政权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激活基层党组织活力与战斗力的必然要求,但部分党组织内部运作机制不完善影响了党组织的公信力,进一步削弱了组织系统的内生动力,使得组织凝聚力的提升逐渐显现出“虚无化”与边缘化趋势。

当前,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部运转由于规范化不够催生了形式主义问题,存在“沉默干部”“基层闲人”等现象,加重了干群间的疏离感。也有调查反映出群体性上访事件大多与“群众对党员干部侵吞集体财产的猜疑有关”^[17],这表明基层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缺乏对话机制,难以形成有机衔接,在组织运作过程中未形成规范的常态化制度,引发了一些党组织的公信力危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党组织增强凝聚力的有效实践,但社会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弱化了农村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生动力,导致公共文化缺少实践主体与实践场景,公共文化从整体走向分散,一些公共文化活动忽视了农民主体具有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丧失“公共性”的实质,让群众对党代表人民利益产生怀疑^[18]。这会使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和满意度得不到保障,阻碍党组织嵌入农村社会结构的互动渠道及其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会削弱组织系统的内部凝聚力。

3. 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失范

执行力是党以织密组织体系为重点实现自我革新与推动发展的能力,是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延

伸至基层的重要抓手,要求党组织以务实创新的主动意识切实执行,但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监管工作中存在“一刀切”等失范行为,制约了政治系统的规范化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缺少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党就将陷入危险境地。”^[19]但一些村级党组织系统内部的纪律需进一步加以规范,对党员的管理、教育与监督存在“宽、软、松”的问题。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而言,扶贫项目的接续推进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这赋予农村基层干部一定的资源处置权,若资金监管不力则易引发惠农助农、土地征收等领域的吃拿卡要、以权谋私等失范现象,这迫切需要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加以整治。

近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执行力问题。然而,在贯彻落实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即在执行上级政府的各项政策指令时,受到以人际关系紧密熟识为基本特征的地方性社会因素影响,下级政府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进行落实,导致实际执行过程及结果偏离政策初衷^[20]。

4. 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力缺位

服务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密切党群关系与提升治理效能的能力,党组织的服务力建设在农村治理的转型中不断强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部分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制度体系和任务落实机制缺乏科学性,责任边界不够清晰,容易陷入“越位”“错位”的局面。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责任主体之一,其政治功能被稀释,具体表现出治理职能定位与基层治理实践存在偏差、服务空间界限及内容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当前少数基层党组织干部存在边界不清、岗位职责不清晰的问题,服务活动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谋求便捷有效的公共服务缺乏持久性与深入性,无法有效落实党建工作的责任,不利于基层党组织功能的长效发挥。与此同时,在当前部分基层“指尖负担”的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面对上级繁重复杂的任务指标及固定限期,易产生越俎代庖和服务内容“僭越”的不良现象,这不仅会加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成本,也会背离为人民办实事的服务初衷。从党群的互动关系来看,当前仍存在工作方法单一和灵活性不足的现实短板,党群之间缺少面对面交谈的机会,难以以执政党的“服务力”真正温暖民心,需明确岗位职责,不断增强服务实效。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的组织力运作逻辑

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是把组织领导力、凝聚力、执行力和服务力要素看作是有机联系构成的结构、层次和功能相统一的有机整体。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整体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当前农村社会面临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此消彼长的现实难题,影响了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稳定的治理秩序和良善的治理风气。因此,分析并揭示系统中每一个核心要素的整体状态,以及内部诸要素间呈现的复杂的逻辑关系,以呈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要素相互贯通、各环节依次衔接的运行规律,从而保持系统自身的平衡状态。

系统与风险是并存的,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来说,当系统接收到来自内外环境的刺激效应,即组织接收各种“要求”而受到压力,进而调节内在机制以对这种“输入”作出回应时,这时来自环境的信息输入提供一种负反馈(组织力困境),系统可能会产生偏离目标倾向性。为接续系统的适应性需求,就需要组织者以“转换”过程“输出”相关决策和行动,构建新的动态系统机

制,控制系统沿着既定目标演化,更准确而迅速地达到预定目标,并将反馈 I 信号再输入环境,继续形成以反馈 II 为回路的系统循环。基于对系统控制与响应体制及其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有效回应信息的负反馈,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构建新的策略以提升党组织系统的组织力,运作机制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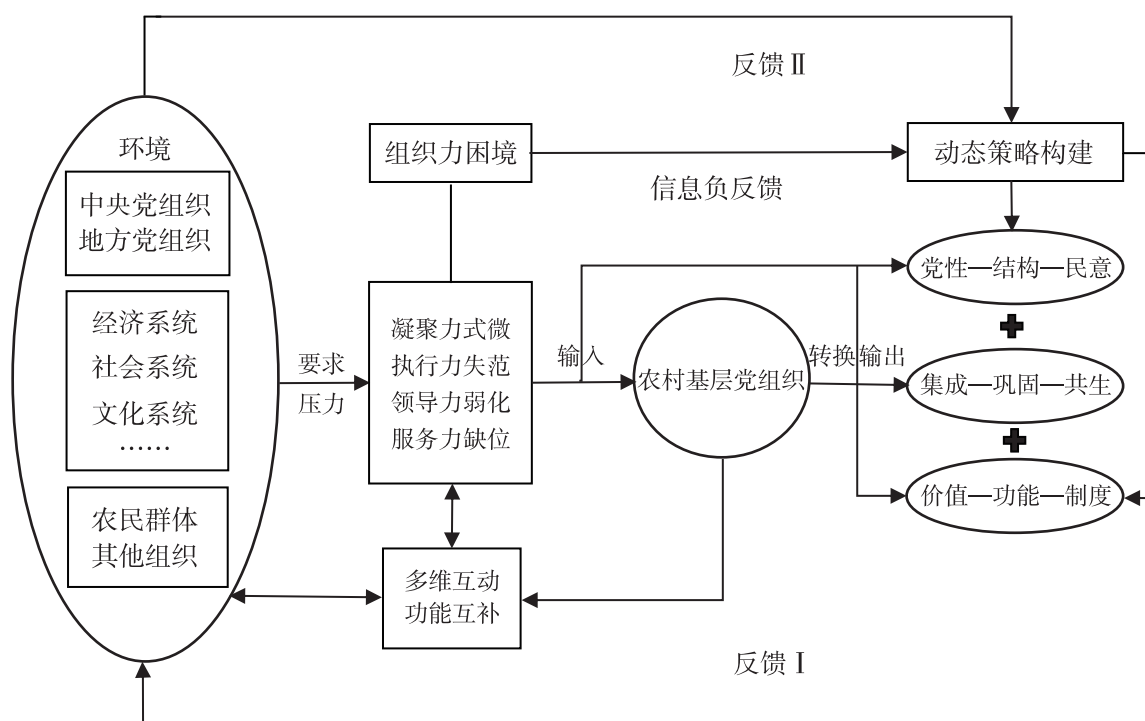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运作系统

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是对党组织组织力实际运作模式的一种精确化描述,其中的动态化系统是对压力作出反应的整体性发展过程,也是破解党组织组织力困境的出发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系统运作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内核,织密基层组织之网络,这一系统网络具有分层的特定结构,通常包括输入层、转换层和输出层等,每一层的元素不仅可接受上一层信息的输入,且该层元素将输出给下一层的各个环节,并形成反馈路径;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闭环系统,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系统化运作是与决策有关的、旨在探寻困境出路的互动行为,是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的具体体现,为自身组织力的系统性提升提供了契机。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策略

系统的功能不是单个组成信息处理功能的简单叠加,因各个成分之间的连接方式和强度不同且具有可塑性。按照系统理论,系统的组成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是内部结构合理化及整体功能最优化的必要保证。

党的基层组织是“神经末梢”和“最小单元”,是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所显现的状态变量总是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在内外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面临领导力弱化、凝聚力式微、执行力失范和服务力缺位的困境。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应坚持联动机制,厘清自身职责定位,突破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屏障与壁垒,打破利益藩

篱,合理组织和有效协调各种力量,鼓励各要素间通力合作、协同共进。通过构造一个多维互动与功能互补的动态系统,以完成系统内外各单元间信息的接收、传递和处理,最终破解制约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阻碍因素,把农村基层党组织筑牢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坚强战斗堡垒。依托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综合性、效能性与动态性等主要特征,这一动态系统在结构上以政治系统的不同环节为突破口,形成“党性—结构—民意”的整合性、“集成—巩固—共生”的驱动性、“价值—功能—制度”的交互性三个子系统的三维立体组合方式而维持其完备性。

(一) 政治系统“输入”环节调动“党性—结构—民意”的整合性

政治系统在环境输入发生作用之前处于初始状态,以特有的执政理念与执政体系维持静止的均衡状态,“输入”环节意味着系统内外的环境变迁等现象对政治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输入”作为概括性变量,主要包括“要求”和“支持”两类,是压力的关键性标志和系统发展的动力来源,是系统有序运作的前提。这一子系统考虑了组织系统的环境、主体与结构,内外输入的双重模式意味着基层党组织要以整合思维从内锤炼党性修养、从外沟通民意,并合理设置党员队伍结构,拓宽党组织的双面覆盖,从源头破解提升组织力之“密码”,见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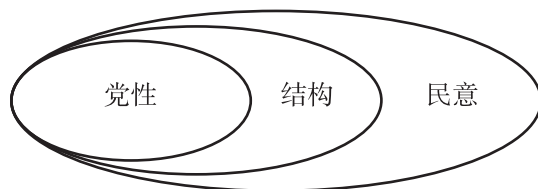


图2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整合性系统

第一,锤炼党性修养是提升基层党组织自我革新力与激发党组织领导活力的内在要求。先锋最有号召力,模范最有引领力。基层党员干部作为基层社会的“主心骨”,党性是作风的内在修养,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征,只有在实践中锤炼坚强党性、练就过硬作风,才能以自我革命的勇气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宣传、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将作风建设一以贯之地落实到位,推进党内集中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助力党员干部勇于自我剖析,补足精神之钙,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中得到严格的党性锻炼,充分激活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此外,扎实开展纠正“四风”和作风纪律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双创双服”^①,激励党员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扎根基层,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政治领导力。

第二,优化组织结构是密切党同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支撑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21]134}因此,组织建设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需要适时调整组织结构。一要严密组织体系。构建作风优良的组织体系要聚焦“村弱组强”问题,从权责关系、管理模式入手,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强化村级党组织整合统筹社会资源力度及覆盖基层社会各领域各群体的能力,夯实党

^① “双创双服”即创新创业、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旨在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进人民福祉。

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持续推动“两个覆盖”工作扩面提质,推动党组织向乡村产业链条、基层治理网格、工业园区、重大项目等重点工作领域延伸。二要选好“头雁队伍”。解决人才瓶颈制约以增强党组织对农村社会阶层的政治领导力,2021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将“乡村人才振兴”^[22]纳入党委人才工作总体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人才振兴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一方面,要紧抓村“两委”换届契机,注重从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先进群体中选拔基层党员干部,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本领精、致富能力强的人才队伍,当好“民情联络员”,搭建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另一方面,要强化人才培养和交流,通过搭建基层党员交流互动平台,积极推动上级政府部门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农村基层挂职锻炼,有针对性地举办常态化主题培训,通过输入新知识和新技能提高干部的专业化水平,提升干部的综合业务能力。

第三,畅通民意渠道是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立足点。公民的政治能力和参与显著影响了政治系统的效能及合法性^[23]²¹³。群众的参与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层党务组织性的强化及基层政治系统的秩序性。农村基层党组织从体察民意中实现国家权力的持续再造,激励农民有序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在反映民意时也运用公共权力将民意输入政治系统,这决定了党组织内外统筹协调与联系群众的整体能力,又激发了群众参与系统有效运作的内生动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环境“输入”前,既要研究系统内部机制,又要分析外部条件,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导向,打通党群双向互动的链条,保持与群众的信息互通,这要求党组织利用新媒体等畅通建议反馈渠道,积极推进党务公开,确保党群信息互通,为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如实行“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党员接单、社会评单”一站式服务,构建“大门常开、活动常办、服务常抓、群众常来”的党群服务圈,擦亮群众的“幸福底色”,持续提升党群服务的中心功能,充分保障农村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表达权,进一步获得政治认同。

(二)政治系统“转换”“输出”环节激活“集成—巩固—共生”的驱动性

政治系统的“转换”与“输出”环节是一个整体性的动态演化与推进过程,党组织将接收到的“要求”或“支持”转换为“行动”,即党组织发挥自主功能执行系统任务,实现需求、资源的合理吸纳及内在转化,按照系统的运作规律科学地输出“决策”和“行动”等,从而引导“转换”与“输出”环节的有效衔接与正向推进,这是维持系统均衡状态的核心环节。这一子系统依照系统的状态、特性、过程与结果等随时间尺度变化的演化性而构造,需要从系统的全过程出发协调各个程序与阶段,促进政治系统的集成、巩固与共生,为党组织组织力的综合提升提供驱动力和灵活性,具体见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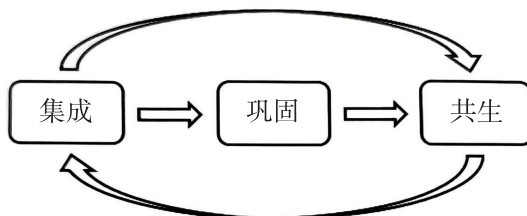


图3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驱动性系统

第一,构建集成式的“转换—输出”思路。系统观念是我国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下重要的思维范式与实践范式,形成了一种综合集成方法体系^[24]。集成式转化是党组织沿着既定目标

和行为逻辑发挥统筹、协调各主体、要素与领域,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注入新的活力,破解系统内部的散乱难题。基层党组织要发展必须立足于广泛的社会基础与足够的民主资源,以集成治理模式实现党建参与社会和社会参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强化政治系统的内聚性与稳定性。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在纵向的政府管理体系与横向的社会开放系统之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联结功能:一是自上获取持续生长的内生动力,以“嵌入—整合—重组”的主导模式建立起稳固的基层政权体系;二是能够通过组织化机制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动力,发挥在村民利益表达、需求整合和价值观引领方面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必然要在国家治理能力与农民政治参与之间搭建桥梁,在政治信息传递中通过政治体制与权力运行的协调统一促成农民主动参与。

第二,贯彻巩固式的“转换—输出”理路。巩固是基层党组织集成式改革与共生型治理的衔接点,体现了政治系统运作的周期性与持续性规律,加快了党组织组织力集成优势向实践效能的转换,为组织力的提升提供了战略性支撑。毛泽东指出:“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25]6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权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稳固。”^[26] 新时代党在基层的组织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需从中汲取经验,不断巩固建设成果,激活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动能。一要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加强顶层设计,调动各类要素集中破解形式化问题,为打造坚强战斗堡垒提供内驱动力,确保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得到高质量落实。二要总结组织建设经验。定期召开党员生活会或主题谈论会,同时引导群众代表参加,听取各方的意见与诉求,及时调配工作岗位,修订党务细则,推进党组织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三要着手打造农村社会共同体。在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格局中凝聚农民共识,如通过创新多元化集体活动,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他们的认同感与主动性,面对基层社会冲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完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平衡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第三,坚持共生式的“转换—输出”目标。共生是指基层党组织推进理论共学、业务共进、矛盾共解的治理体系,是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现实导向。规范基层党组织与政府、社会、公众的关系,只有通过全景式的行动协作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才能使政治系统形成良性互动。坚持构建一核多元的主体协同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国家、市场、社会、群众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激发乡村社会活力。统筹推进乡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的发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以政治定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以自治增活力,提高农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以法治强保障,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以德治扬正气,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实现治理有效;以智治汇聚民力,补齐民生发展短板,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形成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共生型基层党组织。

(三) 政治系统“反馈”环节释放“价值—功能—制度”的交互性

“反馈”是党组织集合输入、转换、输出各环节中的信息而对压力的功能导向,这一环节构成“反应”“沟通”“再输出”的“另一个控制循环”^{[14]438},是对“转换—输出”环节的检验。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强化组织力,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优势,以功能优化指导“决策”调整,推动下

一循环的升级,“反馈”环节的高效运转直接决定了党组织对群众诉求的回应度和组织力的效能度。该子系统的设定立足于“价值—功能—制度”的交互效应以实现系统的动态调和;在价值引领向度上,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文化建设,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在功能优化向度上,通过加强创新与技术赋能等方面提升各项功能,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的发挥;在制度规约向度上,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党内规章制度,保障组织结构的稳定运作,具体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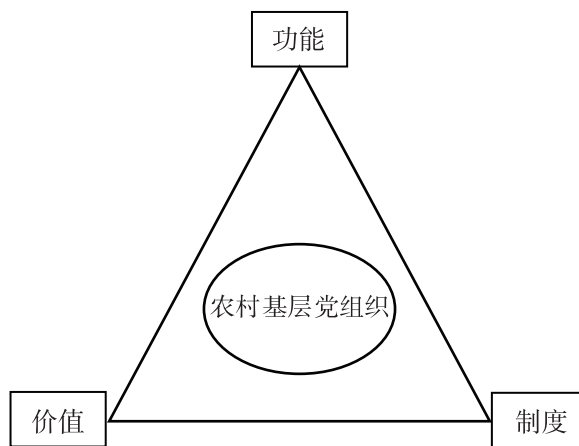


图4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整合性系统

第一,以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营造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塑造健康和谐的政治文化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诉求,针对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运转效能低下、凝聚力降低问题,需要以重塑和构建乡村文化价值体系来增强农民的政党认同。一是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有的放矢提供文化的个性化服务,运用村级党校、农村文化活动馆等平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惠民服务与农民生活的全过程,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落后思想的侵蚀,提高自身精神文化水平。二是加快农民集体主义精神的理性回归。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以强大的主导推动力向农民自组织提供各类优势资源,为农村合作社等其他组织的社员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支持,在促进农民利益合理分配的同时,以利益驱动强化农民的可持续性合作,帮助农民增加社会资本积累,进一步加强对党的信任度。

第二,突破技术壁垒实现功能优化以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针对组织困境的响应机制。通过技术对“五大振兴”进行全域赋能,拓展基层工作新格局。政治系统对政治信息进行处理需要利用定量技术以测定反馈的速度与真实性等,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中演变为“云组织”“云系统”,以5G网络为主导的新兴技术为党组织优化自身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与服务功能提供了新引擎。提升组织力要完善培训机制,通过技术培训、岗位轮转、职业提升等方式鼓励党员干部掌握更多智能化、信息化的先进技术,增进党组织组织工作的创新性;运用新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创新服务载体,赋能党组织服务平台的数字化升级,持续做好动态监测预警与帮扶工作,及时掌握农户的实时状态与生活需求,实现“智治+善智”的功能融合,提高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向新阶段。

第三,通过促进制度建设与实践效能融合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从建党伊始,

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注重制定相关党内法规制度来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保障。”^[27]近年来,在领导力上,“党建+政务”模式为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强基赋能,党在助力脱贫攻坚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确立“第一书记”的引领作用和确立“一肩挑”制度等均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规范。截至2022年5月,在全国49.1万个行政村(社区)中,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比例达95.6%^[28]。但仍有调查表明,大多数大学生村官不愿留在农村,因此需进一步完善农村党员干部的流动机制,制定相关的制度文件畅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干部流动渠道。在凝聚力上,通过强化农民外部监督作用促进农民的政党认同,健全党内民主、党务公开等制度,不断开辟农民参与民主监督的新路径,让关注社会公共事务和农民共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有更多机会对基层政府执行力进行有效监督,如建立完善“领导干部接访日”、监督热线、意见箱等多种方式,为增强农民外部监督作用提供制度安排。在执行力上,法治化与制度化优势揭示了从法律上完善内部运作机制的重要性,针对层级上的错位等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为基本方略,强化党内组织和法纪观念,准确定位党组织的权力与功能边界,完善党规,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纳入法治的制度框架内,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法规执行力。在服务力上,大力推进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着重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设计,明确各级责任分工机制,推进服务工作管理规范化,同时注重党员干部队伍的工作考核,明晰考核细则,将群众服务力和满意度纳入“先锋指数”进行量化考核,建立一套“多评多奖”的激励奖惩制度,并将考评结果与民主评议先进党员挂钩。

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在运作的全过程表现出多种性能,综合发挥多维功能,以消解领导力弱化、凝聚力式微、执行力失范和服务力缺位之困境。可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在反应与输出的反馈机制中不断产生控制循环链条,通过不同的环节调整策略,推动组织系统整体合力的提升。

五、结语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契合了当前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的时代主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领导力、凝聚力、执行力、服务力的协同推进下形成的多面循环系统,各种信息和程序多重嵌套、互相依存,是维系自身系统稳定运行的有效保障,更是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统筹发展工作的重要基础。在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发展脉络的前提下,立足于系统组织理论,疏通政治系统各环节的阻滞口,构造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策略:“党性—结构—民意”的整合性、“集成—巩固—共生”的驱动性、“价值—功能—制度”的交互性,这些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整体质量和水平更为全面、系统的综合反映,其统筹保障组织的系统化运作及其组织力的全方位提升,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实践遵循。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要将其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大视野中进行综合分析;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实践过程,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既需要理论做出回应,更需要新的实践中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横向上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力提升的一部分,纵向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农村基层组织力不断提升的逻辑延续;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提升的内容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会日益丰富,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价值追求会向多维度发展,技术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手段也会日益多样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 [2]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7-03.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4] 张瑜,倪素香.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升路径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8(7):53-59.
- [5] 尤琳,魏日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村级党组织组织力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22(1):122-129.
- [6] 郝宇青.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逻辑[J].行政论坛,2018(1):16-22.
- [7] 王同昌.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弱化成因与提升之径——基于“过程”与“主体”的分析视角[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5-18.
- [8] 张书林.新时代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动因、要义与路向[J].探索,2022(3):108-119.
- [9] 王可园.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困境及出路——基于“结构—过程—文化”视角的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25-32.
- [10] 杨洋.城市社区基层党支部组织力评价体系问题初探[J].理论与改革,2019(1):132-141.
- [11] 赵大朋,简皎洁.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涵与建设路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9(5):120-126.
- [12] 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 [13]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 [14]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15] 邱昭良.系统思考实践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16] 郑琦,陶周颖.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1):107-114.
- [17] 佟磊.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问题、成因及思路创新[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8(3):36-39.
- [18] 李俊斌,冉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论析[J].党政研究,2021(3):48-58.
- [19] 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N].人民日报,2019-07-18.
- [20] 钟海.权宜性执行:村级组织政策执行与权力运作策略的逻辑分析——以陕南L贫困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8(2):97-112.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2-22.
- [23]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24] 盛昭瀚,于景元.复杂系统管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新领域[J].管理世界,2021(6):36-50.
-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77.
- [26] 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0.
- [27] 张立伟.中国共产党组织演化的制度逻辑——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类党内法规发展述评[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6):77-87.
- [28] 周忠丽.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41-47.

The Systematic Operation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of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of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YAN Deru, ZHANG S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is a political system with the system's overall attributes and operational system, and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various uni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ystem is called organizational power. Under the analysis frame of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on the one hand,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system can easily lead to the lag and de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has standardized the system operation process of input-transformation-output with their unique political advantages, and formed a feedback closed loop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to form an integrated circular chain. Therefore, it is a dynamic system engineering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of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Deconstructing the leadership and operation of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still faces the dilemma of leadership weakening, cohesion fading, execution anomie and lack of service caus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real life.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power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systematic goal requirements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further forces the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 to construct the effective strategy which promotes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from each link: the "input" link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rouses the conformity of "Party spirit-structure-public opini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output" link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ctivate the drive of "integration-consolidation-symbiosis", the "feedback" link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releases the interaction of "value-function-system", so as to ensure the systematic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positive improvement of its organizational power after integration, and thus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PC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power, systematic operation, promot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王 慧

引用格式:商焜.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三重逻辑[J].探索,2024(1):79-89.

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三重逻辑

商 焜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深入发展,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不断科学化、体系化。为持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目标任务。总体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整体构建主要包括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具体而言,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要全党一体遵循的行为准则,即在坚持权力制约原则、党规严于国法原则和严格责任落实原则下制定授权性规范、责任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从而促进行为主体行使权力、实施行为的合规性。因此,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统筹推进各领域各环节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与此同时,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还应当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有机衔接。有鉴于此,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应当以保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追求目标,并遵循保持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政治逻辑、规范逻辑和系统逻辑的逻辑自洽和逻辑理性,从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优化内部结构与整体构建等现实命题。

关键词: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政治逻辑;规范逻辑;系统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079-11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更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活力的重要方式。“党的制度体系整体处于日益健全并不断强化中,从而把党的自我革命内嵌于党建体系的制度架构中,使自我革命一直具有稳定的制度保障。”^[1]在自我革命的方式上,自我革命主要包括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并且具有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相统一的特点;在自我革命的功能上,党的自我革命能够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能够通过制度规范发挥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作为党的建设新命题,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也表现出体系化和科学化的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有鉴于此,从理论层面探究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政治逻辑、规范逻辑和系统逻辑有助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优化内部结构与整体构建等现实命题。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等主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针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学术界形成了许多理

作者简介:商焜,女,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科学内涵。一是基于概念分析法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规范各级党组织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活动和全体党员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行为、由党的纪律和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称”^[2]。二是基于制度分析法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为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而对党组织及其成员进行规范、制约、协调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程序规范”^[3]。

第二,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形成渊源。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践基础上对自身的深刻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自省与纠偏,从而求得的自我超越与发展”^[4]。二是百年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经验总结的历史渊源,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制度形式树立起自我革命的伟大旗帜,为党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5]。三是新征程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渊源,即“党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等现象,进而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等一系列问题”^[6]。

第三,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内容。整体上可以概括为:“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7]⁶⁶;具体概括为党的政治建设制度机制、党的思想建设制度机制、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机制、党的作风建设制度机制、还有“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机制^[3],以及“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8]。

第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路径,包括“必须根据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践导向来形成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基本方略”^[9]。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制定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党的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协调配合^[10]等。

由此可见,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理论研究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展开,但针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理论基础与建构路径的阐释尚显不足。因此,对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政治逻辑、规范逻辑和系统逻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治逻辑: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源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等外部推动,亦源于相较于其他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内在优势。“党具有对时代大势进行前瞻性把握的战略能力、对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高度敏锐性和高超洞察力以及审时度势的政治决断力和行动力”^[11]。党为了保持自身先进性与纯洁性,需要根据时空环境的不断变化,以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

(一)立足“大党独有难题”的逻辑起点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自身独特的“大党独有难题”。从人数上看,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不仅超过世界上其他政党,而且相当于一个人口大国的数量。从组织分布看,党建立了涵盖中央、地方和基层的纵向党组织系统,横向上遍布了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业、高校、农村和社区等。在成员和分支机构数量巨大并不断增

强的情况下,党组织需要建立更为严密的制度来解决上级和下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存在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从组织和管理上看,“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7]5};另一方面,从思想上看,利益多元化使得人们思想多元化,因而带来党内统一思想的难题。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存在“小圈子”现象,部分党员、干部政治觉悟和思想意识参差不齐。由此可见,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制度规范,因而构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保障。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因此,唯有不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方能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才能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

(二)提炼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基本做法与实践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在党的建设中进行了探索并形成了基本做法。“党中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12]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应在总结党的建设相关做法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规律性与方法性的理论总结。

第一,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保持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继续破除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党内监督法规,从制度上保证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确立,能够为党的自我革命的开展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需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其中尤为重要是拥护“两个确立”并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作为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的根本指导原则,应体现于党的各项具体制度规定中。”^[13]新时代只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才能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通过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确立,能够为党的自我革命的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第二,以党内监督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党的自我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以党内监督的方式来预防和解决权力滥用、权力寻租等现实问题,从而有效监督党内权力的运行。党内监督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与重要保障。只有加强党内监督方可识别、反馈、预防和纠正自我革命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党内监督的方式有着较长的过程,经历“从革命时期的起步探索到全面执政后的强化、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化直至新时代全面加强党内建设的发展演进过程”^[1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完善党内监督机制来推动自我革命,主要表现为深化监督机构改革、创新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等形式以及党委(党组)全面监督、专责监督、职能监督和日常监督等体制机制。另外,为健全党内监督法规制度体系,制定或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从而保证了党内监督制度的系统性、规范性与科学性。截至建党百年,“中央党内法规 77 部,部委党内法规 57 部,地方党内法规 1 236 部”^[15],为推进与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加强反腐败斗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如果党在执政过程中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利益,就会丧失执政地位。特别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问題长期被忽视、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直接影响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以及对自我

革命的现实评价。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开展反腐败行动,又通过对反腐败制度规范的“立、改、废、释”,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的外在表现,反映了党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进一步清除党内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该决定明确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党建重要思想;2012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调查研究、会议活动、文件简报、出访活动等八个方面立下作风建设新规矩;2013年11月发布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于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公务接待、办公用房、会议接待等内容作了规定;2013年12月出台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作了规范安排;2022年6月出台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管理。这些规定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要求领导干部加强作风建设,也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需要。

(三) 坚持和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思想、组织原则和实践方法

从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来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需要有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及实践方法。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如何发挥制度效能以及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坚持和落实党的全面领导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总体部署,以及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从初步形成到成熟完善,需要遵循一定的组织原则和实践方法。

第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作为党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自我革命内容的系统分析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17]588}。因此,新时代务必坚持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理论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只有坚持该思想,才能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化权威。在实践中,需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融合,从而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各环节和全过程,才能确保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始终实现党的意志。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与调查研究的组织原则和实践方法。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问题导向的实践方法主要包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方法。“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8]161}我们要善于发现和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要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历史原因以及制度原因,把握好不同问题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主要与次要关系,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问题,并充分利用现实条件与优势,从而解决现实问题。

二是调查研究是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础与方法。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有助于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在调查研究中,要听取群众意见,创新运用技术调查手段,从而为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供一手资料与现实支撑。为保持调查研究的常态化,通过制度赋能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19]¹⁶⁵ 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重要原则,民主集中制贯穿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1+4”的基本框架中。一方面,要求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建设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内团结一致;另一方面,要求在党的决策和领导工作中集思广益。因此,需要把民主集中制落实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中。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建设中,既需要加强党中央、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又需要科学实行个人分工负责,从而科学构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三、规范逻辑:构建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的规范体系

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治理经验之一,依规治党是管党治党的基本形式。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需要党内法规具有规则科学、程序完善、配套齐全、运行有效的规范要求。因此,“用一种规范主义的方法来建构党的内部行为规则”^[20]逐步成为共识。规范主义推崇概念、规则、原则等形式化技术,可以构建系统和完善的制度规范体系,并可以排除制度规范以外的要素对制度规范功能产生的作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规范逻辑体现为“特定的名称、条款的表述形式、规范严谨的语言、‘总则+分则+罚则+附则’的体例结构等形式要件,以更高程度的形式规范性强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规范属性”^[2]。

(一) 注重基本概念生成与提炼

在“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基础中,创新地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相关概念,这有助于党的自我革命的规范推进。可以发现,随着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的深入开展,从理论上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概念进行提炼显得十分必要。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概念体系应由具有抽象性与整体性的类概念以及相关具体概念构成。

第一,基于党的整体制度体系提炼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相关概念。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国家法律等规范内容,因而部分概念的内涵具有相似性。如“党内规矩”与“党纪”作为党内法规的概念,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同样适用,但二者内涵与范围具有较大差别,“党内规矩”是党组织以及党员干部需要遵循的约束性规范,既来源于成文规范,也来源于社会道德、党内惯例等不成文规范;而党纪主要来源于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廉洁纪律、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等相关规定。在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党的政策文件上升为党内法规,并形成稳定的概念。当前,随着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可以尝试性提炼党的自我革命法律制度规范、党的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度规范以及党的自我革命党内规范性文件制度规范,以便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整体构建奠定概念基础和类型划分。与此同时,可以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作为事务内容的概念,并可以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等作为原则性概念。

第二,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特有表达方式。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条

例、规定、规则等主要是对党章和各种准则的精细化,因而可以被视为规则性党内法规。“其语言技术规范应尽可能与国家立法的语言技术规范保持一致。”^[21]在形式上,制度规范要把握“党言党语”和“法言法语”的衔接和界限,实现规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如“理想”“信念”“四个自信”等思想性党规的语言表述呈现理论性与抽象性特征;“战斗堡垒”“先锋队”“血肉联系”等政治性规范术语对于表达情境具有较高要求;“清白做人”“尚俭戒奢”“艰苦朴素”等道德性规范则体现动态过程,通过程度动词或副词来进行强调。“不论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今后的发展着眼,都不宜夸大特色语言的使用情况。”^[22]因此,构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应当意识到党内法规语言表达的特殊性。

(二) 注重基本原则的生成与提炼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要形成一定的基本原则来指导制定制度规范和规则体系。由此,在现有制度规范和规则体系的基础之上,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可总结为“三个坚持”,即坚持权力制约原则、坚持党规严于国法原则和坚持严格责任落实原则。

第一,坚持权力制约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开创了一种以党规党纪监督制约权力的新模式,“并建立保障党内法规实施的监督执纪机构,确保对公权力享有者、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23]。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一方面对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权力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实践中通过科层制的部门分布以及职责差异,能够实现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另一方面注重加强领导干部尤其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如《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强调领导班子成员相互监督、上级对下级领导班子监督、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巡视巡察监督、述责述廉等。因此,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现有党的自我革命制度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的现实问题,从而进一步解决腐败问题,并形成规范、完备和有效的制度规范体系,最终形成决策科学和监督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第二,坚持党规严于国法原则。党规严于国法,不仅是入党时党员基于信仰的坚定承诺,而且需要制定严格的党内法规制度。“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制度、党的监督保障制度方面出台一系列法规。”^[24]在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中,党规严于国法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要实现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更严格的规范,并可以对违反党内法规的党员进行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二是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中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即党内法规应遵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不得违反宪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及超越法律保留事项对于党员权利义务、党组织权责内容作出规定。在规范内容层面,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应以义务为本位。“以义务为本位是指义务在党规党纪中占主导地位。”^[25]在范围层面,为保障全党思想统一,党内法规对于党员的理想、信念做出规范;在行为规范方面,除了要求党员遵循法律法规外,还要对其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以及个人品行、家庭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第三,坚持严格责任落实原则。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落实。“从严治党升级为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升华。”^[26]当前,在实施党内法规的过程中,过度执行、执行不足以及选择性执行等情形直接影响着自我革命的进程。因此,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与执行需要严格落实执行责任制、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执行党内法规要

完善分层、分级的责任执行体系,并建立层层担责、环环扣紧的责任链条,从而为构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打下牢固的制度基础。对此,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应强化追责力度,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充分释放制度威力。“必须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27]550} 上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党内法规执行的监督机制,从而确保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程序严格和有效运行。

(三) 具体规则的完善

在规范的视角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确立了全党一体遵循的行为准则,促进行为主体行使权力、实施行为的合规性。在规范内容上,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通过设定党组织权力与责任、党员干部权利和义务、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措施与程序等内容,对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预测、评价与惩戒,能够确保在党内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7]66},为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规范化水平提供有力的规范支撑。

第一,授权性规范的完善。规范主义结构通过移除规范外来因素,预设了具体的法律命令规范性内容,以实现规则的裁判和控制功能。由于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各级党组织难以通过统一的立法立规来解决,因此党中央将部分立规权限基于特定目的有条件地转移给相关党组织。当前,授权性规范存在授权不足、授权监督机制不足、被授权主体能力不足等现实情形,这也将会影响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构建。“在此种背景下,立规活动应当注重遵循‘统分结合’‘粗细相宜’的立规思路。”^[28]由中共中央授权地方党委进行的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可以增强党内法规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规范性、以及法规实施的有效性,如“探索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党委党内法规制定权和程序机制”^[29]。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其不仅确定了不同层级规范的制定主体与权限,围绕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要求与层级目标来确定相关主体的规范制定权限,而且基于立规活动的实际需要针对具体事项进行专门性授权。对此,授权性规范也需要在合理范围内行使,并在保证各级党组织合法合规行使立规权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党内法规。

第二,责任性规范的完善。责任规定设置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影响着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责任性规范要素应包含责任情形、担责方式、责任承担主体、追责主体、归责依据等。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党内法规中的责任性规范显著增强。一是作为基础性责任规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自我完善制度规范、自我革新制度规范、自我提升制度规范等的责任性规范的关系应进一步厘清,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手段进行监督执行;并健全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刑事处罚等之间的衔接。二是在责任型规范的设置方式上,应借鉴“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结构,规定行为适用条件与法律后果,从而为相关党组织和党员行为提供透明的规则体系和详细的责任承担方式。三是责任性规范应遵循明确性原则,通过科学、系统的责任制定方式,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度规范的明确性。在设置党内法规责任条款时,可以遵循国家立法的相关规定,精准确定“依据”与“参照”、“不得”与“禁止”、“违规”与“禁止”等词汇的使用方式。四是并非所有制度规范都必须设置责任规范,对于较少涉及党组织职责、党员干部权利义务的,不设置责任性规范。

第三,程序性规范的完善。“既然党的政治领导权和组织领导权具有宪法效力,那就同样需要规范和制约。”^[30]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比较完善,未来除了要进一步完善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实体性规范外,还应完善相关制度规范体系的程序规范。一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制定程序。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起草、审批和发布均应依照《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及相关规范等程序,应确保规定制定流程严肃、规范,应防止主体泛化而损害制度规范的权威性、统一性。二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参与程序。深化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需要形成更为充分、广泛的协同参与机制。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应健全党员参与自我革命的方式、内容与程序。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协商制度等,确保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反映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三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评估程序。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制定和实施需要针对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评估。在制度规范制定前,评估机构可对其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在制度规范实施后,评估机构可通过数据搜集、走访调研等方式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完善相应的制度规范。

四、系统逻辑: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内部结构与整体构建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涵盖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等内容,并且是具有严密逻辑关系的完整系统。由于各部分和各元素相互融合,“系统因此呈现出不同于部分、要素的整体性特征”^[31]。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包括执行、监督、反馈、完善等全链条相互协作的整体运作过程,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若干主体制度及派生制度为支撑的制度规范体系。

(一)注重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整体构建

通常而言,系统主要由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要素或者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要在党的整体制度建设的框架下完善。因此,系统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规划纲要及年度计划,构建党内法规制度规范的整体规划,均有助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整体构建。具体而言,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内部结构和整体构建需要遵循党章为根本依据。

第一,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要建立在党章的基础上,从而统筹推进各领域各环节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作为党内根本性规范,党章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革命”的表述除了历史叙事与精神意志外,也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以党章为制度依据,在完善过程中全面贯彻党章中关于自我革命的相关规定,推动党章中的各项规定和要求细化落实到制度规范体系各个方面。

第二,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规范使得党的自我革命还应以宪法和法律为外部环境。“通过逻辑的手段,让各种得到承认适用的法的规则,结合成为抽象的法律原则的一种本身毫无矛盾的相互联系,并使之理性化。”^[32]¹⁸在宪法的叙事逻辑中,革命内涵不仅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人民战争历程,而且涵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革命的内涵逐步转变为推进国家和社会建设。“理解革命的具体内涵离不开现实的政治语境。”^[33]

(二) 优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内部结构

第一,在功能分化的结构中,基于“运作封闭”和“认知开放”的系统结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可以实现“运作自成一体”。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文本为系统媒介,形成了特有的二元符码,如“有效/无效”,借此展现系统特有的沟通方式,从而实现系统的自我指涉与运作封闭。换言之,在有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基础上,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形成稳定的自我革命行为规范化预期。事实上,系统的封闭运行往往依赖于要素的相互作用。在系统内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统一于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件体系之中,从而维持政治系统的运作封闭;而在认知开放的层面,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将环境中的“价值”通过“有效/无效”的符码转译并辐射于整个系统内部,从而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行。因此,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建构中,通过各部门各机构明确职责分工的基础上的协同配合以及系统外群众参与等因素的外部推动,从而形成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运行的强大动力。

第二,系统论认为,“系统论原理蕴含的整体优化、结构功能、差异协同等逻辑,将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系统和结构中,以更好地处理系统与要素、结构与要素之间的功能关系”^[34]。全面认识系统的结构关键在于客观分析系统属性及其功能。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本身是一个结构系统,需要紧紧围绕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要求与层级目标来确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建设主线。因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需要建立在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和有效运行的基础之上。从规范层次上看,党章对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事项做出权威规定,准则对党组织和党员自我革命的行为内容做出基本规范,条例对自我革命的具体事项做出规范;规定、办法、规则、细则对自我革命的具体工作做出程序规范、配套性规范、保障性规范。因此,增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建设要保证下位制度规范同上位制度规范相衔接。

第三,系统本身具有反思性。基于任务目标、功能作用、价值理念的共性,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要考虑党的自我革命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的相互融合。一是明确宪法和法律底线,保证各领域各环节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构建工作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宪法》《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法规为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法律规范,并成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法律制度基础。二是严格区分党内制度和国家法律针对党的自我革命行为调整领域,避免党内制度规范的重叠越位。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应加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衔接”意味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须在自我革命中保持各自的独立地位;同时,党内法规要推动国家法律对于自我革命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在从严治党过程中需要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基本要求妥善融入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则中。“协调”需要国家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规定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主要领域,从而减少二者规范重叠与冲突。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需要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联动的审查机制,并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内外协调,从而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形成提供有力保障。

五、结语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需要全党一体遵循的行为准则。在坚持权力制约原则、党规

严于国法原则和严格责任落实原则下需要制定授权性规范、责任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从而促进行为主体行使权力、实施行为的合规性。现有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领域。然而,针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理论基础与建构路径的理论研究尚显不足。由此,从政治逻辑、规范逻辑和系统逻辑出发来研究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富荣. 中国共产党坚持百年自我革命的逻辑理路与宝贵经验[J]. 甘肃社会科学, 2021(3): 31-37.
- [2] 吕永祥.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概念阐释——基于概念分解法的分析[J]. 理论探索, 2023(4): 81-90.
- [3] 唐皇凤, 熊红梅.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优化路径[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1-8.
- [4] 洪向华.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内在逻辑、动力系统与实践路向[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3): 1-11.
- [5] 周叶中, 闫纪钢. 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15-26.
- [6] 杨德山, 王渤飞, 李少杰.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党内法规制度路径[J]. 新视野, 2023(5): 5-11.
- [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8] 丁俊萍, 魏强.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践要求[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0-17.
- [9] 刘红凇, 胥壮壮.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内容结构与建构理路[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4): 45-53.
- [10] 张伟军, 蒋锐. 新时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要义与路径选择[J]. 探索, 2023(1): 37-52.
- [11] 唐皇凤. 新时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理论依据与战略路径[J]. 治理研究, 2018(3): 45-53.
- [12] 杨凤城.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底蕴、新时代实践与重大意义[J]. 探索, 2022(6): 26-32.
- [13] 陆卫明, 孙泽海.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价值、任务与路径[J]. 中州学刊, 2020(3): 14-20.
- [14] 刘红凇, 王贺宇. 以党内监督保障党的自我革命[J]. 理论探索, 2022(3): 5-12.
- [15]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N]. 人民日报, 2021-08-04.
- [16] 黄百炼.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1(3): 43-51.
-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0] 秦前红, 苏绍龙.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6(10): 50-66.
- [21] 管华. 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论纲[J]. 中国法学, 2019(6): 118-138.
- [22] 王伟国, 金成波. 党内法规特色语言论纲[J]. 法学评论, 2023(6): 1-13.
- [23] 杨建军. 权力监督制约的第三种模式[J]. 法学论坛, 2022(4): 61-74.
- [24] 郭定平, 梁君思.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四重逻辑[J]. 探索, 2020(6): 110-122.
- [25] 姚国建. 论“党规严于国法”的正当性及其界域[J]. 理论视野, 2020(6): 64-70.
- [26] 何克祥. 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宝贵品质[J]. 探索, 2022(2): 103-115.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28] 秦前红, 薛小涵. 授权立规的概念、载体与未来走向[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123-131.
- [29] 童彬. 党内法规制定权和程序机制研究——以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党委制定党内法规为例[J]. 探索, 2018(2): 127-133.

- [30] 陈云良,蒋清华. 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法理分析论纲[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3):46-56.
- [31] 李愿. 试论现代系统论对整体与部分范畴的丰富和发展[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03-111.
- [32] 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社会:下卷[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33] 张伟.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核心要义[J]. 社会主义研究,2020(1):60-67.
- [34] 赵嘉玲. 系统论视域下党的领导入法研究[J]. 系统科学学报,2023(4):90-95.

The Triple Logics of Perfecting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 Norm System in the New Era

SHANG Tian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Courage to carry out self-revolution i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and unique advan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depth, and the norms of the self-revolutionary system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and deeply promote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the report of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put forward the goal and task of improving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system. On the whol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system of norms and regulations mainly includes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s the fundamental, democratic centralism as the core,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enhancing the authority and enforcement of inner-Party regulations, and forming a mechanism for adhering to truth, correcting errors, discovering problems, and correcting deviations. Specifically,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regulation system needs a code of conduct to be followed by the whole Party, but also needs authorizing norms, responsibility norms and procedural norms formulate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power restriction, the principle of strict Party regulation beyond state law and the principle of strict responsibility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exercise of power by actors and the conformity of behavior.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system norms must adhere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s the fundamental, and coordin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revolutionary system norms in all fields and link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system should also form an organic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constitution,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n view of this,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 norm system in the new era should pursue the goal of ensuring self-purification, self-perfection, self-innov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follow the logical self-consistency and logical rationality of maintaining the political logic, normative logic and systematic logic of the self-r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 norm system to release solving the "big Party unique problems", the system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optimiz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the overall constructing of realistic propositions.

Key words: self-revolution, institutional norm system, political logic, normative logic, systematic logic

责任编辑:王 慧

引用格式:谢小芹.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成都市的经验观察[J].探索,2024(1):90-102.

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基于成都市的经验观察

谢小芹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1130)

摘要:城市治理逐渐向智能化、智慧化和敏捷性方向发展,同时不断融合绿色、宜居、包容等新理念。已有成果探究了美好生活的内涵、特征和建设路径,相对忽视了数字治理的生活维度,少有研究将美好生活置于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进程中予以详细分析。研究提出城市数字治理美好生活逻辑的新命题,重点揭示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美好生活逻辑的实现机制。城市数字治理嵌入居民微观生活实践中,并通过改变居民个体进而改善群体生活模式和生活经验。成都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美好生活的逻辑转向,并通过五种机制逐步推动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即通过政策设计机制实现高品质宜居引领市民生活方式变革、通过数字助推机制实现全链条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完善全领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服务进阶机制健全全周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托底与提升机制实现全覆盖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折射出居民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通过技术和社会的高度融合实现美好生活的建设,进而促进国家现代化。研究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城市生活治理新模式,拓展了城市治理中的生活维度,同时为相关部门建设高品质居民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启发。

关键词:城市中国;数字治理;美好生活;高品质生活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090-13

美好生活是古往今来人类共同追求的愿景,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向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46}近年来,新型数字技术被加速应用到城市治理领域中,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快速推进,并不断升级。新型数字技术让城市变得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的高品质社会空间。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美好生活逻辑。由此,笔者提出城市数字化治理的美好生活逻辑命题,将“美好生活”置于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加以考察,有利于拓展数字治理的研究视野,丰富城市数字化治理的理论体系。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美好生活的愿景不断出现在政府的文件和学者们的研究范畴中,美好生活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点词,指引着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以及学界研究的逐步深入。学界围绕美好生活问题展开了多个维度的探索,主要涉及“何为美好生活”“何种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何为”三个方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驱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效能提升机制研究”(22BZZ077),项目负责人:谢小芹。

作者简介:谢小芹,女,博士,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先,“何为美好生活”涉及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这一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亦有可追溯的历史。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莫尔幻想的“乌托邦”、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等都是对美好生活愿景的诗意表达,但这种空想式、乌托邦式的生活构想“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副没有阴暗面的现实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社会的现实而力求自己的理想”^{[2]166}。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理性的凯旋”和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经济增长和财富追求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在这一阶段,美好生活较为侧重“数量增长”。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众的价值观由过去强调物质福利和人身安全转为强调生活质量^{[3]9},有学者指出,美好生活是主体依据客观生活世界生成的幸福感受^[4],这种感受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多方面^[5],体现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自由自主的活动和劳动、全面而自由的发展^[6]。其次,“何种美好生活”强调的是美好生活的特征和价值追求,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四点。一是人民性。美好生活建基于“生活”需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7],让人民群众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8]。二是全面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多维面向,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三是高品质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有量的提升,而且要有质的飞跃^[9]。四是发展性。美好生活是一种以公共方式创造和实现的全面、自由且持续稳定与发展的生活,追求一种所有社会成员全面且自由发展的生活状态^[10]。最后,“美好生活何为”探讨的是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1],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根本特征和巨大优势^[12],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性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景并推动其持续生成的关键性力量^[13]。

已有研究对美好生活的内涵、特征和建设路径展开了丰富的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可探讨的空间。第一,在数字社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鲜有研究将美好生活置于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进程中予以分析,进而探讨城市数字化治理中美好生活的实践运行机制;第二,虽然学者们揭示了数字技术的特征、功能和治理绩效,且技术赋能赋权的双重功能已成为学界共识,但现有研究更多聚焦数字化治理的“技术之维”,相对忽视了数字治理的“生活之维”;第三,城市数字化治理作用于“美好生活”的实践机制亦有待进一步探索,这需要借助具体的个案研究来进行深度挖掘和剖析。

基于此,本文从生活治理的视角来研究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致力于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城市数字化治理中美好生活逻辑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数字化治理如何助推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更进一步,“美好生活”反映了怎样的国家治理理念和逻辑?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拓展城市治理研究的生活维度和数字治理的研究视野,亦为相关职能部门建设高品质居民生活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二、城市数字化治理的“生活维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型数字技术不断被运用到城市治理领域,技术正在给城市治理带来巨大变革。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智能城市与数字城市概念到今天提出的智慧城市,数字化治理正在深入推进。平台驱动、大数据助推、场景运用等成为目前城市治理的着力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当前

城市治理的重要价值目标,如何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换言之,美好生活逻辑已经成为城市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随着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乡土中国逐渐转变为城乡中国,城市建设的新提法和新思路不断产生,出现了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为目标的生态城市、绿色城市和低碳城市。而后随着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的发展,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建设逐渐兴起。2014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极大激发了地方政府建设智慧城市的积极性,助推智慧城市进入规模推广阶段。2016、2018 年《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的出台推动了智慧城市的标准化建设。浙江杭州开启“城市大脑”建设,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新范式阶段,即由原来零散的数字运用到建设中枢系统统一指挥与管理。之后“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等做法层出不穷。“十四五”规划提出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和城市数据大脑建设,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近年来,以增强城市软硬件系统建设为主要目标的海绵城市和韧性城市等新概念被提出。总之,城市建设理念迭代创新,城市治理呈现出一个前后相继的连续谱。

城市建设的系列规划和活动已经嵌入政策话语体系中并指导着城市实践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新型信息技术不断运用于城市治理领域,从而促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的独立成篇显示出我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信息、计算、通信、连接等数字技术的组合,触发实体属性的重大变革以改进实体的过程”^[14],由此推之,城市数字化转型则指“由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实体形态的结构性转变,覆盖经济产业、社会生活、政府治理等诸多方面的转型”^[15]。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属于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方面,彰显出信息技术时代城市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和敏捷性的新面向。

(二) 美好生活与城市数字化治理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对于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等方面的相关要求也不断提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2015 年 12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16]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17] 同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再次强调:“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18]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让更多人民群众共享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为实现美好生活而采取的城市治理行动体现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政策规划中,塑造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同时地方政府也紧随国家步伐,形塑出上下齐动、竞相发展的城市治理差异化实践格局,如各地致力于社区最美

空间打造、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旧城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等,这些都表明城市建设和发展越来越注重“人”的因素,注重人的健康、休闲、娱乐、机会等,可以说,城市治理的变化也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生活方式变革。政府积极介入居民的生活领域,通过城市治理活动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城市治理的生活意蕴。具体而言,治理中的生活意蕴指的是城市治理并非单纯地实现对城市的管理,更在于实现为城市生活中的居民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和全周期的服务。概言之,如何让居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视野中,基于美好生活逻辑的城市治理正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研究议题。近年来,新型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而成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居民寻求生活意义和追求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换言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美好生活逻辑。

三、美好生活逻辑下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机制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我们在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更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群众需求的高阶提升意味着什么,又会对城市治理带来什么样的全新挑战,本文将结合对成都数字城市建设实践的观察来回应上述问题,并在下一部分做更加深入的学理分析。

(一) 政策设计机制:高品质宜居引领市民生活方式变革

建设数字城市和公园城市,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对成都发展的新定位,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文明为引领、以幸福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核心要义,亦是在突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理念下将城市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努力促进生产、生活、生态相宜以及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的全景式系统,是人、城、景、业和谐共生的美好城市图景。围绕城市建设,成都市制定相关规划,开展系列专项行动。2021年2月,成都发布《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这既是对“十四五”规划关于市民美好生活蓝图的积极响应,也是新时代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为引领美好生活,成都市制定“生活、超大、理想”三步走社区建设之路。围绕数字城市和超大城市建设,成都市各个行政区积极谋划。2021年,天府数字城市建设启动,坚持治理和发展并重,以统筹推进、数据驱动、需求导向、赋能产业为基本原则,建设以城市大脑为枢纽、数据资源为核心、实体空间和数据模型协同映射的现代数字城市,同时结合打造“宜居、包容”城市,形成一条新型数字城市建设路径,以此推动城市管理、市民生活、社会治理的全方位变革。成华区依托“大联动中心”,构建智慧中心平台,搭建多元参与渠道,打造“智慧+超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强调技术和制度的深度嵌入和有机融合,与知识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韧性城市建设等有机关联,通过数据打通城市壁垒,实现数字共享,让新型数字技术助推高品质治理,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将城市塑造成鲜活的有机生命体。

(二) 数字助推机制:实现全链条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

数字城市建设的关键在于基于数据平台实现数字技术和治理事务充分嵌入和深度融合,通过搭建政务平台和融合新型数字技术等策略,将对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从传统科层制线性和单向度的过程演变为高度动态的、多维度和网络化的过程,最终实现全链条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

一方面,搭建政府数字平台,让平台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载体。平台是“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和作为用户活动发生的基础设施”^{[19]50},其本质在于提供一个统一的界面实现人、财、物等资源汇聚。数字平台指的是“政府、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利用基于互联网和各种终端搭建的平台网络来传递信息和服务,形成‘平台+用户端=服务’的运作模式”^[20]。上海“一网统管”、杭州“城市大脑”等技术集成平台就是典型的政府数字平台。这些平台有利于推动政务服务由传统的线性结构向网络式、链条式结构转变,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了很好的交流界面。近年来,成都市引入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各个行政区也相继设立了智慧服务平台。成华区在 2017 年 7 月成立智慧城市治理中心,该中心下设智慧城市建设科、数据资源管理科、网络理政科等 7 个科室,同时构建了“一个中心、三个平台”模式。“一个中心”指的是“智慧成华治理平台”,该平台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无缝隙的公共服务,通过平台的可视化功能提供透明的公共服务。“三个平台”指的是安全防控平台、政企互动平台和政民互动平台。安全防控平台重在提升预测、预警、预防能力,通过固定探头全覆盖、移动探头消盲点和高空探头抓重点等实现安全防控“零缝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政企互动平台意在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务服务环境,实现企业办事“零障碍”;政民互动平台偏重于提供便捷、智能、精细的服务,推动政府服务群众的“零距离”。成华区智慧城市治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针对群众办事‘热线多、办事难’的问题,我们整合全区 24 个部门服务热线和区长热线,启用统一的民生服务热线‘96966’,实现了‘一个电话找政府’。针对‘跑路多、渠道少’的问题,我们将市民服务功能融入天府市民云,居民通过手机 APP,动动手指即可轻松实现 543 项审批事项的网上预约、网上办理,同时也可随时了解办事流程、进度、提出意见建议等。”成华区初步建成“一网统管”的“城市大脑”,“城市大脑”下分交互层、应用层、通用支撑层和数据层四个模块。交互层支持桌面终端、大屏、便携移动端多种显示格式和交互方式。应用层主要指的是经济运行、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社会诉求等场景的运用。通用支撑层由数据服务、统一运行框架、视频资源服务和 GIS 可视化服务四部分组成。其中数据服务提供应用的数据接入能力及主题构建能力,统一运行框架包括服务总线、消息服务、报表图表、文件服务、界面集成服务等共性服务,视频资源服务实现对区(市)县已有视频资源的汇聚和共享应用,GIS 可视化服务统一使用天地图资源,提供二三维 GIS 可视化展现、多图层聚合表达和空间分析。数据层对接市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市)县智慧治理中心应用主题库与专题库。建成城市公共数据资源池和交换共享平台,逐步实行跨层级、跨领域、跨区域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总之,成华区以互联网、视联网和物联网为基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时空信息等为技术支撑,实现城市治理工作的运行监测、态势预测、事件预警、指挥调度、应急响应、决策支持等功能。

另一方面,新型数字技术的融合运用。云计算、边缘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型数字技术不断被采纳,实现了平台支撑下的各场景运用,确保了城市治理的全过程数字化。一是数字化推动了条块平台化运作,打破了条块阻梗,实现了“条条调动块块、条块互动”的友好互动局面。借助数字技术,城市治理提高了多尺度、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和综合协同能力,既可以实现从城市到社区的纵向协同,还可以实现政府多部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横向协同。新型数字技术的运用在深刻改变基本组织结构的同时,也强化了城市决策指挥的灵敏

性、集中性和中心性,进而提高了复杂系统的整体行动能力。二是数字技术的场景运用。成华区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一中心、三朵云”,即一个城市运营指挥中心,承载政务云、产业云和民生云,实现“三云”融合,统筹整合人口、法人、城市部件、地理信息、宏观经济、城市运行状态数据资源,打造统一、标准的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建立庞大的“平安工程”和“天网工程”,确保公众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成华区还建立警情、案情、民情、舆情协作干预机制,初步实现了城市运行的在线监测、分析预测和实时预警,服务成华经济社会发展。此外,成华区还利用区块链的组合技术以一站式、无缝衔接的方式满足人们各种不同类型的需求,通过简单的界面操作就能完成系列活动;通过分布式网络及时推动更多主体参与城市公共服务,从“一对多”转变为“多对一”;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保障节点成员的相对平等地位,确保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城市治理体系呈现出扁平化和分布式结构特征;O2O(线上线下)和P2P(点对点)技术可以促进技术、业务和数据融合,实时接收信息,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利用智能合约技术使规则自行运行,实现数据的全过程管理和可溯源性,减少了监督成本和时间成本。通过物联网技术对城市的井盖、垃圾处理站、花坛、路灯和燃气设施等进行实时监管,利用信息追溯技术进行物件溯源。总之,区块链技术有力推动了成华区城市治理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些新技术的运用大大提升了城市治理水平,同时也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简言之,新型数字技术的引入和充分融合运用,为城市总体层面的知识图谱构建及城市群体、个体层面的人物画像提供了可能,提高了公共服务的精准度、敏锐度和辨识度、政策调适的回应性和动态性以及主体协同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塑造出“千人不同、个性化服务”的公共服务和敏捷治理新格局。数字助推下的生活塑造面对的不仅仅是城市市场中单独的个体,也是生活在城市空间中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活主体。城市治理通过数字助推机制的网络化、扁平化和智慧化等实现了全链条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目标。

(三) 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完善全领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

居民幸福美好生活是个多维概念,涵盖了生活、生态、参与等多个领域,成都市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实现全领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

在共建方面,主要解决的是美好生活的根本动力问题,实现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建,形成城市治理共同体。在这方面主要是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政府号召居民、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最大程度参与城市治理,既有利益关联、情感动员等方式,也采取惯常的人情面子策略。此外,政府还开通留言板、政务热线等方式鼓励居民参与。正如一位社区书记所讲的:“刚开始居民不愿意参加,觉得城市治理跟自己没关系,属于国家的事。后面我们给他们多次做思想工作,也做了宣传,让党员同志带头,办法都想尽了,策略都用遍了,最后终于看到了成效。”解决了动力问题,接下来就要解决合作问题。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如何形成集体凝聚力、如何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也是很关键的。具体的合作方式有关键行动者引导、榜样带动、同频共振、友善帮扶等。某社区干部讲到:“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但我们的方法是多样的,有的是打感情牌,有的是搞利益说服,还有的是混合策略。办法各样,哪些有效果,就会采取哪些。”最后,如何构建一套基于合作基础上的责任共担机制也至关重要。一方面,延续市民文化、公共参与惯习和传统社区的共同体精神,激活集体文化,实现对传统的再造,确保责任捆绑;另一方面,扩大社会信任面,实现集体共担,塑造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

在共治方面,主要解决的是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和机制问题。在基层社区治理场域,居民有时会将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相混淆。但在共治场合,绝大多数社区居民会自发讨论形成新的规范,百姓自己的事自己管,需要政府介入时则积极介入。总体而言,社区治理呈现出私人空间的公共化倾向,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边界逐渐模糊,这为城市治理引领私人生活变革提供了可能。

在共享方面,主要解决的是美好生活的归宿和目的问题。共享涉及治理成果的分配,即如何通过制度安排让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确保治理质量、效率和满意度。其在本质上凸显的是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用。通过共享引导共建和共治,将人民群众作为城市治理考核的重要主体、群众评价作为城市治理考核的重要内容、群众需求作为城市治理工作规划的重要依据,真正实现城市治理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通过共享引领共建共治,提高了社区信任、社区归属和社区凝聚力,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共建共治共享将个体选择升级为组织选择,将个体利益融入集体利益中,将抽象的个体模糊诉求转化为具体的公共诉求,最终实现个体和集体的同频共振,滋生出一种共同的意义、思想和集体智慧。该机制最大程度通过政府动员调动居民的积极参与,居民的积极参与和提出的合理诉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促使政府的行动更加科学合理,共同打造善治局面。

以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为重要抓手,有力推动生活环境、生活能力、生活效益、生活欣赏等全领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在生活环境方面,体现出居住安全和生态宜居。天府新区建成覆盖全市的环境感知体系,对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水景观实行智能监测和科学管理,对林业和园林资源进行数字化管理,对重点生态区域执行动态监管策略。成华区搭建先进的“智慧环保”信息化平台,实现环境监测、环境监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辐射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全面信息化。在生活能力方面,政府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推送服务和上门服务,“网上办”与窗口“马上办”融合服务。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灵敏识别、快速追踪和综合研判能力,各大智慧政务平台可以通过高度精准和海量的数据对人进行全面解析,实现精准的供给服务。在生活效益方面,成华区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教育、社保、帮扶和养老等服务惠及全民,人人拥有健康档案,人人可享优质教育资源,社会保障全覆盖,移动互联网城市服务覆盖居民衣、食、住、行、娱等各个方面。在生活欣赏方面,将包容、乐观、优雅的天府文化深根城市治理中,培养居民文明、健康、向上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弘扬市民开放、包容和友善精神,体现出超大城市的和谐共融特性。

总之,全领域的美好生活需求满足既需要绿色环保的空间、精准高效的服务、宜居宜游的生活,同时也需要民主公平正义的政治诉求、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升华与拓展、人生归属的认同与欣赏,这些皆可借助共建共治共享机制逐步实现。

(四)服务进阶机制:完善全周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

服务进阶机制指的是推动居民享有的服务从低阶到高阶的演进,城市数字治理体现出从人的需求、人的发展到人的感受三个有序递进过程。

第一,人的需求,包括健康、养老、就业、教育等全周期需求。如在维护居民安全方面,成华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运用分布式、去中心、可溯源、不可篡改和鼓励参

与的区块链技术突破信息壁垒,拼接出一条完整的信息链条,增强了政府监管人员的决策能力,提高了监督对象的清晰度、识别度,形成了一套权责清晰、群防群治的“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整治”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天府新区已建成1个大数据云平台和人口基础、企业法人、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领域的4大资源数据库,形成了经济运行、城市建设等6个展示专题,归集11个部门、813项、47.7亿条数据,日均共享交换数据达到2000余万条,为新区经济运行、市场主体发展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此外,天府新区还新建包括18个水位站、5个流量站、10个管网液位监测站、31个视频监控点、40个高空天府鹰眼、8个气象生态监测点、100套森林火灾地表火探测器在内的批量前端感知点位,基本完成了智慧社区5个视频门禁试点和智慧政务大厅改造,为智慧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再如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天府新区聚焦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引入云从科技公司,打造出一套智慧化管理数字孪生系统。通过BIM、GIS等数据信息集成,运用3D建模等技术,打破物理空间局限,建成了覆盖564平方公里的数字孪生城市信息模型,从丰富的数据资源中挖掘出群众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再比如在生态方面,成都市坚持从多维度推动城市协同、包容、绿色和健康发展。概言之,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仅是纯粹的物质追求,更重要的是优美生态的享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彰显美好生活所应有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一体圆融”之美,进而臻于人与自然持续共荣、和谐共存的“一体共生”之境,最后形成生产、生活和生态有机统一的整体。

第二,人的发展,指的是职业进阶、素质提升和群体融合。职业进阶指的是打造城市创新创业新业态,培育新经济,实现城市居民充分就业。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向善的守护,还需要对“以正义的能力为基础的有尊严的、人性丰满有活力的生活”的坚守。天府新区在精准把握城市治理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全程在线、高效便捷、智能处置的基本原则,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环节有效运用具有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孪生、数据治理等技术,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从规划编制、审查、实施、评估等方面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的智慧化体系建设,推动90%以上的线下规划流程向线上倾斜。总之,天府新区对城市的生长进行全周期记录和全过程智能化管理,打造互联互通的自然资源“一张网”、三维立体的自然资源“一张图”和统一的应用支撑“一平台”。同时,在传统规划功能的基础上,扩充与超大城市内核相对应的10余个特色规划功能,满足居民的发展需求。

第三,人的感受,指的是满足居民的安全感、归属感、舒适感和幸福感。在安全感方面,天府新区在智慧防汛方面构建了“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智慧应急防汛体系,利用NB-IOT、4G、5G、卫星等通信手段以及边缘计算技术,推动多源数据深度融合,完善水情、雨情智能感知网络,实时监测和分析雨量、水位、流量、图像和视频数据,构建包括防汛“一张图”在内的数据资源中心及水灾害领域的专业模型。通过专业模型和智能分析实现汛情态势研判、智能预报预警、灾害趋势预测,从事前预防、事中“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应急处突、事后分析三个维度全面提升城市面对汛情等紧急事件的韧性。近年来,成都市提出建设品质、活力、美丽、人文、和谐“五大社区”的目标,创新城市微治理。其中就品质社区而言,提升社区营造空间美学运用能力,成华区 and 天府新区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发挥规划的科学引领作用。城市和社区空间的绿化、美化既是改善居民生活品质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社区居民审美品位与文化内涵、培育城市共同体精神的重要渠道。城市数字治理融合了美好生活的意蕴,通过城市社区

空间的打造来实现居民间亲密关系的养成,将个体当成独立且绝对的生活主体,给予区别和认真对待,进而通过个体间亲密关系的培养实现公共沟通的顺畅。借助工艺品、艺术展览、艺术长廊、体育活动和民俗仪式,发展出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生活乐趣,丰富人生意义。通过营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环境,既确保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更激发幸福安宁的美感体验,践行诗意化的栖居生活方式。

(五)托底与提升机制:实现全覆盖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

通过一定的渠道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减少不平等因素,建设城市生活共同体,推进包容性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些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阶层基础。托底与提升机制就在于保障幸福美好生活的创建能覆盖到每一个人,重点是相对弱势群体,这里所说的相对弱势群体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已有的弱势群体而言,政府及时提供对话平台。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而阶层分化又形塑出差异化的生存体验和生活质量。城市数字治理的底线逻辑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构建可供对话的平台,通过设立各种渠道收集不同群体的合理诉求。为了提高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满意度,成都市着力构建全龄友好社会,选择社区进行试点,对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群体的活动空间和服务设施进行升级完善。在空间规划上实现空间公平和空间正义,在资源配置中偏重于相对弱势群体。

另一类是针对数字化时代新产生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数字弱势群体,包括老人、儿童、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残疾人等,他们由于受教育水平、经济条件、身体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往往对信息技术接受较慢。要提供数字化服务的易学、易用和方便性,不让任何一个人在数字时代掉队,促进数字包容性发展。针对有些地方过度强调在线服务的情况,如点菜必须扫码、买票必须下载 APP、挂号必须上网预约,成华区在推行数字化时保留了传统人工服务方式。此外,政府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数字的正功能,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实现以平等价值为基础的秩序构建,倡导民主、开放、扁平的人际关系,放大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对弱小的声音,让全社会能听到他们的合理诉求。数字社会以解析的方式对人进行分类和剖析,通过区分人而改变人,人们不再被强迫,而是被引导,数字城市形成了“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格局,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个体主体性得以增强。

四、城市数字化治理中的“美好生活”逻辑

一切致力于实现城市数字治理的行动、规划和方案都将居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乃至居民过去习以为常的生活理念、交往方式和生活策略等都可能发生改变,城市由此变得更智慧、更温暖、更美好。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治理逐渐渗透到居民的生活系统中,引导居民的生活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彰显人文气息的新特征。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种高阶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也是一场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即让城市变得更智慧、更温暖、更美好,让市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美好生活是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理念发生了较大转变。早期的城市建设主要围绕硬件开展,致力

于城市物理空间的打造和空间的优化布局,在治理需求上表现出围绕城市生产的功能性展开。“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将城市发展中的“人”具象化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当下政治和生活话语中具体表述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等。而后出现的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等新形态,加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城市人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稳定增长等多因素共促,城市建设逐渐转向以提升城市品质为主的提质增效阶段。在该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城市治理的重要选择。用“城市大脑”全天候管理城市肌体运行,用信息化平台感知城市风险隐患,用新型数字技术满足居民多元需求,这些实践标志着城市治理的生活面向逐渐从隐性走向显性、从生活的功能性层面转变为生活的价值性层面,城市治理更加关注居民多元、多维、发散的生活需求。具体而言,生态宜居、全龄友好、权力分享、品质活力、文化魅力、机会均等、生活能力、生活便利、生活欣赏等成为衡量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指标。在信息化的推动下,数字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因具备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多样的就业机会、诸多资源汇聚等优势而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场所,数字城市因为数字助力而更加夯实了城市治理的基础,提供了更多的新机会,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主要场所。总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最大程度上规避了把城市问题等同于技术问题的偏颇认知,在技术设计中嵌入相应的价值标准,网络互联、数据驱动和算法依据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撑,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导下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技术赋能社会,但必须以价值为牵引,充分引入技术手段,并对技术的运用和实践给予监管,最大程度释放出技术治理的价值,因此,“价值引领、技术嵌入”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的典型特征,城市数字化治理遵循了人类自身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律、城市文明发展规律的有机统一,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这不仅是一种城市治理的价值选择,更是基于满足人的多重需求的一种制度设计和结构安排。

(二)美好生活逻辑体现出技术、生活与治理的高度融合

城市治理数字化质量的高低与智能技术、大数据驱动力以及城市发展规律、人民群众需求有关,由城市数字治理促发的生活方式变革在具体思维方面实现了技术逻辑、治理逻辑和生活逻辑的高度融合。

首先,由大数据支撑和算法依据的技术逻辑是城市数字治理的硬支撑,直接导致城市治理的基础秩序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国家在解决人们日常生活问题时发展出一套针对高度复杂社会的预防、处理和预测系统。围绕个体、根据用户进行画像,用科技赋予的影像的方式传递有效信息,提供精准、高效和个性化的服务。通过技术实现条块关系融合、流程优化和再造以及资源整合,实现了非技术条件下所无法实现的效率提升。城市数字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编码、赋值、计算和可视化等环节将城市社会事件、社会舆论等社会事实给予符号和数字的呈现,达到城市治理精细化的目标。技术治理的目的在于通过相关技术撬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以推动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技术成为城市生活治理的有效补充,重构了城市治理逻辑,扩大了治理的范畴,强化了治理的效率,提升了治理的质量。技术在不断塑造城市治理和居民的生活方式,而且技术也越来越成为驱动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总之,技术在无形中推动了一场生活方式的变革,把美好生活的理念不断转变为现实中的行动和策略。

其次,城市治理逻辑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条主线。依托科层体制,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对

居民需求的精准性满足,让城市成为居民关系之网和意义脉络的最佳实践场所。以事聚人、聚人成事,城市因多方面的优势成为人、财、物汇聚之所,城市也因人的需求多样、价值多元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态。城市数字化治理是对居民多元需求的积极回应,其最终目标是把人从机械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做人更适合做的、也更乐于做的事情,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从而更好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

最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在引领城市数字化治理的价值发生转变。一方面,美好生活是多元多样的,城市主体多元化对城市治理提出了差异化、高标准的要求,安全、公平、正义、民主、友善等美好生活的多面向对城市治理提出了安全保障、过程公平、正义维持、全过程民主、睦邻友好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居民的生活方式在技术的加持下得以不断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美好生活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不是某个群体或某些群体所特有的,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의公共价值、公共诉求和共识认同的集合,城市数字化治理中的生活样态是国家、社会和居民积极互动的结果。

总之,城市数字治理伴随着城市治理的日常生活转向,城市治理理念和实践深度嵌入居民日常生活中。城市数字治理呈现出技术、治理、生活三种逻辑的叠加,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的意图不在于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它关心的是如何保卫并重建生活方式,强调通过个体的反思和行动,修复已经松弛甚至断裂的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关系,实现幸福和自我”^{[21]262-265}。生活治理强调对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事件的适当介入和合理引导,只有通过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细节介入,才能及时发现群众的生活体验、个体感受和生活意义,从而帮助群众改变个人境遇、重塑信心、增强能力以实现每个人的美好生活。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市日益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治理逐渐向智能化和智慧化的方向演进,同时不断融合绿色、宜居、低碳、包容等新理念,这一过程有助于推动居民从物质生活的满足向精神生活的高阶需求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向全国人民做出了建设美好生活的庄严承诺,并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激发地方政府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最美空间打造等措施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基于美好生活逻辑的城市数字化治理正在各地深入实践,为我们把握城市治理转型中美好生活的新命题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和充分的依据。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成为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数字化治理呈现出向居民日常生活融合的转向特征,国家通过一系列建设提供良好的城市环境、夯实的物质基础和舒心的人文氛围,激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乐趣、归属和认同,进而实现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嵌入居民微观且具体的生活实践,并致力于通过改变居民个体进而改善居民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这既体现出城市治理中的美好生活逻辑,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指向。

成都在数字城市建设中坚持“融数字城市、美好生活”于一体的新理念,城市数字化治理呈现出美好生活的逻辑,沿着这一发现,笔者追溯了其蕴含的美好生活足迹。坚持美好生活的理

念,立足于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以及着力从民生问题出发进行城市治理,因而更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认可。美好生活的实现并非仅仅依靠单独的个体和家庭的努力而得来,更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和直接指引,是国家在超越各种细碎的、多元化的具体生活样态的基础上聚焦居民日常生活整体而做出的总体性制度安排。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进一步赋能美好生活的实现。美好生活是根植于中国具体场域的实践存在,是通过群众力量不断创造空间并持续栖居于此的一种生活方式,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系统布局,引导城市发展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重塑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社会交往通畅、机会均等和友善包容的积极氛围,让城市拥有更多的美感和舒适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本研究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和建设高品质居民生活方式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M].叶娟丽,韩瑞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4] 张卫伟,王建新.美好生活的多重价值内涵及其现实构建[J].思想理论教育,2018(4):37-42.
- [5] 杨延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J].观察与思考,2018(4):76-82.
- [6] 乔文瑄.“两个结合”: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源泉、历史根基和实践逻辑[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86-191.
- [7] 王鹏,彭宇.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理论之源、历史之脉与价值意蕴[J].重庆社会科学,2022(9):66-79.
- [8] 邓先奇.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J].江汉论坛,2019(7):52-56.
- [9] 李松.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内在机制和实现路径[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5):13-22.
- [10] 刘志洪,魏冠华.美好生活的本质规定与当代特质[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1):41-49.
- [11] 项久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J].中国社会科学,2019(11):4-24.
- [12] 项久雨.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J].理论与改革,2022(4):1-10.
- [13] 徐艳玲,王敏.考量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逻辑的三个维度[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4):44-52.
- [14] VIAL G.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9(2):118-144.
- [15] 郑磊.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内容、路径与方向[J].探索与争鸣,2021(4):147-152.
- [16]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3.
- [17] 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9-08-23.
- [18]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N].人民日报,2019-11-04.
- [19]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20] 陈潭,陈芸.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未来[J].中国行政管理,2020(6):57-64.
- [21]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A Better Life: The Practical Logic of Urban Digit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in Chengdu

XIE Xiaoq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Urban governance is progressively evolving towards intelligence, digitization and smartness, while concurrently integrating new concepts like green, livable, and inclusive.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lved into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ways to a better life, they have relatively overlooked the life dimens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seldom concentrated on a better lif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urban digital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logical framework for a better life within urban digital governance, aiming to unveil the complex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urban digit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is interwoven into the micro-life of residents, enhancing communal living modes and life experiences by influencing individual residents, embodying the “a better life” concept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most notable characteristic of Chengdu digi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is its orientation towards daily life. Building on this assertion, the study delineates and articulates the logic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digital governanc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engdu incrementally fosters the realization of a better life through five mechanisms: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s’ lifestyles towards high-quality livability via policy design, enhancing residents’ happiness and beautiful life throughout the entire chain via digital empowerment, improving residents’ happiness in all domains through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co-sharing, elevating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full cycle through service enhancement, and augmenting the comprehensive happiness and beauty of life through support and promotion. The digital governance of cities signifies a holistic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lifestyles, actualizing a better life through the fus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hus advancing the nation’s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probes a new paradigm of urban lif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broadens the scope of lifestyle considerations in urban governance, and offers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governments to ameliorate the high-quality lifestyle of Chinese residents.

Key words: urban China, digital governance, a better life, high quality life

责任编辑:金华宝

引用格式:唐任伍,史晓雯.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J].探索,2024(1):103-114.

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唐任伍,史晓雯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将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分析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及风险规避具有重要意义。在互动仪式链理论支撑下,社会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传播形式,治理过程即为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发生的互动。在唤醒信息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革新物理、社会、人文三种情境实现情境再塑,破除治理场域中的壁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强化情绪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实现情感再塑,助推情感持续加能。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过程中主要面临数据误用、主体错位、适用偏差、舆情失控四方面风险。因此,需要采取一些风险规避措施:一是要完善法律规制,从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入手防范数据滥用和信息泄露;二是要规范科技运用,保持批判性思维,预防技术懒政和行政低效;三是要优化应用场景,充分考虑具体治理场景中人工智能的适用性;四是要加强网络治理,避免舆论风险发酵与滋生。

关键词:人工智能;基层治理;风险传播;互动仪式链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103-12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技术的进步,开始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颠覆性变革。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将显著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对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智能化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目标,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2022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提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能力,围绕安全便捷智能社会建设打造重大场景。由此可见,将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分析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及风险规避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针对如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已有研究从管理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角度,探讨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面临的挑战及其突破路径^[1]。形式主义和科层体制带来的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是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一核多元、赋权于民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2]。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受到组织规则和治理资源影响^[3],公共服务^[4]、农民收入^[5]、脱贫攻坚^[6]、环境治理^[7]等是衡量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技术手段,在基层治理各环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促进全过程人民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18ZDA012),项目负责人:唐任伍。

作者简介:唐任伍,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晓雯,女,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方面,云场景、云传播、云知识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畅通了民主传播渠道,拓展了民主参与空间,全方位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率^[8];在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为基层党组织覆盖、党员教育管理、群众工作提升等提供了新契机^[9];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人工智能技术为“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两张网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通过精准识别社区问题、辅助城市规划和交通管理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10]。然而,人工智能技术为基层治理带来便捷和高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个人隐私和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算法偏见和技术歧视等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运用算法及算力对公共问题相关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如果数据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取,则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害^[11]。关于算法偏见,由于算法设计者的主观意识、训练数据不可避免地存在固有偏见,人工智能场景下的性别偏见^[12]、公正损益、责任模糊、技术依赖等伦理问题也难以有效祛除^[13]。

如何克服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规避其消极影响成为难以逃避的话题。在法律层面上坚持规制与保障并重,通过法律引导、法律规制、法律监管降低技术风险^[14];在制度层面上找回技术治理中的制度维度^[15],建立数据共享体系,完善智能治理运行机制^[16];在技术发展层面与国家安全相联结,加强对技术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17];在技术伦理层面,形成由核心要素、创新过程与主体责任构成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三维分析框架^[18];在意识形态层面,重视人工智能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播路径^[19];在治理主体层面,形成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的协同行动结构。

综上所述,从赋能机制的角度探究人工智能为基层治理带来变革性影响的深层原因鲜有文献涉及,而厘清这一点对理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本文将以前述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切入点,将基层治理过程看做各方主体在信息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仪式,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机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提出新的思考。

二、互动仪式链: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一个分析视角

第三代人工智能展现出的“类人化”特征,表现在自主学习性、自适应性、智能交互、推理决策、环境感知等方面,能够从促进公众参与、拓展治理边界、增强治理敏捷性三个方面赋能基层治理,促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 互动仪式链理论及其应用

互动仪式链理论是社会学家柯林斯在涂尔干和戈夫曼关于面对面互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意在探究如何有效地将个体与集体联结起来。涂尔干认为,只有通过一定的“仪式”才能够产生集体兴奋,进而维护个体对于团体的忠诚。戈夫曼从微观角度出发,将“仪式”引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提出仪式代表一种个体必须守卫和设计其行动的符号意义的方式^[20],创造社会互动的“互动仪式”,即参与者好似剧场中的表演,按照特定的规则和期望呈现自己的角色,展示自己的舞台形象以及遵循的规范,维护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通过自己的行为、外貌和言语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并努力获得他人的认可。柯林斯在涂尔干与戈夫曼的研究基础上,将互动仪式理论与符号互动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不仅继承了戈夫曼对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社会互动的关注,还引入“情感能量”这一概念,以解释社会互动如何影

响个体的情感状态和社会结构。该理论为从微观上理解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提供了全新思路,阐明了人们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交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并通过互动来构建社会秩序。

互动仪式链理论从“情境”“情感”“符号”三个层面将社会互动看作一个动态过程,在某一特定情境中通过互动仪式激发情感能量,引发群体中的“共同关注”和“情感连带”,个体对事物共同的情感将衍生出象征群体团结、道德感与成员身份的符号。如果同时具备四个要素,一场互动仪式将得以顺利展开。两个及以上行动体聚集在同一地理空间且能够感知对方存在,存在一个无形屏障将非互动仪式参与者排除在外,行动体有一个共同关注的焦点,每个行动体分享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当共享的情感不断经历“加能”过程,即通过言语、身体动作以及“情感连带”得到强化并最终催生出集体兴奋,就会产生互动仪式的四种结果:群体团结和成员身份认同、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道德标准^{[21]86-88}。

互动仪式链理论根植于社会学领域,但也在诸多领域展现出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解释潜力。它为解释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如何产生和交换情感能量提供了一个框架,揭示了集体仪式如何创造共享的情感体验,以及社会互动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变迁^[22]。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互动仪式链理论突破了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性,对于解释数字时代的社会互动和网络社区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模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二) 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解释力

从传播形式分析基层治理过程能够发现,在人工智能未广泛直接应用于基层治理之前,人们通常通过电话、邮件、网络媒体等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远程互动,但远程互动所产生的情感强度远远弱于面对面交流,使得基层治理难以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治理效果也难以得到保证。农业社会信息传播主要依赖面对面、书信、民间故事、歌曲、舞蹈等;进入工业社会,书籍、报纸和杂志等印刷媒介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电报、电话等电信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的到来,尤其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爆发和应用,信息传播媒介发生了革命性、颠覆性的变化,虚拟场景变得更加真实,极大触发和集聚了人们互动仪式的情感能量,推动了互动仪式更加快捷、顺利地进行,打破了“两个及以上个体处在同一地理空间”的限制,虚拟在场的方式完全获得等同于身体在场的情感体验。因此,基于互动仪式链对于社会互动的理论阐释,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极大增强了个体间的情感连带,使个体的情感能量得以聚集,从而形成群体符号以促进群体团结。

互动仪式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成员之间能够进行情感的交换和共鸣。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为公众深度参与治理过程提供了可能,从而增强公众与政府间的情感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改革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各主体间的权力关系,政府对多元社会活动参与主体进行赋权,打破了传统科层制行政体系下权力和资源集中的局面,提升了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多元参与主体的话语权和自主性。人工智能的出现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其结果便是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能够为双方一同创造更多的权力。首先,政府的治理领域得到拓展。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由其引发的潜在社会风险不容小觑,对政府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其次,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例如,政府部门由于缺乏算法相关技术人才,必须依靠技术专家建言献策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理目标。再次,人工智能技

术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岛,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扩大机会和提高能力,使公众能够更加广泛、便捷地获取信息,增强信息共享。最后,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和处理,弥补信息不对称短板,使信息更容易被公众获取,也使得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和采取行动时更加灵活地响应社会需求,将社会公众的合理诉求融入基层治理。

良好的仪式有赖于互动的动态性和适应性,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有助于提高治理敏捷性与合理性,更全面精准地回应公众需求。一是人工智能系统的实时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打造出基层治理的动态反馈系统,使得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能够全方位考虑公众需求并结合公众需求进行适应性决策。政府在日常决策和政策制定中需要依赖大量数据以了解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识别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如在城市交通管理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交通流量数据,预测拥堵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从而使相关部门可以据此调整交通信号灯的时序,以优化交通流畅度,提高城市居民的出行效率。二是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以及算法的应用,对自然灾害等潜在社会风险作出及时预警,为政府提供关于风险防控的科学建议,从而使政府能够更加迅速地作出反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三是智能大脑的信息整合能力与大数据分析能力远优于人脑,人工智能能够将尽可能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建模,并以接近真实社会的状态运行。如在制定环保政策时,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不同环保政策的实施效果,预测其对空气质量、能源消耗方面的影响,帮助政府找到最优政策方案,从而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影响。

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顺利进行的核心动力。在传统的社会互动中,情感能量的产生极大程度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人工智能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方式,特别是数字通信和社交媒体的应用,促进了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治理转变,拓宽了治理的空间边界,为情感能量的产生、维持和积聚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制,使得即使在缺乏物理接触的情况下,个体也能非面对面进行有效互动交流和共享情感体验,从而产生强大的情感能量。例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支持、反对、愤恨、痛苦、惊喜等情感表达,虚拟现实中的身临其境,都能够产生与面对面互动相接近的情感能量。在线平台中的用户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却可以在同一时间获取对某一事物的感受,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及接受他人的观点。这种数字化互动不仅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而且有利于形成情感共鸣和社会凝聚力。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分析和数据挖掘,可以有效识别用户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分析和理解用户行为和情感方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这种非面对面互动的效果,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和针对性的服务。这种基于数据的个性化推荐,不仅提高了用户的参与度和满意度,而且还加深了用户之间的情感联系。

三、情境与情感再塑: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基层治理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其本身便是一场互动仪式。由此,治理可以视作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发生的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的互动。在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治理”可以看作信息要素在群体网络中不断循环“唤醒—传播—建构”的动态过程。其中“唤醒”过程是互动发生的前提,它意味着治理导向的政府行动即将在基层社会开展,信息要素在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具备传播的动力;“传播”过程是互动顺利进行的关键,信息由一个节点向下一个节点传播的过程中会经历强度的损耗,只有

情感能量不断加能,才能使信息具有足够的动能继续传播,互动仪式才能得以延续;建构是互动的结果,当信息传播的链条不再向外扩展,由信息网络节点和传播链构成的网络系统结构基本稳定,整个网络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则可以认为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间达成了某种一致,这种一致即互动仪式建构的结果。

(一) 治理仪式中的情境与情感特征

“情境”是治理仪式启动的前提,分为场域情境与感受情境。场域情境作为互动仪式的物理和社会环境,是社会互动得以发生的空间载体;场域情境提供了互动的物理和社会框架,如会议室、办公室、餐厅等具体场所,不仅为开展互动提供了物理空间,还隐含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感受情境注入了原始的情感动力,是原生情感依托的情绪载体,在这种情境下,特定的事件或环境触发了人们的情绪反应,如在痛苦情境中产生的悲伤,或在危险情境中产生的恐惧;感受情境不仅为互动仪式赋予了情感深度,还影响了参与者的情感状态以及表达和互动过程中的情绪交流。这种情感的流动和共鸣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和多维度。

“情感”区别于情绪的短暂性和波动性,展现出一种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是治理仪式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情感的形成和维持通常涉及对公共政策的长期反应和态度。例如,当地民政部门通过关怀孤寡老人和兴办老年之家这一举措,逐渐在老年群体中培养出一种对该部门的认同感。同样,在法律调解过程中,通过细致了解当事人情况并提供专业的法律支持,可以树立起当事人对法律机构的信任感。与此相对的是情绪,它通常表现为短暂和易变的个体体验,如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快乐、愤怒、悲伤等。然而,个体的短期情绪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集体的长期情感。情感能量的产生,意味着在群体中形成了一种高度共享的情感状态。这种情感通过集体互动的节奏连续不断地被强化和巩固,最终实现了对情感能量的“加能”。

“情境”是触发“情感”产生的场域,有什么样的“情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感”;而“情感”则是“情境”的表征。“情境”和“情感”构成基层治理互动仪式链的元素,二者共同在基层治理互动仪式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情境”决定着“情感”能量的大小,而强大的情感能量是促成基层治理互动仪式结果的最直接动力。政府部门通过及时的政务公开和对民众意见的积极响应的“情境”营造,构建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形象认同的“情感”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相反,政府不当行为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情境”,造成相应的社会“情感”反应,带来不同的基层治理效果。

(二) 人工智能场景下的情境再塑:治理场域中的壁垒破除

微观社会学的解释核心不是个体行动者,而是互动发生的情境,行动者在一个小型空间发生的面对面互动是社会生活的能动根源^[23]。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使得“情境”这一因素在形式与内涵方面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在传统治理场景下,“身体共在”是互动仪式的必要元素之一,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通常需要共处一室面对面交流,假如采用远程交流的方式,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将大打折扣。人工智能打破了“身体共在”这一限制,哪怕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营造出同处一室的效果,保持成员间互动的情感强度。人工智能技术对治理场域壁垒的破除,直接作用在治理的物理情境层面,治理的社会情境和人文情境也连带受到改变。

首先,从物理情境,即互动仪式发生的具体场域角度来看,传统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强调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性,即互动仪式发生的场域必须为严格限制的小型空间,行动者面对面,在身体共处同一地理空间的前提下才能产生足够的团结感,进而促进仪式顺利开展。很显然,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远程互动所产生的情感强度远远弱于面对面的互动,远程仪式很难顺利开展。但人工智能通过互联网、视频通话、虚拟现实等技术,将互动仪式发生的场域由现实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打破了“身体共在”的场域限制,使得行动者不再受限于严格限制的小型空间,虚拟“身体共在”的物理场景已经极度接近于真实,虚拟空间中成员的情感强度也与现实中无异,以往公众需要亲临政府机关才能获取需要的信息或者办理相关事项,如今利用在线政务平台,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文字聊天或语音识别,使公众能够远程查询信息、咨询问题以及办理业务。这种方式不仅打破了地理限制,同时节省了人们的时间成本和“鞋底成本”。

其次,从社会情境,即互动仪式发生的社会关系场域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干群关系发展。治理模式革新的内核是信息传播媒介方式的变革。从农业社会到智能社会,干部与群众的权力结构、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和治理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通过各种智能网络平台获得信息传播渠道,实现了对政府政策的更广泛深入的参与。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基层治理提供了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得政府服务更加精准和及时,进而实现了基层治理模式的现代化。传统农业社会中官民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统治与被统治,官员对信息具有绝对的支配权,成为百姓的“父母官”,权力成为特权的代名词,百姓只能是治理的被动接收者。即使到了工业社会,信息传播源被少数“精英”所控制,政府在信息传递中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干群疏离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用于驱动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知识信息仍然在社会中上层,普通民众依然被排斥在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之外^[26]。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干群关系发生极大变化,同时也改变了基层治理规则和模式。政府逐渐由“移动政府”向“智慧政府”转型,改变了传统的集中生产、有限传递、单向控制的信息传播方式;居民不管身份如何、地位怎样,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平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大众通过网络监督、社会吐槽等方式越来越深入地影响自身相关的政策制定;社会驱动力由传统的物品交换和资本流动迅速转换为信息交换和信息传播^[24],同时权力从国家向网络转移,社会互动逐渐取代等级结构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主导地位。

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信息过载、信息滥用、信息孤岛、数字鸿沟、虚假信息、隐私泄露等问题,在基层政府信息处理能力与信息治理手段相对欠缺、基层民众参与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多元参与、协商共建”的治理理念在基层难以落地生根。这就对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更高的期望,要求人工智能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技术,筛选出可信度较高的信息,缓解信息过载,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从海量数据中发现隐藏的关联,帮助政府进行科学的情境推演,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全真模拟情境,使人民群众更加直观深刻地感受政策效果。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促进了干群关系向着更加平等的方向演进,以弥补基层治理中基层公务员处理公共事务能力较弱、公众参与基层治理意愿较低的短板,更加平衡治理的公平性与有效性问题,促使“共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环境在基层得以落实。

最后,从人文情境,即互动仪式发生的人文场域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文环境场域是指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包括共同

体的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等,直接影响着基层治理的效率。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是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的软件保障,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共同体意识”,在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环境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基层治理的中国元素。共同体意识作为衡量个体成员对集体行动的认同程度变量,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形成和稳固的前提^[25]。人工智能技术以机器学习为基础,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大规模预训练,将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算法等作为基层治理的辅助工具,为培育基层共同体意识注入新的能量,有利于社区共同体意识生活化、大众化、智能化。

(三)人工智能场景下的情感再塑:共享逻辑下的情感加能

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的根本驱动,而仪式若要顺利进行,必须持续进行情感加能,以保证情感能量持续强劲。若情感加能过程不畅或者中断,情感能量没有持续地得到加强,则会形成成员对仪式的“出逃”,导致仪式中断或失败,直接影响基层治理效果。若情感持续得到加能,情感能量不断积聚,最终可能会形成群体团结或群体团结破裂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正向的情感能量积聚使参与者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积极投身于互动中,有助于形成高强度的群体团结,从而确保仪式顺利进行;负向的情感能量积聚使参与者对互动越发不满,拒绝认同群体成员身份,不愿参与互动,导致群体团结破裂或根本无法建立团结,进而造成治理仪式的“出逃”。在基层治理这一场景中,从政策制定到实施,再到反馈与改进,大多需要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在整个互动周期中使各类行动者不断积聚正向的情感能量,形成并保持高强度的群体团结,乐意通过建言献策的方式参与基层社区、乡村的发展与建设是人们所期待的理想治理模式。根据互动仪式链理论,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内部及整体产生群体团结,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治理仪式相关参与者获得情绪归属;二是认同群体成员身份。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创新了情感生成与积累的方式,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情绪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其一,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提高了参与者的情绪归属感。一方面得益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通过分析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线上平台中的用户情感表达,政府能够更及时、准确地了解群众的情感诉求。例如,公众通过政务微信公众号向平台发送文字、语音等进行咨询,运营团队在线答疑,双方同时聚集于这一平台之上,根据对方的文字、语音、语调感受其焦点和节奏,据此调整自己的节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迅速收集并分析这些信息,这种数据的分析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捕捉公众的需求,从而能够及时调整政策以更加贴近公众的期望。通过满足公众的期望,政府与公众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公众对治理过程的情感投入与情绪归属。另一方面得益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政府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建一个数字化的城市环境模型,居民可以穿戴虚拟现实设备,进入数字化城市,漫游于改造后的街道、公园等场景中,亲身感受改造后的城市环境,提出意见和建议。人们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更加直观地体验政策实施的效果,从而增加与治理过程的情感连接,引发情感共鸣,更加深刻地感受政府提供的优质服务以及对人民群众关心,从而增强了群众在治理过程中的情感归属。

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提高了参与者的身份认同感。一方面,智能推荐系统能够根据公众的兴趣、需求和历史行为,自主地筛选并推送用户可能感兴趣的信息,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推送符合其兴趣的内容,使居民更积极地融入社区,参与社区公共治

理。这种个性化的参与方式更容易激发公众的兴趣,提高个体参与者的能动性,发挥行动者的专长,形成人尽其用的局面,从而增强居民在治理过程中的身份认同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多语言交流平台,消除了语言障碍,使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居民能够顺畅地进行交流和合作,分享彼此的见解和想法,从而使社区成员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彼此更加信任,促进了社区的多元融合。

四、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风险规避

数字化、智能化是基层治理的一种新形态,人工智能在各地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已经展现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显著优越性。北京在“亚洲最大社区”回龙观、天通苑两地(简称“回天地区”)开展“回天大脑”人工智能应用于基层治理的试点,通过“一屏揽全局”“多端联动”等方式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和缓解交通压力;浙江温州打造的“智慧村社通”平台,集政府监管、村务管理及公共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湖北武汉开发“智慧平安社区”APP,涵盖社区服务、一键报警、活动信息等多项功能,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人工智能作为处在快速发展期的新兴技术,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其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对技术认识的有限性都会给基层治理带来额外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于基层治理取得良好正效应的同时,也暴露出显著负效应。例如,在公共安全保障中引入智能监控系统提高城市治理效率时,也引发公众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大量个人信息被收集和分析,导致个人信息数据被不法分子窃取滥用;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中,运算“黑箱”特性使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性和可解释性,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决策结果也难以支持和信任。因此,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坚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克服人工智能算法黑箱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安全漏洞,将人工智能合理嵌入基层治理。

(一) 完善法律规制,警惕数据滥用和信息泄露

数据滥用和信息泄露是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最为受人诟病的两个弊端。公众基于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将大量个人信息录入政府系统,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海量采集、分析个人信息,使得人们在机器的操控者面前没有隐私可言。这就给别有用心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非法运用这些未经授权的数据信息进行商业活动牟利甚至犯罪,严重威胁公众隐私和信息安全,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层出不穷,甚至引发人们绝望地喊出“隐私已死”。不仅如此,人工智能算法的不透明性以及人工智能在社会招聘、信贷审批、司法决策等场景中的机械性与歧视性等,都是应用时可能存在的隐患。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加强对数据的保存和监管,避免造成大规模隐私泄露和信息滥用^[26]。

首先,制定和实施专门针对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框架,制定明确的个人数据处理准则,要求数据收集者明确说明数据用途、保留期限,并且只在得到数据主体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和使用数据;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即只收集完成特定目标所必需的数据,并且在达成目标后应当立即删除这些数据。其次,鼓励使用先进的数据加密技术,如匿名化处理和区块链等技术以增强数据安全;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提高数据保护和隐私安全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最后,加强对数据使用的监管,设立一个具备审查、监督和执行权的独立的数据保护监管机构,以确保所有涉及

个人数据的实体遵守法律规定,监管措施包括定期审计、数据保护影响评估,以及对违反规定者施加严格的处罚;鼓励公私部门合作,通过技术手段如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和持续的安全监测,强化对数据泄露风险的防范;建立包括政府、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监管体系,除监控企业的数据处理行为外,还要担负起帮助公众认识自己的数据权利,并教导他们如何承担起保护个人信息的职责。

(二)规范科技运用,预防技术懒政和行政低效

将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的初衷,是运用科学技术赋能以提高基层治理的公平性和高效性。但是,如果过度依赖技术,则会导致治理过程中的懒政、低效现象,甚至引发社会伦理问题。因此,确保科技与治理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

基层治理本质上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实现过程,人始终是基层治理的主体,技术只是辅助基层治理的工具,技术的设计和使用必须保持人的独立性和支配性,绝不让人工智能取代人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如果实践中过分依赖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型,容易造成忽视政策制定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复杂性,导致决策脱离实际情况。

技术依赖还可能引发伦理问题,例如大数据分析可能无意中加剧社会分裂,人工智能决策依赖的“黑箱”算法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因此必须在技术应用中嵌入伦理考量,健全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机制,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透明、合规。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阶段,要求开发者和使用者提交相应的伦理评估报告,对可能涉及的伦理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审查机构可以依据这些报告进行审查,提出合理的建议和要求;设立独立的人工智能伦理评估机构,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全面的伦理审查;要求企业和组织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保持透明,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建立问责机制,对于违反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

建立公共价值考量,加强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可以被理解和监督;强调伦理意识与公共价值,增强算法公共利益考量,推动开发更具有公平性、可信性的智能决策系统;推动技能培训和转岗支持,克服技术鸿沟;加强公众对人工智能治理过程的参与和监督机制建设,引导公众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及其潜在影响,积极地参与相关决策。

(三)优化应用场景,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人工智能的嵌入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手段,诸如“人工智能+党建”不仅有助于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思想站位,还能够提升服务人民的本领;“人工智能+政务”打通了部门间的隔阂,推翻了“各扫门前雪”的旧象,实现了资源整合与合作联动。然而,基层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技术滥用、偏离服务本质,最终演变成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乱象。一些部门面临着以量化指标为主导的考核要求,如政务 APP 的注册用户数需达到特定目标,导致一种唯数量、唯标准的现象,一些部门为了满足上级的量化要求,采取了多种措施,却忽略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展示其政绩,过分推广多个 APP 和在线平台,并要求基层工作人员进行日常打卡和报告。这些做法虽表面上看似提升了工作效率,实则造成了工作的繁琐性和低效性,最终转化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过重负担。

在开发应用“人工智能+治理”应用场景时,要始终明确技术的引入不应仅仅是为了追求表面的数字化成果,其核心目标应当是提升基层治理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杜绝为了智能而智能。

因此,建立合理的评估和考核机制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应用的关键。机制的设计需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效果,而非单纯的量化指标,可以考虑引入民众满意度调查、服务响应时间的改善情况以及技术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有效性等综合性指标。大力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使用能力,是实现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应用的必要条件。运用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数据处理和分析技能,以及将技术应用于具体的治理场景等,也为工作人员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包括技术更新、问题解决以及定期的反馈和建议收集。

(四) 强化网络治理,避免舆论风险发酵与滋生

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极大促进了信息共享,降低了治理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与情绪传递成本。这种短时间、高频率的信息交换有其积极的一面,诸如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但是,人工智能在提升信息传播便捷性的同时,也为虚假信息、伤害性、反智性、非理性的信息传播提供了通道,这些信息通过人工智能扩散,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偏见、冷漠与仇恨,误导和煽动社会公众情绪,对基层治理、公共秩序和基层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乡村、社区的公众,他们对信息真伪的辨识能力尚有限时,往往容易受到误导,引起公众恐慌或对社会问题产生错误认知,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诱导一些群众参与非法活动,使他们在无意中成为罪犯的帮凶。

因此,加强人工智能的治理显得尤为重要,要完善人工智能舆论场的监控机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网络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以及时识别并处理潜在的不当言论和激进思想;加强网络空间法律震慑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确保网络空间的秩序和安全,对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性言论的行为给予法律制裁。同时,要提升公众的人工智能素养,增强其识别和抵制不当信息的能力,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活动、线上课程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人工智能素养提升活动,教会公众如何辨别虚假新闻以及带有误导性的信息。组建人工智能安全队伍,负责监测、上报可能引发舆论危机的言论,在不影响公众自由表达的前提下识别逆社会潮流的异质因素,为人工智能营造健康的发展环境。

五、结论与讨论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基层治理有助于打造以智能技术为支撑、多元参与为表征、提升治理效能目标的治理格局。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完善、应用场景更多元化以及显现出的愈发智慧的特性,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会对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产生更强劲的内推力。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理论—机制—路径”分析框架,并对原有理论进行了更加贴近现实的修正。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基层治理过程实质上是治理主体与对象之间目标导向的群体互动,信息的传播对互动的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情境是唤醒信息的要素。场域情境为信息的传播提供载体,社会情境和人文情境影响信息传播的方向、速度等特性。情感是信息传播能力的关键要素。情感强度大,信息就有足够动力继续传播,相反如果情感强度逐渐衰减,信息传播的过程也将终止。符号是信息建构的结果,是信息经历唤醒与传播后的必然走向。

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唤醒信息的情境中,人工智能打破了以往必须局限于某一物理空间的限制,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阻碍。进一步来说,环境场域的拓展与空间限制的破除革新了传统的官民关系与社群关系,为情感加能奠定了更坚实的

基础。二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凭借信息共享与迅速传播的特性,增强参与者的情绪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为个体接收到信息后的情感加能以及形成群体团结创造了条件,从而推动治理顺利进行。

本文基于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伴随的多元风险提出风险规避建议。一是完善法律规制以防止数据滥用和泄露,包括确立更加严密的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以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权。二是科学合理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以避免由于过度依赖技术而产生的懒政和效率低下,包括使用人工智能时始终保持批判性思维,确保技术仅仅发挥辅助作用而非替代人类决策。三是优化应用场景以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包括在设计和实施人工智能应用时,充分考虑其在具体治理场景中的适用性和影响。四是加强网络治理以避免舆论不当传播和风险发酵,包括建立有效的网络监控机制和公众教育计划,提高社会对虚假信息的识别和抵制能力。

参考文献:

- [1] 梁平. 基层治理的践行困境及法治路径[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10): 71-76.
- [2] 徐行,王娜娜. 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成因探讨与根除对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20(3): 76-84.
- [3] 向玉琼,赵焱鑫. 差异化调适:复杂情境下基层政府执行行为研究——基于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实践的考察[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46-58.
- [4] 王敬尧. 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分析——以中部Y区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 2009(4): 23-30.
- [5] 张杰,付奎. 新型基层治理模式促进农民增收了吗? ——“访惠聚”驻村工作政策效应评估[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1-12.
- [6] 张琦.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贫困治理绩效评估的视角[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1): 144-151.
- [7] 张琦,邹梦琪. 环境治理垂直改革的效果、基层机制与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 2022(8): 172-190.
- [8] 郭一宁. 数智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J]. 探索, 2023(1): 66-77.
- [9] 孙会岩. 人工智能时代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创新研究[J]. 探索, 2020(2): 137-148.
- [10] 翁士洪.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创新[J]. 中州学刊, 2022(5): 75-82.
- [11] 王俊秀. ChatGPT与人工智能时代:突破、风险与治理[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 19-28.
- [12] 叶青,刘宗圣. 人工智能场景下算法性别偏见的成因及治理对策[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54-63.
- [13] 谭九生,杨建武.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防控[J]. 探索, 2021(2): 126-138.
- [14] 杨福忠,姚凤梅.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之维度及风险法律防治[J]. 河北法学, 2022(11): 89-102.
- [15] 徐国冲,陈宇环. 找回技术治理中的制度维度[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23-32.
- [16] 吴朝文,景星维,张欢.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 2021(10): 70-81.
- [17] 阙天舒,张纪腾.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J]. 国际安全研究, 2020(1): 4-38.
- [18] 樊春良,吴逸菲.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三维分析框架:核心要素、创新过程与主体责任[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10): 18-24.
- [19] 向继友,吴学琴.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控策略[J]. 江汉论坛, 2023(12): 53-59.
- [20] 朱颖,丁洁.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政务微信与用户的互动研究[J]. 新闻大学, 2016(4): 75-86.

- [21]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2] BROWN K R.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nscientious consumers[J].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11(1):121-141.
- [23] 李钧鹏,茹文俊. 论虚拟社区中的互动仪式链[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4):201-211.
- [24] 戴长征,鲍静. 数字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9):21-27.
- [25] 吴睿佳,张乐.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J]. *新疆社会科学*, 2022(6):10-19.
- [26] 戴思源,李珍珍. 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升会增加个人的信息隐私忧虑吗? ——基于保护意识和技术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46-57.

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Risk Avoid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ing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TANG Renwu, SHI Xiaowen

(School of Governa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Embed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risk avoid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ing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Supported by the theory of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society can be regarded as a form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o be examined, and the governance process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ance subject and the governance obje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mon goals. In the process of awakening infor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alizes the reshaping of the situation by innovating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humanistic situations, and breaks the barriers in the governance field.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alizes the emotional reshaping by strengthening the emotional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and boosts the continuous emotional energy. In the process of embed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it mainly faces four risks: data misuse, subject dislocation, application devi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out of control.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legal regulation, and prevent data abuse and information leakage from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intain critical thinking to prevent technical laziness and administrative inefficiency.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and fully consider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pecific governance scenarios. Fourth,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network governance, and avoid the fermentation and breeding of public opinion risk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risk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heory

责任编辑:牟 怡

引用格式:陈锋,王泽林.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J].探索,2024(1):115-128.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

——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陈锋¹,王泽林²

(1.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北京100124;2.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替代行为。数字治理“内卷化”是数字技术逻辑对治理逻辑与治理关系的改造,使数字技术从辅助治理的工具手段转变为主导基层工作的关键变量。数字技术对治理的反噬后果,不仅表现为治理效能的低效增长,还体现在工具理性思维对本能思维的侵蚀与替代。破解数字治理的“内卷化”问题,需要审视数字技术引发的治理关系变革,发挥数字信息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在市域层面重点发挥数据挖掘的决策辅助功能,厘清各个治理主体关系责权利边界,避免数字化的过度监督。数字治理要辅助场景式治理,重点激发基层组织和群众的主体性。

关键词:数字治理;市域治理;内卷化;“12345”热线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115-14

伴随着数字全球化浪潮中的数字政府转型进程,当前我国正从数字政府1.0阶段向2.0阶段迈进,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统筹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系统平台和应用终端建设,强化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19BSH024),项目负责人:陈锋。

作者简介:陈锋,男,博士,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泽林,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统集成、数据融合和网络安全保障”。

这些重要制度安排为治理数字化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数字治理也成为各个层级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数字赋能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作为科技支撑的数字治理工具是否一定能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更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涉及技术与制度、科层之间的互动与协同,甚至可能陷入数字治理的“内卷化”困境。因此,探讨数字技术对治理关系的重塑机制是避免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关键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2023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全面部署数字中国建设,并指出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政府的打造,预示着政府业务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已成必然,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通过改变信息搜集渠道与分析方式,重构政府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为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随着新兴技术在政府行政领域的深入应用,基础信息资源库、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数字政府市场将保持高速发展态势。2021 年中国数字政府整体市场达 1 235 亿元,预计到 2026 年整体市场规模将超过 2 000 亿元,复合增长率(CAGR)为 12%^①。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从 2012 到 2022 年,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国际排名从 78 位上升到 43 位,是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注册用户超过 10 亿人,实现 1 万多项高频应用的标准化服务,大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有效解决了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政府积极接纳公众的政策变革诉求,并且对公众诉求积极采取措施以解决问题^[1],从而不断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增强治理有效性。中国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建设需要培育牢固的社会治理基础,即党和国家的意志与政策通过基层治理载体得以贯彻和实现^[2]。然而,数字治理涉及不同政府层级与不同治理对象,从而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现实困境,如线上线下的数据管理不匹配导致的群众多跑路,各式各样的“政务 APP 治理”要求重复提交精细化记录加重基层干部负担,以城市治理为主导的数字标准与基层治理实际难以匹配等。这些数字治理投入不断扩大、治理效能回馈不明甚至产生反作用的现象被学界概括为数字治理“内卷化”。在这一层次上,数字治理“内卷化”强调的核心在于数字治理领域各项投入持续增长但治理效果或治理绩效增长相对有限,仅仅从投入-产出的视角进行分析容易模糊数字治理自身的运行逻辑问题。将数字治理的重心落在“数字”控制之上,进而在政府更高层级中可以实现“全景敞视”^{[3]225-226},但数字化过程本身是复杂的,数字化本身是否带来治理绩效更加值得关注。因此,本研究提出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另一层内涵,即地方政府在数字政府建设的信息搜集终端不断增加投入以增强对信息的管理权,在治理流程中扩大数字技术应用,但基层干部工作效率与实际治理结果并不一定同向增长。

数字治理并不等同于政务数字化,而是数字技术与制度、科层的有机协同,单纯的政务流程数字化改革难以化解技术赋能与制度执行、科层制约间的张力。如何在数字时代理解治理,而不将其单纯化约为一个数字化过程,是分析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前置基础。对于数字治理“内

① 参见 2023 年 5 月发布的《2023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白皮书》。

卷化”现象,学者们主要从技术与制度、科层协同的角度开展研究。关于技术与制度的关系研究,重点从二者之间的适配关系进行论述。如王翔从电子政务“内卷化”的现象出发,认为信息获取过程中的失真、治理过程中的执行偏差与制度变革中的修正困难共同导致“内卷化”困境^[4],曹银山等人也认为,技术与制度、工具、组织、主体之间的适配性错位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内卷化”^[5]。关于技术与科层之间的协同关系研究,学者从治理实际出发对数字治理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王春城等人从科层组织运行的角度出发认为基层组织运行“内卷化”是组织行为主体对组织环境、组织运行现实的一种负面反馈^[6]。胡卫卫等人关注到传统官僚主义在电子政务领域延伸而产生的“智能官僚主义”,其在过度强调“以技术为本”政务服务理念时^[7],催生出反治理的力量^[8]。

以上研究揭示了技术与制度、科层之间的协同与制约所带来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治理过程中因协同不当而导致的效能负反馈现象。正如陈那波等人强调的那样,应当把层级带回技术治理的分层分析视角中,不同层次的科层政府对技术的接受与应用能力不同,应该考虑技术治理与不同层级科层组织的适配关系^[9],以及技术在不同层级中的应用强度^[10]。然而,这仍然是从技术治理与科层组织某一层级的关系进行考量,没有关注到数字技术对治理关系的重塑作用,以及这种关系重塑所带来的治理实质的变化。事实上,技术治理在信息提取、筛选和处理的过程中,对治理主体关系、情境关系和责任关系都产生了重塑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政策实施的治理效能。

在数字治理的代表性案例中,“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成为全国各地政府普遍推广的数字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旨在通过热线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而驱动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12345”热线具有便捷、高效、规范、智慧等特征,为新时期的中心工作从党政驱动型向市民诉求驱动型转变提供了可能^[11]。但其遭遇的困境也日益凸显,典型表现为市民诉求的不断扩张,造成群众对基层组织的信任下降^[12]。这主要表现为高度个体化与无理化的诉求不断增长,数字治理与高强度的考核机制形成对基层治理空间的挤压^[13]。这些研究从某些侧面点出了技术对基层治理关系的重塑,但仍缺乏在治理体系中系统呈现技术引入所带来的各种治理关系的变革。基于此,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数字治理“内卷化”呈现出什么样的特性,技术引发治理关系如何变革,进而导致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发生。

本研究以 A 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为案例,基于相关数据和田野调查,尝试从信息的收集处理过程呈现治理关系的变化,将信息的输入、筛选和处理分为三个层次,对应主体关系的变化、场景关系的变化以及责任关系的变化(见图 1),系统分析技术对治理关系再造引发数字治理“内卷化”的机制。如图 1 所示,“12345”热线工单的闭环处理过程包含了对热线信息处理的不同环节,接线平台负责将不同平台接收到的市民信息反馈整理成标准化工单,由热线调度指挥中心按照不同的信息类别进行调度指挥。承办单位遵循首接负责原则,在规定时间内对工单及时办理并向诉求人和市民热线服务工作机构反馈办理情况,情况复杂的工单则通过挂账、剔除、转交和研判等方式进行二次处理。“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中心定期汇总各承办单位的热线工单办理情况并形成区综合评分、全市街道(乡镇)综合评分排名,通过书记点评会等形式压实治理责任、部署工作。热线信息的输入、筛选、处理过程在实践层面体现了治理关系的变革,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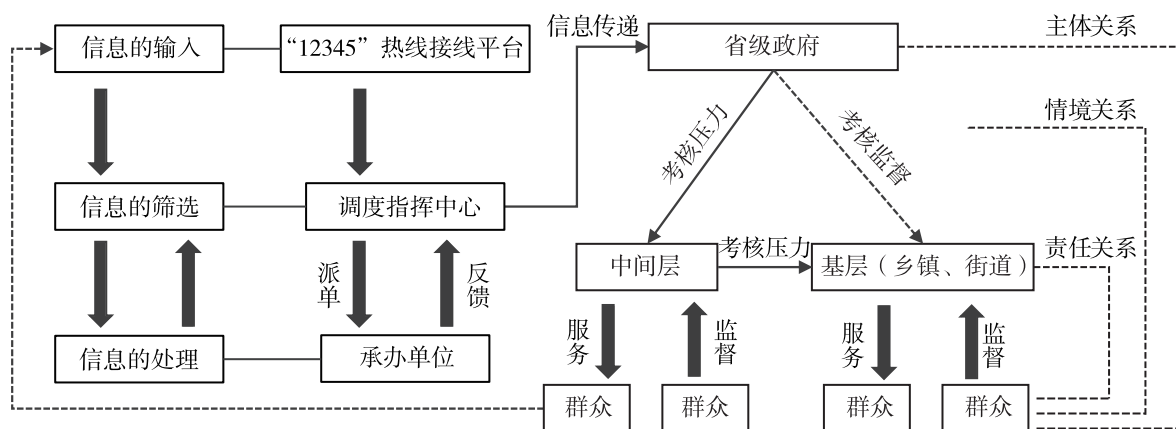


图 1 “12345”热线信息收集处理过程与治理关系的重塑

二、“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的数字治理“内卷化”特征

“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为群众与上级政府搭建了重要桥梁,在推动干部作风转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市域治理的“晴雨表”,有助于挖掘当前城市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然而,这一治理效能伴随着时间的推进,呈现出个体诉求不断扩张、无理诉求“空转”和治理目标的数字化替代等“内卷化”特征。

(一) 诉求输入的低门槛、诉求回应的高效性与个体需求的无限扩张

市民参与被视作数字治理理论中的重要一环,从传统市民参与向数字参与的转变有利于增强市民与政府的信息互动,互动形式的变革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检验。

技术的便利改变了信息传递的层级性并深刻影响了上下级之间对于信息的获取成本,但同时也带来治理内容数量的不断增长。对于民众而言,向政府提交信息的低成本使诉求能够轻松地进入政府工作的视域之内,打电话或网络留言等方式极大地改变了民众与政府的互动形式,并使治理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物理空间,而是扩展到信息空间之内,摆脱地域限制。“人工智能主要靠人工”这句戏言成为政府在处理群众诉求时的真实反映。回应的正当性促使政府需要不断扩展接线员的座席数量,以使民众感到“事事有回响”。对特定问题的机械化和程式化回答并不能满足民众多样化诉求,实际问题的解决也难以依靠简单回复得到切实解决。

当一种治理机制门槛较低且有效时,其他相关治理内容也会因治理主体的意愿而不断涌入。本质上,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可能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但对于参与治理的主体来说,这意味着领导注意力的集中与回应效率的增强。

以 A 市“12345”热线服务系统为例,A 市自 2019 年开展“12345”政务热线改革以来,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公众的权利,全面接诉、不设门槛。根据 A 市“12345”热线年度数据报告,2019 年“12345”热线全年共接听来电 696.36 万件,比 2018 年增长 27.51%;其中,受理诉求 251.97 万件,比 2018 年增长 46.07%^①。2021 年 1 月 1 日 0 时至 2022 年 1 月 1 日 0 时,“12345”市民服务

① 数据来自 2019 年 A 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年度数据分析报告。

热线共受理群众反映 1 485.8 万件^①。不设门槛和高效率的特征使其已经吸纳了原先来自信访、公安、消防等电话热线系统的众多诉求,成为民众提交诉求的首选。也因此,通过“12345”接收的诉求量每年呈快速增长态势,2022 年 A 市“12345”反映的诉求量已上升至 7 592.4 万件^②。如此海量的诉求涌入,迫使政府不得不增加人工智能回复,进一步增加数字化治理投入。然而,公共服务的有限供给与个人无限需求之间呈现出巨大张力,并非仅仅是热线能否拨通,以及数字容纳的问题,而是需要与之匹配的一整套人力、物力、财力运作体系,进而对政府的数字治理能力提出新的重大挑战。正是因此,2021 年以来 A 市政府也在不断深化改革,谋求推动接诉即办向主动治理转变,进而将诉求解决前置、化解在基层,而非全部诉求直接上涌到市级政府进行高成本治理。但是由于诉求输入的低门槛和诉求处理的高效性,仍然暂时无法扭转诉求量不断上升的势头。

(二) 诉求筛选的标准化、诉求情境的复杂化与无理诉求的“空转”

数字化治理转型的标志之一便是建立标准化的治理体系,将复杂的事项简单化,把简单化的治理要素量化,将量化的因素流程化,将流程化的运行规则化。例如,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通过不同信息渠道提交的原始诉求需要被识别,分类成不同类别的信息以实现内容的甄别,这一原则并非与地域空间相关,而是与数据整理的虚拟空间相关,从而实现治理流程的标准化。对诉求做标准化的筛选并不是以排除或不接受某些诉求为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对诉求进行分类以明确治理的责任主体。在“12345”热线中,诉求工单需要记录问题分类、工单分类、发生地址、被反映单位等信息,将诉求人的语言转化为简捷有效的文字信息,并使其进入办理流程。

这一标准化的流程有助于将政务服务流程进行优化,有助于推进治理目标、路径和方式可分解、可量化、可考核、可制度化。然而,标准化也使一些复杂的、不规则的诉求如何处理成为难题,尤其是一些“无理”的诉求在反映的工单中因难以被甄别而吸引大量治理资源。由于热线的便利性,一些无理诉求或者非公共性的个体需求大量涌入,挤占了原本应用于公共服务或公共诉求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因此,对于是否在诉求热线中实施实名制以及设置门槛引发了激烈讨论,尤其是“无理”诉求对基层干部造成的考核压力,引起了基层干部对诉求输入低门槛较为强烈的反对意见,而这与标准化的诉求工单无法呈现和识别复杂的诉求情境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在基层干部考核体系中不得不引入剔除规则。

对于不属于政府工作范围而应当被剔除在外的诉求,需要明确的剔除清单才能够在科层体制内执行,因此剔除诉求本身也成为类别化的分类工作,与可以被接收的诉求分类一同成为政府回应的信息参考。与进入诉求处理流程中的“合理”诉求不同,可剔除的诉求需要符合特定的类别且与政府的工作内容相一致,如按照 A 市的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涉法涉诉类诉求应移交相应部门。这些难以被精准识别的诉求工单各有特征,一般来说涉及政府部门的工作边界问题,如跨部门协作、历史遗留问题等。这类诉求工单往往在诉求信息的处理阶段便反馈到诉求处理流程之中,需要通过挂账、剔除、转交和研判等信息标记手段进行工单二次处理。

① 数据来自 2021 年 A 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年度数据分析报告。

② 数据来自 2022 年 A 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年度数据分析报告。

标准化的诉求工单处理流程在面对可以被明确分类的诉求时是高效的,能够精准对接民众诉求与承办单位。但面对复杂情况时,这一信息传输流程便会陷入“空转”的困境。由于诉求工单难以从信息的输入端进行甄别,即使这一“不规则”的诉求最终能够被认定为可剔除,但为了尽可能保证使用剔除机制的谨慎性,针对剔除工单筛选的证明要求又极其繁琐。这也导致基层部门需要一个专班来专门处理剔除的文件提交和反馈,以及有选择、有策略地使用剔除的额度,保证基层或部门在考核排名中能够处于有利位置。一般来说,剔除的数量依据指标比例确定不能超过接受诉求工单总数的特定比例。

与诉求剔除量增加相对应的是被认为“无理”诉求的工单越来越多,而这种“无理”性是难以从接收工单的记录上直接判断的,需要分流到对应部门进行筛选,将简化后的信息再度还原到治理情境中进行鉴别。某种意义上,“无理”诉求只能交由直接处理的基层部门回到治理场域中来甄别。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剔除量能够占到诉求工单总量的 70%^①。可剔除的诉求工单数量增长也引发了接诉即办剔除专班在行政体制中重要性的增加。他们需要掌握精准剔除的工作方法以便能够在“一单定生死”^②的竞争格局中胜出。

由此看来,标准化的诉求处理流程难以应对不属于政务服务处理的诉求以及不合理诉求不断涌入的回应困境,系统的“空转”使政府必须不断扩充可被剔除的工单类别,使这些特殊工单的剔除能够按照清单化的方式被不同层级政府执行。承办单位对剔除工单支撑材料的细致罗列又占据了治理资源中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究其本质而言,服务于数字系统诉求工单处理的闭环流程无法与真实世界发生关联,不规则诉求与不合理诉求植根于现实世界情境关系中的不合理根源难以被简化、标准化的信息记录所捕捉,致使投入在诉求分类筛选中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无法根除不规则、不合理诉求数量不断增长且在数字系统中“空转”的治理困境。

(三) 诉求处理的高压化、治理成本的高昂化与治理目标的数据替代

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快速反应是数字治理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较为传统的“网络问政”形式中,公众之“问”并不一定能得到政府之“答”的精准回应^[14],回到现实层面的诉求解决仍需政府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回应的时效性受到行政体制机制的影响。但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支撑,建议服务型政府使得行政内部压力的传导与信息的快速传递产生乘数效应,形成了对诉求处理“又快又好”的严格要求,进而对基层政府形成一定的压力。

以 A 市“12345”热线为例,一方面,该市对诉求承办单位的反馈时间进行了明确规定,突发事件和不稳定因素以及其他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诉求应在 2 小时内反馈,基本民生保障(水、电、气、热)和极端天气等及时性诉求应在 24 小时内反馈,一般诉求应在 7 天内反馈,复杂疑难诉求应在 15 天内反馈;另一方面,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核心的“三率”考核指标的周期性排名以及落后问责的奖惩机制也使各级政府以增强领导注意力的方式自我加压,致力于提升三率的数据以取得竞争优势。

如前所述,“12345”热线系统难以有效甄别个人诉求和公共性诉求,致使市民的日常诉求与解决成本较高的难点问题被同等对待,在高压化的诉求处理要求下,又使解决市民的日常诉求

① 数据来自 2022 年在 A 市 P 区 D 镇负责“12345”接诉即办工作负责人的访谈。

② 每个月度的考核竞争异常激烈,导致基层部门争相要将一些容易被诉求人“双否”(不满意、未解决)的案件剔除。

投入的治理资源过多,挤压了基层治理的空间。对群众日常性诉求的回应本身其实应属于政府运作的常规工作,当这种常规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升后,政府回应的积极性虽然从响应率的数据来看是100%,回应周期缩短却并不一定带来有效治理,反而有可能催生形式主义、策略主义等对治理目标的替代行为。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解决难点问题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因此在较强的行政问责压力下,一般更倾向于选择完成容易治理的诉求工单。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虚假工单的制造流程中,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自编自演”的诉求上报,提交容易被解决的工单,以增加高满意率和高解决率的基数来对冲考核指标中的低解决率、低满意率工单,提高考核排名。而诉求处理的快速响应要求,也导致诉求办理的精细程度较低,产生尽快满足诉求人要求的回应变异。如某景区诉求人通过电话投诉湖边某节栏杆因螺丝松动发生滑动,第二天由镇政府相关部门致电回复诉求人处理进度,并通知当地承办单位紧急加固所有护栏,第三天由景区所在村级单位进行回访,以争取诉求人对处理结果的较高评价。对诉求人来说,政府的回应非常迅速,处理结果也较为合理,但原本仅需单节栏杆的维护,由于诉求人与承办单位间缺乏沟通,出于安全性的综合考虑,最后变成对所有栏杆加固,仅强调速度而不考虑成本。快速完成诉求而非简约低成本地完成诉求,致使群众诉求的情境性与政府回应行为产生错位。基层政府的回应仍然是在高效的前提下忽视诉求人的治理参与意愿,而使政府回应成为单纯对问题的程序化解决。概而言之,在高压的诉求处理目标与高昂治理成本的约束下,原初意在推动基层政府快速有效回应民众诉求以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性目标,演化为以自我生存为主导的“数据竞争”,从而产生“目标替代”^{[15]57-58}现象。

三、数字技术、治理关系变革与数字治理“内卷化”

数字技术的引入深刻地重塑了政府回应民众的治理流程,以畅通民众表达渠道的方式提升了政府的回应速度和回应能力。民众提出的诉求信息直接抵达市级层面的诉求统一受理平台,经过筛选后的标准化信息经由行政系统的驱动最终落地为承办单位的诉求解决实践。这一看似闭环的诉求处理流程,为何会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之中?其核心仍在于如何处理技术与治理的关系,尤其是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了治理关系。具体而言,信息的输入、筛选和处理事实上改变了治理的主体关系、情境关系和责任关系。

(一)数字治理主体关系的“去中间化”

在传统的科层治理中,信息的传递形式是通过政策的逐级上传和筛选,治理任务也是随着政府层级的上升变得“少而重大”,绝大部分的事务是在基层化解,如“枫桥经验”,主张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这一模式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地域广袤的特征有关,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需要高度依赖广大的基层组织或社会组织,客观上也是国家基础能力不足的结果。因此,自古以来强调基层的简约治理,主要依托基层组织以及与之对应的中间阶层来化解基层社会的矛盾,但这一模式也长期存在着政府层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困境,导致民众的一些重要诉求与上级政府之间可能存在隔阂,甚至有意被中间层级的组织所筛选和过滤,产生各种“捂盖子”的行为。换言之,传统的政府组织结构呈现层级制的特点,各级政府的治理实践被汇总成信息向上传递并接受上级政府的工作安排,由于条块本身的协同与各层级政府治理能力的差异,这一过

程往往存在部分信息失真问题。当前,信息技术的引入在增强数据与信息在层级间流动的同时更推动政府组织层级向“扁平化”发展,淡化行政组织的层级色彩,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数字化治理模式使上级政府有了直接面对民众的更多可能,从而更大程度上解决了科层体制内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形成了对下级政府更有效的监督。换言之,技术治理重新塑造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民众在数字治理中有更多机会发挥治理主体的角色,但同时也导致了治理的“去中间化”。

治理主体关系的“去中间化”最直接表现为原先信息的逐级上传机制被信息的跨层级传递所取代,社会层面发生的实际问题有机会直接进入政府决策视野内。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关切以高位响应的形式经由党委统筹再向各层级承办单位传递任务。在数字化诉求闭环处理系统中,复杂化诉求的治理过程,增加了派单与转派的中间环节,并增强了对于处理过程的全程监督使原本发生于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诉求—办理”流程置于上级政府的关注下。这一逐渐完善的数字系统广泛存在于各类技术治理工具的使用之中,例如网络问政、市长热线、书记信箱等,都是通过信息的跨层级传递由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进行直接回应以提高回应的强度,促进事件的圆满解决。因此,通过数字治理的改造,一方面实现了对民众的赋权,另一方面强化了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与之对应的是,作为中间代理层的基层政府的权力相对弱化,处于较为被动的角色。

数字治理系统在解决科层体制内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社会与上级政府决策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注意力有限与治理精度的难题。以A市“12345”热线为例,民众输入的诉求内容与科层体制层层上报的内容一样,也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出现选择性呈现,这为后期的信息筛选和处理都增加了难度。在信息输入端,市民诉求数量的不断扩张又注定了上级政府的领导注意力只能够在诉求中进行有限选择,挑选重大、紧急的治理问题进行优先处理或挑选有代表性的一类治理事件以彰显政府回应的善治。大量小而琐碎的治理事件的实际解决还需要交办到具体的负责部门或基层政府手中,还原到治理情境之中。由此导致,这些事件原本可以通过基层政府或基层组织直接解决,却在信息“输入—筛选—派发”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治理主体关系“去中间化”深层表现为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弱化。在“12345”热线中,热线系统所带来的诉求外生性不同于先前诉求解决的处理流程依托于具体的物理空间,热线系统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诉求越过基层政府上传至市级层面再派发,基层工作人员成为执行上级行政命令的执行者与面向居民的服务者,消解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而对于政府来说,去除中间层政府对于信息的筛选,则出现了难来越多难以被定位的“人”和“事”。信息传递的灵活性造成了诉求发生的情境、人员、承办单位间的适配错位,仅靠热线系统记录的诉求使诉求之间、人与人之间、治理责任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分割为一个个单一且独立的治理事件,依照事本化的处理逻辑交由治理层级解决。诉求处理的流程越是遵循“事本”的逻辑,强调理性特征,民众就越难以对变动的、仅电话联系的诉求处理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而仅仅对政府形成快速回应的整体认知,或者形成“上级政府都是好的,都是基层政府(组织)的问题”的认同差异。拨打电话的主动行为使民众产生行使和保护自身权利的积极意识,而将政府所作出的回应行为视作理所应当,极大地影响了民众主导下干部与诉求人之间的主体关系。社会问题本质上

并非依靠技术来实现“科学化”的解决,而应是一个“社会化”的应对过程,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行动^[16]。但在实践过程中,回应的流程性要求与快速响应的压力可能迫使承办单位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民众评价的满意,反而使实际治理参与的主体关系发生倒置,演变为政府单方面对民众诉求的办结,而非理解民众诉求后的系统化治理,压缩了自主治理的空间并降低了主动治理意愿。

(二)数字治理情境关系的脱域化

在治理实践中,基层治理的大量问题和诉求通常在特定的物理空间下进行。在这样特定的物理空间中,诉求人和解决人的行为深深“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然而,随着数字化治理的推进,其标准化的设置使得治理对象的信息简化为一种统一的标准被记录,但也因此消解了治理的复杂情境,出现数字治理情境关系的脱域化。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脱域”的概念,他认为:“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7]¹⁸⁻¹⁹ 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的人及其行为摆脱了原有空间地域的限制而在另外的时空维度重新建构,造成社会交往的时空错位和异时空套嵌。

以A市“12345”热线为例,为了获取明确的治理信息,在数字系统之中需要对信息的输入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要求,这一点通过接线员的细致工作来完成。民众诉求的提交由于其内容的复杂性与表达的不精准,往往很难自行将诉求分类为准确的治理类别,通常需要接线员对信息进行记录和整理。此时,分类便成了将初始信息筛选为系统可识别的类别信息的第一步,诉求人的诉求从其生活的情境之中脱离出来,被精简化和标准化处理之后以对接具体承担诉求解决的部门。这种简化带来了清晰化与模糊性的矛盾、普遍化与情境性的矛盾、静态化与动态性的矛盾、非人格化与人的自主性的矛盾、去政治化与政治博弈的矛盾等多重困境^[18]。同时,由于诉求处理的工作人员具有变动性,并非自始至终对诉求人追踪,而是在接诉、回访、处理等不同环节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这就要求对内容的理解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理解的达成同样建立在简化后的精确信息之上。

具体来说,数字系统信息提取的去情境化正在塑造越来越多的“重要小事”。原先治理情境之中的细碎琐事,以及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由于信息提取时的标准化记录与简化,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并可能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例如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的诉求人会因为某些事情对镇村干部的不满而投诉诸如环境卫生、垃圾桶站摆放等合理小事,为干部增加工作量。有的诉求人因为宅基地纠纷与邻里、村干部产生矛盾之后,即使事件的处理结果已经得到相关执法部门的确认,却仍通过拨打“12345”的方式与村干部反复扯皮,要求解决其不合理诉求。有的诉求人不遵守社区排队的规则拨打“12345”索要停车位,但其向接线员表述为社区和物业长期不解决自己的合理需求。这些对于诉求合理性的识别往往依赖于具体的治理实践,由于治理情境的脱域化,原本在社区层面可以直接处理或者被筛除的“重要小事”和“不合理诉求”大量涌入数据系统。这些事件虽然部分符合“剔除”的标准,但高标准剔除要求和高风险的剔除机制的使用门槛,则要求承办单位需要尽一切可能证明剔除的合理性,导致基层干部的时间和精力极大地消耗在少数不合理而需要不合理的系统证明环节。

情境关系的转变不仅表现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的去情境化,而且影响治理事件本身的处理。在A市“12345”热线中,为了保护市民的隐私,允许诉求人不暴露自己的联系电话等信息,这就导致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变成基层政府(组织)单向度的任务,市民仅仅成为旁观者和监督者。即便允许出现联系方式,诉求人主要扮演的角色仍是评价者,而非作为共同参与治理的主体。由于治理情境的复杂性,有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对于基层来说,可能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协调解决或对诉求人开展情绪疏导。但数字系统的记录只有简化的结果,治理的过程难以在数据上得以体现,从而无法被精确测量。而最终的评价权又掌握在市民手中,回访的对象又是市级层面的工作人员,当诉求人与基层干部协调的结果与回访结果不一致时,基层干部便会产生明显的挫败感。如此一来,数字治理带来治理主体之间的分离,由于缺乏有效的面对面沟通,容易导致事件处理的低效和无效,同时也加剧了诉求人和基层干部之间的不信任。事实上,基层问题的解决通常不仅仅是治理事件本身得到处理,而且再造治理主体之间的人格化关系和信任关系,也通过治理过程确立规则,再造治理情境。治理情境一旦“脱域”,数字治理原本可能具有的治理效率也就大大耗损。

(三) 数字治理责任关系的过载化

数字治理所倡导和关注的是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互动以及社会公众利用技术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19]。数字治理侧重治理行为的抽象性,并逐渐演进为信息技术从政府组织内部向外部的延伸,实现对组织内部的赋能与对公众的赋权,以实现高强度的体制外社会动员和体制内行政动员。不过,数字治理的重点是上级政府构建对基层的监督能力、国家的直接治理能力以及民众在治理中提出诉求的能力。相反,作为中间层的基层政府(组织)则面临上级政府与民众的双重监督、评价与考核。与此同时,由于数字治理的信息容纳性、传递性较强,使得治理领域从单一向全域拓展,治理任务也从传统的单任务为主转向全领域中心工作。换言之,在责任关系上信息技术、数字化与科层内部的压力传导形成了叠加效应甚至乘数效应。

以A市“12345”热线为例,在理想意义上,上级政府与民众形成对基层政府的双重监督,在形式上对工作人员提出精细化的要求,重视数据流量、各类报表以及留痕化的记录,运用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进行考评,兼具过程与结果、主观与客观不同向度的综合考核,减少容错空间,有助于倒逼基层政府(组织)开展主动治理。在实践中,也确实实现了部分效果。对于基层治理干部来说,努力使本辖区成为无诉求行政单位,是相对容易得到表扬和最不容易产生行政压力的治理目标。零诉求被认为是镇(街)治理有效的表现之一,体现了干群关系的融洽与较高的治理能力水平,同时在考核上也被划分为排名靠前的一类,不容易因为考核指标的不确定性而承担责任风险。实际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基层干部往往希望群众能够在有需求的时候直接通过找居(村)委会的方式解决诉求,从而绕过数字治理诉求解决流程的繁琐环节,减少自己的行政压力。然而,考核重点集中在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对基层形成了较大压力。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基层中总有一些无法解决或者群众主观不满意的事情,导致在不能解决和不满意的事情作为分子相对恒定存在的情况下,能解决的诉求作为分母如若明显减少,反而导致解决率和满意率较低。正如一个乡镇干部所言:“我们主动办理后排名反而降低了,这让我们非常沮

丧。”^①不仅如此,考核压力倒逼基层进行主动治理还出现了基层组织对群众诉求提交的压制和诉求解决的利益交换现象,同时这一数字治理手段也成为部分民众制约相关工作人员的方式,影响治理效果并产生负面的示范作用。正是数字治理与科层压力的叠加产生高位、快速响应,使得干群关系围绕数字治理手段产生了异化。

事实上,上下级政府在类似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问责与约束机制。当下级政府无力按时完成上级政府设定的指标任务时,就可能产生以“虚假数据”应对上级检查的情况。下级政府往往迫切希望做出工作亮点来获取上级注意力,由此可能出现数据目标的替代,产生“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现象。在高压和快节奏的数字治理考核目标下,基层政府(组织)需要在限定时间内以诉求回应为首要工作,导致基层工作的节奏安排需要围绕“12345”诉求进行。一旦基层缺乏足够能力回应多样化的群众诉求,便可能产生各种异化。

由此可见,尽管信息技术天然带有扁平性特征,但在实际过程中信息传递只能在特定系统中进行,很难打破原有的科层壁垒,实践过程并不能实现信息技术的全面价值^{[20]49-50}。数字治理一方面试图改变科层治理,形成对社会更直接的面对面动员,另一方面又依赖科层制提供的底层支撑来回应社会诉求,尽管数字力量也在推动行政内部的强动员,但民众诉求的增长速度一旦超过行政内部动员所能解决问题的速度,便会形成数字治理的责任过载,对解决问题的中间层形成较大压力,进而产生“目标替代”。

四、结论与讨论

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的意义和可能,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数字治理理想化目标能否实现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一项有效的数字治理机制,在激发公众参与收集广泛信息的基础上,如何不断降低治理内容的膨胀是实现高效治理的关键问题。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行政体制的过程中,信息传递的跨时空性改变了民众诉求在政府层级间的流动,群众直接面对上级政府的去中间层治理关系带来了治理内容和数量不断增长导致的治理成本上升。在行政体制内对诉求信息处理的筛选过程中,治理情境的脱域化使治理实践以标准化的形式在数字系统中再现,造成一些无理诉求的“空转”。在行政体制对诉求信息的解决过程中,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导致解决问题的中间层形成压力过载,进而产生目标替代。数字治理“内卷化”的现象是数字逻辑对治理逻辑与治理关系的改造,倒逼科层体制治理实践与数字技术应用相适应的结果,数字技术从辅助治理的工具手段转变为主导基层工作的关键变量,使不同层次生发出“内卷化”现象。

这一数字技术对治理的反噬后果,不仅体现为治理效能的低效增长,还体现为工具理性思维对人本思维的侵蚀与替代。现阶段,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尚难以在缺乏足够治理样本量的基础上对治理机制进行较好的融合创新,数字治理的落地仍然依靠基层的信息搜集与上传。在数据的挖掘使用方面也缺少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共通,线下的治理场景难以与线上的数字治理

^① 2021年5月对A市H区某街道负责“12345”热线的基层干部的访谈。

场景相互贯通。一味强调治理的数字化改造容易分化治理主体,割裂干群之间的沟通联系,引发因对数字治理理解不一而导致的信任问题。对于数字治理的应用场景来说,政务处理过程不同于治理过程,治理本身所依据的地方性知识难以概括为统一的规则制度,在生产标准化信息与处理信息标准化方面存在困难。而试图用人为制定出来的标准去规制治理实践,无异于按图索骥,难以分清何为真实的治理目标。

什么才是有效的数字治理?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正确理解数字与治理的关系。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远不止政府政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与线上政务的打通,而是在与科层体制的协作过程中,对民众与政府间信息传播的深刻改造所引发的政府回应强度难题。当国家直面民众诉求时,既有逐层传递信息的科层体制只能通过行政体制自身的压力推动诉求问题的解决,包含在治理情境中的治理实践被简化为诉求的类别化记录或交由属地处理难以分类的复杂诉求工单,缺乏中间层级的协调与鉴别使大量未经辨别的诉求持续对行政体制产生冲击。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基层政府对数字化行政形式的接受与技术催生善治的大数据分析,也需要对民众参与数字治理的过程和回应诉求的行政层次进行明确规定,引导干部与群众的观念变革。破解数字治理的“内卷化”问题,需要审视数字技术引发的治理关系变革,在数字治理中更好地平衡治理主体关系以及明确治理的边界,回归场景式治理和善治的原初目标,发挥数字信息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具体而言,解决数字“内卷化”的治理,重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数字化治理重点落在数据的辅助决策上,在市域层面重点通过数据挖掘抓住高频难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系统治理和主动治理。当前A市在深化接诉即办改革中推行的“每月一题”机制便是从市级层面进行高位统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政策空白、痛点难点问题,进而推动政策出台、职责厘清和常规治理机制的创设。其次,减少因数字化治理的过度监督而导致的形式主义和基层压力过载,给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主空间,重点监督痛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而非对所有“小事”的监督,避免数字治理的无限扩张。最后,厘清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责任,包括让群众形成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在具体的治理情境中鼓励通过基层协商,让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避免因为数字治理的便利性和高效性催发“无公德个人”的形成。

参考文献:

- [1] ROBERTS A, KIM B Y. Policy responsivenes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ublic preferences and economic reforms [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1(4): 819-839.
- [2] 董伟玮, 秦音. 纵向治理结构中的基层行政: 结构坍塌、行动裂解与协调进路[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 45-56.
- [3]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4] 王翔. 我国电子政务的内卷化: 内涵、成因及其超越[J]. *电子政务*, 2020(6): 63-72.
- [5] 曹银山, 刘义强. 技术适配性: 基层数字治理“内卷化”的生发逻辑及超越之道[J]. *当代经济管理*, 2023(6): 35-40.
- [6] 王春城, 佟明熹. 让“治理”回归“常理”: 基层运行“内卷化”的组织学归因与调适[J]. *新视野*, 2023(1): 96-104.
- [7] 胡卫卫, 陈建平, 赵晓峰. 技术赋能何以变成技术负能? ——“智能官僚主义”的生成及消解[J]. *电子政务*,

- 2021(4):58-67.
- [8] 刘永谋. 技术治理、反治理与再治理:以智能治理为例[J]. 云南社会科学,2019(2):29-34.
- [9] 陈那波,张程,李昊霖. 把层级带回技术治理——基于“精密智控”实践的数字治理与行政层级差异研究[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5):45-53.
- [10] 安永军.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J]. 探索,2022(1):149-162.
- [11] 陈锋,王泽林. 全域中心工作:市民诉求驱动的基层治理——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38-148.
- [12] 雷望红. 被围困的社会:国家基层治理中主体互动与服务异化——来自江苏省N市L区12345政府热线的乡村实践经验[J]. 公共管理学报,2018(2):43-55.
- [13] 陈锋,宋佳琳. 技术引入基层与社区治理逻辑的重塑——基于A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案例分析[J]. 学习与实践,2021(4):84-94.
- [14] 于君博,李慧龙,于书鳧. “网络问政”中的回应性——对K市领导信箱的一个探索性研究[J]. 长白学刊,2018(2):65-74.
- [15] MICHELS R. 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M]. Ontario: Batoche Books,2001.
- [16] 李文祥. 集体社会工作:基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方法创新[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02-110.
- [17]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8] 李宜钊,徐艳晴. 精准扶贫中信息失准的发生机理——基于问题的复杂性与技术治理效用边界的解读[J]. 中国行政管理,2019(11):19-24.
- [19] 刘永谋. 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及其启示[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48-54.
- [20] 简·芳汀. 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 邵国松,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Technology Reshaping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and Digit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Taking “12345” Hotline Driving City Governance as an Example

CHEN Feng¹, WANG Zelin²

(1. Beijing Social Governance Research Bas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driven from data resources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has become the proper meaning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Digital governance has a two-way enabl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but it needs to effectively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bureaucratic system,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dilemma of “involu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Taking the “12345” hotline in a city as an example, the “involu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occur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oper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input stage of appeal information, the cross-space-time natur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akes the masses change from step-by-step transmission to directly facing the upper

government, and the higher government realizes the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appeal processing, which shap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bodies of de-intermediation governance, resulting in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governance content, quantity and cost, while the space for independent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s reduced. In the stage of appeal information screening, realistic appeals circulate in the hotline digital system in the form of simplified and standardized information, and the situational relationship of appeal resolution in governance practice is out of domain. Unreasonable appeals and repeated appeal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governance situation are disguised as single appeals, thus breaking through the restraint of the origi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ccupying a large number of governance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destroying the original governance tradition and rules, and causing the idling of “unreasonable” appeal work orders in the hotline system. In the stag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r execution, the responsibility relationship of appeal governance has changed due to the multiplier effect of bureaucratic pressure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have target substitution behavior due to pressure overload. The “involu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logic and governance by the logic of digital technology, which makes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e from a tool to assist governance to a key variable to dominate grass-roots work. The consequenc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governance are not only the inefficient growth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but also the erosion and substitu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 thinking on humanistic think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volu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we need to examine the change of governance relations caus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porting rol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focus on the decision-making assistant function of data mining at the municipal level,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responsibilities,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arious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avoid excessive supervision of digitaliz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should assist scenario-based governance and stimulate the subjectivity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the masses.

Key words: digital governance, municip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12345” hotline

责任编辑: 牟 怡

引用格式:张伟军,蒋锐.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方略[J]. 探索, 2024(1): 129-143.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方略

张伟军¹, 蒋锐²

(1.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237)

摘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生成,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紧迫的现实逻辑。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内在地包含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在文化建设方面实现了从文化立国、文化兴国到文化强国的历史性成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战略,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客观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要求。要坚定文化自信,以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为保障,综合施策,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要秉持开放包容,以坚持文化开放为动力,海纳百川,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要坚持守正创新,以“两个结合”为重点,推陈出新,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长期、系统、艰巨的文化工程,需要持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提升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使命; 生成逻辑; 实践方略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24)01-0129-15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重要力量支撑^[1]。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的二十大以来,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均衡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文化议程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指出“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2]。习近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是由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共同推动的,而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也需要党制定科学策略、探寻可行路径、系统统筹推进。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的提出和设定,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初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统一战线经验研究”(22ZDA016),项目负责人:蒋锐。

作者简介: 张伟军,男,博士,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and 新疆警察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蒋锐,男,博士,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心使命决定的,也蕴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超越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建设的理论争论和实践困境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文化领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题中要义和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想图景的呈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象征。

(一) 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文化蕴涵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主动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责任。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党的初心使命的内涵所规定的。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塑造和强化自身的使命担当,不断充实和丰富初心使命的具体形态,探索、拓展、践履初心使命的方法路径,从而提升政党能力、提升履行初心使命的能力、兑现初心使命的政治承诺。

中国共产党自觉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命题,意味着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政党行动的精神根源,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制定战略、作出决策、推进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理论方法,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号召并付诸实践,为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因失败导致的精神虚弱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向,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总体基调。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在全社会激发了创新创造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文化现代化程度空前提升,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视野、积累了丰富资源。进入新时代,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党和国家也面临全新的任务目标,针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多内容和更高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不断推进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进程中得以建设,具有文明类型学意义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不仅是“在努力寻找一种综合物,以代替西方文化和它的对立面、被排斥的儒家文化”^{[4]124},更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的价值崇高性和时空宏远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向更高层次人类文明自觉的追求跃升。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责任主体,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近代以来,不同文化流派各自提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张,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文化复古派还是“全盘西化”派,他们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及其前途的主张,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5]。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案,切合中国具体实际,因应党的初心使命。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决定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其文化观会转化为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政策并在其执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在于其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具有的理论优势,长期领导文化建设所具有的丰富实践经验,全覆盖的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强大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以及党内拥有大批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具备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化使命的主客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文化结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在百年实

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的科学文化观。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形成,历经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社会主义文化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发展演进。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形势和要求也出现新情况新变化。习近平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建设规律、因应内外需求,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命题,创造性地形成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内容科学、风格鲜明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遵循。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集中理论表达。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的完备性特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体,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和根。习近平指出:“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层面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建设囿于保守与激进的困境,为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打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广阔道路,使得近代以来或明或暗的文化实践道路之争得以解决,避免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因内部反复争论而产生的文化内耗。从根本上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目标和理想图景不是回到传统老路,也不是沿袭过往社会主义文化模式,更不是照搬西方文化发展套路,而是在超越保守与激进的基础上坚持稳健开放包容原则、兼容并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进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 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践履历程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象征,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一是中华民族复兴必然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实现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文化纳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结构中,使得党的使命内容更为丰富和完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整体使命的完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二是推动中华文明复兴的理想图景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复兴,不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再版,也不是其他人类文明的翻版。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将在统合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其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明的再造和新生,向世界呈现与以往和既有文明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自身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也要保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和一百多年民族复兴史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发展历程的必然逻辑。首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立国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是新中国,在于政治之新、经济之新,更在于文化之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实践中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7],推动人民性、民族性、大众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规模建设,形成一大批具有鲜明政治色彩、民族特性、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作品。这些作品紧密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直白通俗的语言风格、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覆盖全民的传播路径,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内化为广大群众的思想观念,确立为新中国建设的文化根基。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兴国实践。改革开放首先从思想文化领域发起。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与推动下形成“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基础。思想解放促成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大发展。一大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典籍得以重新出版研究,拓展了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思想理论视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更广视角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在思想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文化与经济相得益彰,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形式、新资源和新路径。大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使得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改革开放中不断丰富、人的素质不断提升,从而推动人的综合发展进入新境界。

再次,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强国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综合治理,批驳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思想舆论。在教育领域,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政课建设,推进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媒体舆论传播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推动融媒体建设,加强网络新型媒体经营管理,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和行业自律,开展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在文化理论建设方面,提出要坚持文化自信,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提出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命题,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支撑体系。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逻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的激烈竞争,更是意识形态、国家制度、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长期较量。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应对“两个大局”的文化战略,也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平台依托和具体实践。

(一) 新时代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战略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下世界局势的认识与判断,其自身意涵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及其文化后果。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提升,以英、美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文明框架下取得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成就,形成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方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在经济总量上开始逐步接近甚至超越一些西方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显现,发展出现疲态。东西方力量的变化使得各自代表文化的地位也发生变化,需要对东西方文化作出新的审视,长期形成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正在发生动摇,西方文化优越论在现实面前也需要作出改变。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重新评估,特别是面对西方文化主导下的世界出现一系列问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文化的关系之间的冲突矛盾等,此时,更要重视中国文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拥有的不同于西方的经验和优势,及其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的契机。

其二,全球化内涵变化以及文化形态。以经济全球化引领的全球化浪潮在 20 世纪 90 年代席卷全球。进入 21 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治理出现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发酵并在部分国家主导政治议程,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受到挑战。第一波全球化后遗症持续发酵,文化、宗教、民族以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发生且有扩大化态势,显示传统全球化需要新的改变,世界呼唤新的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秩序。传统全球化的文化根基生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实质是西方文化借助全球化推广到世界各地,给各地本土文化带来冲击,反全球化在文化上表现为各民族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和反抗。新的全球化必然需要平衡各种不同文化的传播,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相互借鉴,反对打着全球化旗号的西方文化霸权。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在促进文化自愿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为新的全球化提供新的文化价值根基。

其三,国际治理体系变化及其文化因应。导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直接因素是利益冲突,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争取和维护。国际治理体系变化的本质是国际利益分配机制的变革。各民族文化利益是民族利益的重要内容,国际治理体系的文化根基要反映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追求。文化塑造民族的思想观念,是各民族行为的深层根源。因此,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化解全球化的深层困境,改革国际治理体系的结构,需要人类在文化层面的创新创造,更好地理解彼此,寻求各民族文化共识,建立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采取更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行动提供思想基础。

结合东西方力量对比、全球化内涵以及国际治理体系变化导致的文化后果、形成的文化形态和采取的文化因应,可以看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战略。这一文化战略在国际层面体现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8]。面对新的世界变局,中国需要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在变局中开新局,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论证自身发展的合理性,解释中国发展的经验,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塑造中国发展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拓宽推动中国发展的空间和路径。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充满动荡、竞争,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自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关键作用,文化思想理论等软实力的竞争也将非常激烈,在硬实力旗鼓相当的情况下,软实力的作用会更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旨归并不是追求文化霸权,而是解构并超越既有文化霸权,为陷入文化冲突、文明冲突的人类社会找到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这种可行性源于中华文化中的中道观念、和合观念、天下观念等文化基因,也源于马克思主义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旨归。

(二)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地理文化区隔向全球化迈进的历史发展进程。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以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先导,辅之以文化思想的全球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视野和全人类关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世界格局和人类视野的现代性政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本体上看是以中国为本位的文明建设逻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情境决定的。同时,以中国为本位的文明建设具有世界和人类的整体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为中华民族立心、为中国人立命,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往圣继绝学,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现实需求与未来发展贯通起来,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西方以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传统为底色的文化理论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结构性困境。诸如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的殖民扩张、侵略战争、文化冲突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基因相关。当代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治理问题,如气候问题、地缘冲突、全球化倒退、两极分化等都与传统西方文明的结构性缺陷具有关联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治理出现的民主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伦理赤字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结构性缺陷和矛盾长期积累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价值上看,要为当前人类世界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探索新的文化方案,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找到可以借鉴的、能够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难题和世界治理困境的道路与方法,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在此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为世界和平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践行文化使命的理论原则是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底气所在。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9]127}。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正确认识、科学分析和准确评估的基础上,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重要因素,正是海纳百川的文化气概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韧性,使其能够借鉴不同文化元素并保持自身不断适应时代变迁。守正创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遵循的路径原则,只有守正才能不忘本来,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本来。在思想上要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0]247},实现从文明自觉、文明自信到文明超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任务。基于以上原则,中国共产党落实文化使命实践的理论逻辑是推进“两个结合”,同时在“两个结合”实践过程中,需要保持对世界其他先进文明的关注、研究,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推进中华文明的系统性、协同性、融合性、包容性、超越性创新。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方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实践工程,需要制定科学的实施方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条不紊推进。习近平强调,“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2],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搭建了基本框架。坚定文化自信,核心要求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秉持开放包容,价值旨归是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坚持守正创新,总体目标是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方略的基础工程,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方略的应有之义,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方略的总体目标。

(一) 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安身立命的基础,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

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1]。文化主体性的形成、确立和发展,是文化类型成立的显著标志。作为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等的综合表达,文化主体性呈现为一种包括历史、观念、制度、实践等在内的多维结构体系^[12]。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关键在于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和确立了稳固的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确保了自身发展的连续性,确立了自身的文化优势地位,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重大挑战,重新树立中华文化主体性与近代发展历史相随始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推进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涵摄融汇并创新转化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历史文化起点上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内涵、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设计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掌握文化阐释话语权、搭建文化主体性展示平台。

第一,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基础。文化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概况为文化影响政治、政治塑造文化、政治与文化相互作用。文化主体性的形成、确立和巩固,需要政治体系的保障。这是因为,任何文化形态,只有与相应的政治相适应并得到相应政治体系的承认和保障时,才能拥有繁荣发展的政治环境。反之,一种文化形态如果得不到政治体系的支持,就会成为政治的反对力量,最后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中消亡或者衰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适应和维护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维护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因此,新时代发展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首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自然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和正确运用。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体制机制,提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文化领导能力,改进和完善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工作及方法体系,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发展相向而行,推进文化与政治良性互动,互为基础、相互塑造,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基础。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理论根柢。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怀、中国实际和世界发展趋势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怀从根本上看是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情况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武器,作为与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竞争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人类理想图景的展望,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的本性追求。但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客观历史背景与中国的历史背景存在不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力量和真理力量,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所证明的一条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连续性最长的中华文明史中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维持其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指导地位,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1],能够使马克思主义成

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使得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主体性得以保持,进而找到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正确道路。

第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内核。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极端重要的工作^[13],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范畴,决定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思想内核,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覆盖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彰显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塑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规范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基本维度是凝聚力和引领力增强。从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功能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增强的根本在于能够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并运用中国话语提出中国方案。对此,需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夯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14]。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功能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增强的根基在于“原人情之理”^[15]⁹⁹,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教育体系中的科学建构,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活化,使其建构发展与中国人的思想结构、生活习惯、风俗民情相结合,植根人性、直达人心、符合人情、顺应人理,同时着力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政治话语转化为日常生活话语,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内在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

第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16],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基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精神标准和外在行为规范。新时代,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要的是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蕴。一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概念、核心范畴、主要命题的深度学理化、哲理化、体系化和经典化。以深厚的民族情感和人民性为基础,增强和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意蕴,不断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道德权威内涵,提升其在全社会的道德约束力。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民的引领作用。在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提升人民道德素质和行为规范,强化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17],也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和权威效力。三是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一致和协同建构。在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的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具有示范作用,能够促进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在于实践,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机制创新,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层次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推进高质量思政课程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法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一体筹划推进,提升各类宣传教育工作合力和效能;借鉴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国家各类考试结合起来,与具体的发展联系起来,激励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认同和践行;要在文学、影视等各类艺术作品创作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容,持续创新和塑造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于人的思想观念之中。

第五,构建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展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特征。文化主体性需要一定的形式反映,文化符号是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主要外在形式。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有丰富的内涵,更要构建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要构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元素、突显时代发展特色的新时代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文化符号具有直观展示文化内容、发挥文化娱乐教育宣传等功能,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具有其他文化形式难以具备的展示效果。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符号体系^[18]。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重要财富,还有其他一些民间共同认可和使用的符号如龙的形象、中国结、戏剧脸谱、乐器乐曲等,都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国汉字体系,集语言沟通、艺术创作和民族属性于一体。新时代构建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不仅要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加强对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要根据时代发展,赋予传统文化符号体系以新的时代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新的属于新时代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诸如新的建筑作品、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及独具特色的科技产品等,都可以成为具有辨识性的中华文化符号标识。通过构建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可以将独特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视觉、声音等形式呈现给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

第六,牢牢掌握文化话语权,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力和传播力。文化话语权是文化主体性塑造和实现的主要路径,包括文化理论建构、文化阐释、文化批判、文化传播渠道和技术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建构,是文化主动性的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社会共同参与完成的。人民群众是文化话语权的最大力量来源,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因为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建构形成的文化理论,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力。文化是精神性产品,大多以语言文字、图像造型、音像服饰、空间建筑等形式为载体而得以表达和传播。因此,文化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需要人脑的加工和转化。基于这种特性,文化需要进行诠释和解释,以保证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清晰和准确,也能使文化能够为不同层次受众所理解和接受。文化转化发展也需要文化诠释,没有新的有力的诠释,文化传统也就从此中断^{[19]713}。因此,文化阐释权是文化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权威的文化解释和阐释主体,在发生文化模糊、含混、歧义等需要进一步解释和阐释之时,能够提供权威可靠的解释和进一步阐释,不致于发生文化领域的纷争和混乱。文化批判是文化捍卫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需要正向叙事,也需要建立一套科学而规范的批判理论体系,能够对自身和其他文化形态进行科学的批判。这里所谓批判,具有扬弃的意义,也就是能够坚持和捍卫自己正确的东西,能够鉴别其他文化形态的对错优劣,科学的文化批判是吸收借鉴的前提。最后,文化话语权也需要相应的技术渠道,要进一步根据时代技术变革,建设和完善中华文化现代化传播表达的渠道,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扩大中华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有助于巩固文化主体性。

(二)秉持开放包容,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

秉持开放包容强调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需要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秉持开放包容,价值旨归是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互

鉴,扩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容量,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性。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开放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特性。中华文明经历了从世界历史之外、世界历史之中到引领世界历史的过程^[20]。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秉持包容性原则,涵摄吸纳人类文明先进成果,进行融会贯通和创造转化,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球性元素。

第一,扩大文化开放,畅通增强中华文化全球性的有效渠道。文化开放,包括文化思想开放和文化产品开放两个方面^[21]。从文化思想方面看,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既往文化开放的基础上加大文化思想开放程度,加强对国外文化思想和文化理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也有国外文化思想传入激活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影响,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扩展和丰富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视角,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从更为宽阔的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机制。通过文化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逐步建立起跟上时代发展的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需要加强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闭门造车只会原地打转,堵塞思想解放之路;在学术话语构建方面没有与国外思想的交流,也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误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文化包容性,在与世界先进文化的竞争交流中确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地位。从文化产品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电影、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化产品,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带动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消费。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就世界各国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产品来说,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标准下,可以择优引进,促进各类文化产品之间的竞争,这也是提升中国文化产品创作质量的有效方法。

第二,促进文化交流,降低增强中华文化全球性的制度成本。从历史看,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实现人类文明的突破和创新,其背后有深刻的地理、政治、社会原因,但自由的文化环境是人类文明轴心突破的基本环境条件。文化创造是精神性创造,是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互动的反映,是人精神恒久创新能力的表现^[22]。自由是精神的象征,是人改造和利用现实、摆脱现实束缚的内在动力。创造新的文化,需要自由的力量作为支撑和保障。《共产党宣言》深刻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294}。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在文化环境较为宽松自由的时代,文化繁荣昌盛,形成文化盛世;而在文化环境专制禁锢的时代,则文化萧条衰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障文化发展的自由环境,创造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文化盛世。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以更大力度保障文化自由,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条件,降低文化创造的制度成本,鼓励和支持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形态之间自由交流,为文化交流提供便利化制度条件。教育是实现文化交流的主渠道,要扩大各类各层次教育交流,发挥教育文化交流媒介功能,培养文化交流人才。文化交流是双向和多边文化互动,要创新中国文化在外交流传播的方式,更多支持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提升文化交流的实效。

第三,适度文化借鉴,提升增强中华文化全球性的实践效果。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落脚

点是丰富和提升自身文化的内涵,因而择优适度的文化借鉴就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现实路径。文化借鉴包括文化学习、文化引进和文化改造三个方面。文化学习,就是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从广义看,借鉴科学技术、学术思想、管理体系等都属于文化学习的范畴,通过文化学习,提升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提升发展中华文化的能力。文化引进,就是将国外某一方面先进的文化成果引进移植到国内,主要侧重在技术文化和文化技术层面。国外先进的文化创造技术,如电影技术、文化推广技术以及其他先进文化创作传播技术都可以引介到国内。文化改造,就是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理念、方法,改造国内文化存在的一些文化陋习。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能妄自尊大,不能讳疾忌医,要加强文化学习、文化引进和文化改造,借助他山之石,完善和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水平。

(三) 坚持守正创新,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 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秉持开放包容,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最后都要通过守正创新,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才能最终证立理论和方略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基本要求是有机统一,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有机统一、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有机统一、大众文化与先锋文化有机统一、文化自由与文化秩序有机统一、文化与其他领域有机统一。坚持守正创新,是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现实路径。守正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创新是对事物有新的认识和创造^[24]。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守中华文明之正,不断创知识之新、理论之新、方法之新”^[25],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转化,推进主流文化融合协调发展,推进文化重点领域改革突破,推进文化与其他领域融合,推进文化法治建设。

第一,推进传统文化转型升级,提供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资源,实现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有机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国家现代化的障碍和束缚,其中大量的优秀成分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成功实践和其他东方中华文化圈国家的现代化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有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深刻洞察到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能够提供中国人文重建的有效资源^[26]⁸。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7]²⁰³。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传统文化视角看,就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包括推进传统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至中医中药、文化节日等的现代化,推进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突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第二,推进多元文化融合协调发展,把握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任务,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有机统一,文化大传统与文化小传统的有机统一。没有一种取消和否定多样文明的单一文明^[28],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在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基础上展开,是在现代人类多样

文明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多样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性,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客观现实。多样性的中华文明和人类现代文明构成,其中有主要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从整体上构成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流派之一。新时代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统筹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既要照顾中国国情,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也要全面深刻理解其他文化实质,不能任意裁剪、画虎类犬。可以说,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平等对话、洋为中用、化人为己,是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有机统一的科学方法。中华文化内部存在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区域文化等文化格局,也就是中华文化有主干和枝叶之分。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29]。从文化大传统和文化小传统视角看,中华文化是大传统,各民族文化和各区域文化是小传统,要发展壮大中华文化大传统,在坚持文化统一性的大前提下,保护少数民族和地方优秀文化并加以传承发展,实现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有机统一。

第三,推进文化重点领域改革突破,发挥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引领示范,实现大众文化与先锋文化有机统一。文化改革和文化创新是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文化改革,是对不适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思想理念、体制机制、做法措施进行改革,坚持立破并举,确立新的文化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束缚新文明建设的一些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一些文化建设和管理的做法措施也不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30]。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特别是对文化领域新事物的管理要稳妥慎重,保护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培育文化创新土壤。在一些文化领域支持颠覆性创新,宽容各种先锋文化创作,在发展大众文化的同时,为各类先锋性文化探索提供空间和机会,协调大众文化和先锋文化各得其所,共同协调发展。

第四,推进文化与其他领域嵌套融合,扩展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时空范围,实现文化与其他领域有机统一。文化涵盖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不能就文化论文化,需要将文化与其他各领域结合起来,发挥文化对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引领、塑造、带动作用,实现文化软治理^[31]。从横向看,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法律文化等包罗万象,交叉融合。从纵向看,国家文化形象、民族文化气质、单位文化氛围、个人文化素养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考虑的对象,各层次之间相互交叠、相互影响。因此,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更是整个国家民族和全社会的任务,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要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任务分解到各方面、各领域、各主体,将文化建设融入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各主体,形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合力。

第五,推进文化法治建设,维护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良好环境,实现文化自由与文化秩序有机统一。加强文化法治,首先是加强文化立法。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立法相对薄弱、滞后,文化立法在现行法律总量中比例不到2%^[32]。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健全文化领域法律保障制度,推进“文化权益保障、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以及文化艺术、文化娱乐与文化信息传播制度等方面”^[33]立法工作,使得文化建设和发展有法可依。其次,要加强文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文化领域执法工作要不同于其他领域,坚持法律标准、文化自由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提升文化执法工作专业化水平,发挥专家

在文化执法中的作用,强化文化执法公开透明,严格界定文化执法权边界,以保护良好自由的文化环境为目标,打击文化领域违法犯罪,防止以执法为名干扰正常文化活动。再次,要加强文化权利司法保障。要强化文化权益司法保护,畅通文化从业主体权利司法救济通道,重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时公正有效解决文化领域矛盾纠纷,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从提出到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践履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本文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实践方略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方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探索,全面契合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准确深刻反映新时代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趋势。

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大幕已经拉开,紧迫需求、有利条件和困难挑战交织,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文化理论和实践创新。首先,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需要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前进方法和方法论指导,但各领域、各方面、各主体文化建设内容复杂、任务繁重,不能大而化之、浮在面上,而是需要各方面、各领域、各主体根据自身实际需要,遵循科学规律,深入推进艰苦细致的文化理论创新。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其次,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宏大工程,既要坚持政治原则,也要坚持文化标准;既要注重文化建设顶层设计,更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既要满足一般群众要求,也要宽容先锋文化探索;既要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也要关照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等等。从现实情况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成果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仍不相称。客观地说,当前中国文化产品的创作数量大幅度提升,但在文化产品质量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文化原创性亟需提升,急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文化产品。再次,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仍需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奋力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使命,在总结借鉴既往经验的同时,也要不断提升党对文化建设内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培养选用高素质文化建设领导干部人才,改进和创新党与文化界的关系,带头尊重文化创作创造主体权利,提升依法依规领导、科学有效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 [1] 林建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11): 11-13.
- [2]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思想文化支撑

- 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
- [3] 杨长福,陈寒,马小帅. 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逻辑的三重维度及其相互关系[J]. 重庆社会科学,2023(11):15-28.
- [4] 约瑟夫·列文森.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 郑大华,任菁,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5] 康震.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J]. 中国社会科学,2023(8):4-9.
- [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 人民日报,2023-07-02.
- [7] 洪光东.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逻辑、理论超越与本质要义[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77-84.
- [8] 戴圣鹏. 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彰显与现实基础[J]. 湖北社会科学,2023(5):5-10.
- [9] 费孝通. 中国文化的重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0]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M]//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12] 管宁.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涵[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82-95.
- [13] 姜志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5):63-73.
- [14] 孙立军,许海娇. 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5):47-54.
- [15]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6] 吴潜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科学内涵[J]. 道德与文明,2007(1):4-7.
- [17] 文丰安.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J]. 探索,2023(4):151-163.
- [18] 刘莉. 中华文化符号的层次、特征与传播[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94-104.
- [19] 汤一介.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20] 张梧. 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J]. 哲学研究,2023(11):5-12.
- [21] 郑自立. 中国文化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J]. 决策与信息,2018(8):66-73.
- [22] 孙月才. 文化与自由——对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探讨[J]. 社会科学,1987(9):2-6.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4] 李涛.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发逻辑、实践特征及成功经验[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17.
- [25]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23-34.
- [26] 林毓生.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 [27]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28] 张志强.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J]. 哲学研究,2023(8):5-14.
- [29]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1-08-29.
- [30] 苏泽宇. 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内涵与特点[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60.
- [31] 付春. 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J]. 中国行政管理,2009(3):122-125.
- [32] 朱兵. 文化法治建设的重大进展[J]. 中国人大,2017(3):54.
- [33] 周刚志,朱兵. 论文化法学学科:性质、体系及价值[J]. 时代法学,2023(5):1-7.

Building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Logical Generation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the CPC's Cultur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Weijun¹,JIANG Rui²

(1.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i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Emergence of the cultur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of the CPC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urgent practical logics.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the CPC inherently includes the requirements to promote cultural prosperity, build a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construct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its century-long struggle, the CPC has achieved historical milestones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ogressing from a nation founded on culture, culturally prosperous nation to a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The cultural mission proposed by the CPC in the new era to build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cultural strategy responding to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in a century and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adherence to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 It involves maintai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culture, adopting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and consolid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Embracing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with a commitment to cultural openness as a driving force, will facilitate the global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of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focusing on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constantly rejuvenating cultural vitality will be crucial in creating new cultural ent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the CPC is a long-term, systematic, and arduous cultural project, requiring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 necessitates the constant enhancement of the Party's ability and level of leadership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mission, generating logic, practical strategy

责任编辑:陈卓

引用格式:赵建超.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新探[J].探索,2024(1):144-156.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新探

赵建超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仅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跃升,而且使其在智能化推进中逐步呈现出新的规律。在教育规律的生成层面,人工智能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从思维、认知、评价及实践层面为其提供了智能化变革基础。其中,思维基础体现为大数据思维、计算思维与沉浸思维的创新;认知基础体现为信息加工基础上的注意力形塑、计算模型基础上的感知自动化、数字记忆基础上的信息性增强及数字图像基础上的话语具象化;评价基础体现为评价指标多元化、评价方式系统化、评价活动精准化与评价结果动态化;实践基础体现为教育活动的数据化、实时化、可视化与智能化。在教育规律的支撑层面,人工智能不仅变革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而且激活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行中的支撑作用。其中,信息计算实现了思维的计算化转向,虚拟展现带来了外化的数字化革新,数字化沉浸激活了情境的沉浸性机能,信息性创构丰富了创造的可能性意蕴,智能交互激发了交往的智能形式变革。在教育规律的呈现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表现为信息智能供给与共同需要的矛盾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智能助推律、“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沉浸育人律、激发教育系统整体性创生的智能创构律、“注意力对接—高阶需求激发—去中心化交流”的智能互动律等。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内容呈现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4)01-0144-13

回顾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处于科技、教育与社会的动态相互作用之中,并在教育与科技的螺旋式融合中发展。当前,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正处于智能变革与教育变革两个重大领域的历史交汇点,它们在合力助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逐渐走向深度融合。基于两者的深度融合持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开展并探求其内在规律,成为新时代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先发优势、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发展智能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引发研究热潮。截至目前,国内学界围绕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梳理相关成果,可以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情况与新挑战等。学者们认为人工智能将会引起教育主体、中介、环境的重构^[1],引发教育理念、方式与评价的变革^[2],带来个性化、精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研究”(22CKS045),项目负责人:赵建超;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基于游戏化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23YB060),项目负责人:赵建超。

作者简介:赵建超,男,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化、智能化的教育技术创新^[3]。由此,也会产生一些危机,包括大数据、算法、区块链、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风险及其在主体性、意识形态及伦理等层面的价值困境^[4]。二是人工智能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定位。研究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开展要始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人工智能为辅^[5],要始终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积极培育教育对象的学习力、沟通力和创造力等^[6]。三是人工智能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尤其是教育者的角色定位与发展。多数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者不仅扮演着践行智慧思维、组织智能课堂、整合智能资源等角色^[7],也在主体性、话语权等方面存在诸多嬗变^[8],应通过国家、社会、学校的融通衔接等审思解决之道^[9]。四是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路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技术规制、伦理规范及队伍建设等方面展开,既要强化技术优化与价值融入,提升教育主体技术素养、实现多方协同,正确处理教育与技术、技术壁垒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等^[10];又要基于人工智能精准研判、分析与应对各类伦理风险^[11];还要重塑教育者角色,锻造高质量的育人队伍,依据智能技术积极完善育人新机制^[12]等。

总体来讲,相关研究已经初步覆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的基本论域,但对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的变革基础、范畴依据及开展机理等挖掘不足,而这些内容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生成基础、运行支撑与具体呈现,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深入空间。一是深刻澄明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的生成基础。目前学界研究多是立足教育要素与教育管理维度的智能变革思考,缺乏智能思维、智能认知、智能评价以及智能实践维度的深入探讨。对此,要深化基于大数据、算法与算力的智能思维创新,寻求注意力、感知、记忆与话语等维度的智能认知转向,深化多元、系统、精准与动态的智能评价,推动量化、实时、可视与智能的实践展开。二是系统考究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的运行支撑。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依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基础上的创新开掘,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理的解释力不足。对此,既要借助人工智能哲学观照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范畴的不足,又要激活其思想政治教育蕴涵,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智能化革新。三是着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的规律呈现。由于当前学界对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生成、范畴等维度的考察仍有待深入,因此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的机理揭示研究推进受阻。本研究试图在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生成基础与范畴依据的基础上,从信息供需、教育时间、教育空间、教育系统及教育交互等关键维度开显其基本规律。

二、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生成基础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13]。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实现了智能化跃升,而且在智能化开展中开显出新的规律。人工智能从思维、认知、评价及实践层面为其规律生成提供了变革基础。

(一) 基于大数据、算法与算力的思维创新

大数据、算法与算力是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石,它们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同时,为其带来了大数据思维、计算思维与沉浸思维的创新。

一是大数据思维创新。大数据有着整全规模、开放结构、实时流动等独特属性,为教育活动

带来量化思维、预测思维与时效思维的变革。在量化思维层面,大数据趋于规模整全的属性使其拥有不同于小数据样本分析的整体量化功能,实现了教育开展从局部到整体、从要素整合到整体涌现的转变。在预测思维方面,大数据使得教育实现了从注重因果性与确定性的机械思维向注重相关性与不确定性的预测思维转变,弥补了机械思维“善于把握确定性而难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14]¹⁰⁸的教育难题。在时效思维方面,大数据通过“量”层面教育时间的延伸,如从闲暇时间向教育时间的转化、即时化的教育活动开展等,进而提升教育的绝对时间效益;通过“质”层面的教育时间强化如注意力时间增强等,进而提升教育的相对时间效益。

二是计算思维创新。智能算法变革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样本、轻计算”与“重经验、轻实证”的弊端,克服了传统计算的技术至上理念弊病,实现了计算与思维的有机整合。不同于演绎性的逻辑思维与归纳性的实验思维,“计算思维以表示的形式化和执行的机械化为特点,抽象和自动化是其本质的内容”^[15]。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计算思维的特点表现为教育系统的抽象、仿真模型、抽象分解等,内容表现为教育思维的模型化与问题解决的精准化。在计算思维的助力下,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可计算、可分析与可创造的有效结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实验建构及其规律深度挖掘如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规律、教育双方的思想交互规律、教育情境与环境的互塑规律等提供了思维引导。

三是沉浸思维创新。沉浸思维是表征人的身心置于某种环境或情境状况的实践性思维,反映了沉浸活动的感受性、自主性与具身性。人工智能算力的升级激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沉浸思维,促使教育对象在可感、可触、可体验的沉浸环境中形成“沉浸意象”,并以之为介体,在直观观察、再生想象与构绘认知的相互联结中进行创造性活动。其中,直观观察体现为大数据与智能计算基础上的理性分析即“沉浸意象”生成,再生想象体现为官能体验基础上的数据重组即“沉浸意象”重构,构绘认知体现为数据模型建构与智能反馈基础上的数据创构即“沉浸意象”升华。

(二) 注意力、感知、记忆与话语的智能变革

认知交互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展开的核心环节之一,通过注意力的对接形成教育关系,借助于感官的多维感知形成对话基础,基于经验性的记忆完成信息认知,通过话语诠释展现教育的理性表达。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变革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活动,依托其独有的信息加工、计算模型、数字记忆及数字图像优势,深度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的智能转型。

一是信息加工基础上的注意力形塑与计算模型基础上的感知自动化。一方面,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加工涵括信息的生成、过滤和整合以及信息的呈现、沉浸和创造两个层面。前者在信息内容层面以其生产力、对接性、整合性等强化了对教育对象注意力的吸引与感染;后者在信息形式层面以其生动形象性、沉浸体验性及创构能动性影响了教育对象注意力的分配,克服了注意力分散的弊端,维持了注意力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义肢,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模型建构及在此基础上的自动化感知。这弥补了经验性教育的不足,促使教育感知实现了从“经验化”到“自动化”的理性转换。例如,Swarm、Repast、NetLogo等软件工具“基于主体的模型”通过对教育要素、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的社会网络分析、情景分析、关键行为特征分析、效能分析等实现了对感性化的教育动态的自动化感知。

二是数字记忆基础上的信息性增强与数字图像基础上的话语具象化。一方面,人工智能的

数字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从瞬时感知记忆、想象再现记忆到数字记忆的升华,以及从短时记忆、长时记忆到永久记忆的跨越。“数字记忆的特点是复杂的精确性、存储的无限性、提取的简便性”^[16],它实现了对感受性信息的精准截留、信息存储的无限扩容以及信息提取的“随心所欲”,有效规避了日常教学的记忆失误及其误导效应。另一方面,不同于数字、文字、符号、文学作品等传统语言文本基础上的教育话语,涵括数据文本、数字图片、数字视频、数字音频、数字体验等在内的数字图像推动教育话语实现了从文本抽象性向图像具象性的转变。从具象化理论视野看,“我们对概念的知识建立在与客体互动时感觉和运动过程的激活上”^{[17]378}。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基于数字图像的官能信息能够以其内容的“刺点”、形式的“惊异”以及展现的虚实结合等,激活教育对象的感觉区域,促使其自觉地投入与数字图像的信息互动中来。

(三) 多元、系统、精准与动态的智能评价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以数据样本基础上的定量评价及在此基础上的定性评价为主,存在着评价指标单一、评价方式不均衡、评价活动笼统化、评价结果静态化等不足。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这一教育评价态势,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多元化、方式系统化、活动精准化与结果动态化。

一是评价指标多元化与评价方式系统化。在评价指标方面,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指标多是显性的,能够围绕教育对象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学习成绩等展开评价活动,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取向、认知能力、行为状况及生活需求等潜隐的评价指标却鞭长莫及。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技术与相关关系分析,不仅实现了潜隐评价指标的数据量化,而且实现了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中教育评价指标择取的定制化。在评价方式方面,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多以样本数据量化基础上的结果评价为主,在增值评价、过程评价与综合评价方面的分析尚有欠缺,且存在着标准化、经验化的倾向。人工智能以教育要素、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的大数据化为基础,以计算模型基础上的数据报告生成为支撑,以算力基础上的数据追踪、数据分析、数据反馈为保障,强化了教育结果的智能反馈、教育过程的智能追踪、教育活动的伴随诊断以及教育系统的整体分析,真正实现了“四个评价”的有机结合。

二是评价活动精准化与评价结果动态化。一方面,人工智能在完成对教育对象的情绪信息、行为数据、反馈信息和教育双方的认知交互频次、高频率的交互内容等的数据挖掘之后,能够实现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分门别类基础上的精准分析模型建构,如数据画像模型、活动数据模型、教育预警模型等。依托数据挖掘优势与智能模型分析特性,人工智能实现了对教育对象学习情况、教育活动过程状况及教育发展趋势的精准化评价。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基于文本数据与样本数据的静态化评价及以数字、图表、文字等呈现的静态评价结果,人工智能既基于大数据的即时性、智能算法的预测性、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性、增强现实技术的叠嵌性等激活了教育结果的动态化评价,而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教育评价结果的即时化呈现、个性化表现、沉浸性展现及增强性突现。

(四) 量化、实时、可视与智能的活动展开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展开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数字助力。随着大数据、数字通信、虚拟现实及智能助手等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升级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迎来了数字化、即时化、可视化与智能化的实践变革。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小数据化到大数据化、从错时性

在场到即时性开展、从无形教学到可视教学、从标准化实践到智能化实践的转型升级。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数据化与即时化。在数据化层面,大数据驱动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实现教育要素量化和相关关系分析基础上的定制性教学、教育过程量化,以及精准分析基础上的个性化教学、教育结果量化反馈和精准对接基础上的双回路教学。它深入推进了知、情、意、行层面的教育内容融合,带来了虚实共生的生存观教育、彰显人文精神的价值观教育以及去中心化交流的交往观教育变革。大数据驱动下的数据化革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更具客观性与科学性,为其发挥“讲道理”的效用提供了数据依据。在即时化层面,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即时化教育能够实现教育对象的即时化情绪与行为分析、教学活动的即时化交互、教育话语的即时化创新与表达以及教育结果的即时化评估。即时性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速度革命,推动了教育介体的即时出场与教育关系的应时链接,避免了时间误差造成的教育迟滞,极大地提升了教学有效性。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可视化与智能化。在可视化层面,基于人工智能赋能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实现教育情绪、教育思维、教育行为的可视化^[18]。其中,情绪可视化可以深化对教育对象的情绪分析、情绪调节以及开展基于情绪波动的适应性教学,思维可视化可以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提升教育对象的视觉素养、推动视觉教育模式创新,行为可视化可以实现教育活动的具象展现及在此基础上的可视化评价。可视化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从“无形”走向“有形”、从“幕后”走向“前台”,不仅激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活力,也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有机性。在智能化层面,人工智能一方面替代了教育的重复性劳动,解放了教育主体的体力与脑力,优化了管理流程,提升了教育效率;另一方面,打破了教育的情感边界、关系边界、时空边界与文化边界,带来了注重注意力捕捉、高阶需求激发、去中心化交流的智能交往模式变革以及强调沉浸性、体验性与创构性的实践模式变革,真正实现了教育的精准定制、智能开展与全景展现。

三、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范畴支撑

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发挥中起着支撑性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仅变革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而且激活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发挥中的支撑作用。范畴具有多样性、层次性与延展性,全面铺展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支撑范畴尚不能实现,但可以着重关注其中的核心范畴。

(一) 信息计算实现思维的计算化转向

思维本质上是人把握世界的高级意识形式,是对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性揭示,有着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以及归纳、演绎与类比等形式。从思维的运动来看,思维主要通过直观把握、想象再生及概念认知来反映世界。其中,直观把握依赖于感官表象,想象再生借助于大脑记忆和信息加工,概念认知借助于语言和知识的中介。

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与智能算法实现了思维的信息计算转向,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计算模式变革^[19]。首先,基于大数据实现对教育系统的全维度数据刻画。感官表象能够反映作为直观对象的教育活动,却不能有效刻画诸如情感表达、意识交互、行为取向之类的活动信息。大数据相较于人类的思维而言更具归纳性、分析性与综合性,不仅实现了教育要素、过程与反馈的全

维度数据化,而且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感官信息的识别分类、同类聚合、强度分析等。其次,基于数据挖掘实现对教育活动的全过程数据追踪和规律发掘。思维想象层面的教育活动再现可能会有着主观性、片面性与模糊性等偏差。人工智能克服了想象再现的不足,不仅通过对教育过程的伴随式追踪实现了对教育数据的全方位提取,而且通过对教育信息的深层开掘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关关系分析实现了对教育活动规律的深入发掘。最后,基于仿真、模型、实验等实现教育思想的虚拟化演练、虚拟教学的自动化开展以及教育行为的精准化预测。其中,虚拟化演练即面向教育可能性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仿真并在众多仿真中展开数据建模与推演,自动化开展即在算法模型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自动化生产以及教育活动的自动化运行,精准化预测即基于现实教育与仿真系统的类比以及在此基础的相关性分析实现教育行为的精准研判。

(二) 虚拟展现带来外化的数字化革新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外化是相对于内化而言的,旨在促使教育对象将内化的教育信息如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转化为行为,“内化是教育者促使受教育者变‘社会要我这样做’为‘我要这样做’,外化则是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变‘我要这样做’为‘我正在(已经)这样做’”^{[20]10}。这里的外化是通过教育者的“引导”实现的、以教育信息的错时在场呈现的、从思想到行为的转变过程。

人工智能以“虚拟展现”替代了“外化”,彻底打破了外化行为的他引性以及时空的限制。一方面,虚拟展现实现了从他引性到自觉性的转变。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人工智能通过智能显示、智能交互、智能体验等技术优势不仅能够激发教育对象的内在需要与主观能动性,使其自发自愿地投入数字化学习活动中,而且能够促使其在“获得感”的内驱下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自觉地展示学习内容和学习成绩如徽章、排名等。另一方面,虚拟展现以其远程即时在场的自我展演实现了“外化于行”向“展现即行”的转变。不同于“外化于行”,虚拟展现不需要寓于“行”,其本身就是“行”且是跨时空的“行”。在空间层面,虚拟展现体现为远程在场的数字展演。人工智能将教育活动从现实引向虚拟,实现了教育的人机结合与虚实结合。在数字化虚拟中,教育对象有着诸多虚拟化身,实现了远程在场对现实在场的替代与迭代,带来了展现即体验之感。在时间层面,虚拟展现体现为即时在场的自我展现。虚拟展现以其反常的现时特性实现了内化信息的即时呈现与传播,既克服了错时在场信息内蕴的时间断裂风险,又推动了即时性的教育活动叠加开展,带来了展现即发生之感。

(三) 数字化沉浸激活情境的沉浸性机能

情境有着物质化情境与思维性情境之分。前者表现为物质化的环境创设,如校园模型的建设、节日氛围的营造等;后者表现为知识、语言基础上的思维性想象,如小说、诗歌、词赋等的创作。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情境有着不容替代的育人作用,不仅承载教育目标、融合教育内容、营造教育氛围,而且激活教育关系、强化教育感染、增强教育说服。教育情境育人作用的发挥与教育对象的注意力呈正相关关系,并集中体现在注意力的集中性、沉浸度即注意力的深度与“排他性”等维度^{[21]23}。

人工智能依托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数字孪生等颠覆性沉浸技术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沉浸变革,实现了教育活动从思维性想象到感官沉浸甚至全身心沉浸的转化。具体来讲,在注意力的集中性层面,人工智能以虚拟时间的即时激活与虚拟空间的界限消弭实现了教

育信息的实时展现和泛在展现,以教育信息的泛在传播与个性分享实现了教育对象的泛在链接和精准对接,以碎片化时间的系统整合实现了注意力时间的有效统筹。在注意力的沉浸度层面,人工智能一方面通过智能沉浸与交互技术营造了具身沉浸的数字情境,以其感性层面的拟真性、交互层面的具体性以及内容层面的高涵容性,推动了教育对象的感性需求激发以及教育情境的理性诉求实现;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技术基础上的教育内容生产力提升及智能技术基础上知识价值的认同建构,激发了教育对象具身沉浸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在注意力的排他性层面,人工智能通过注意力时间的延伸功能和增强功能强化了数字化沉浸的排他效益。其中,注意力时间的延伸通过虚拟空间叠嵌、情感信息迭代、场景展现更新、影游交互迭代等实现,注意力时间的增强通过惊奇的悬念议题抛掷、偶然的图像信息创构、反复的涉身信息展现、即时的身心沉浸体验等实现。

(四) 信息性创构丰富创造的可能性意蕴

传统意义上的创造是围绕“现存”的事物进行实践改造的活动,有着明确的改造对象,不能脱离客观对象而存在。其中,对客观对象的改造始终遵循从过去到现在、从局部到整体、从要素到系统的实体创造逻辑。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主体的塑造、教学思维的创造、教育关系的再生产、教育环境的改造、教育方法的创新、教育思维情境的创设等,都属于创造的范畴。

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数据相关关系基础上的整全性效应与智能算法关于逻辑和经验的综合性效应,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信息性创构的实践创新变革。所谓信息性创构,即“基于人的感官特性创设(包括实在和虚拟)出一种对于主体来说具有意义的对象”^[22]。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创造,信息性创构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现存事物,是依据人的信息需要面向未来、面向可能性的“现实”事物创生。一是依据信息需要的“现实”事物创生。信息需要是置身于“感受性关系”中的主观需要,有着显意识需要与潜意识需要之分。其中,显意识层面的信息需要是基于外感官的信息欲望,其相互性叠加缔结了多样化的教育关系,实现了教育创构活动的叠嵌运行;潜意识层面的信息需要是基于内感官的共性需要,激发了教育主体间知、情、意、行层面的共鸣,极大地提升了教育创构效果。二是遵循用未来观照现在、从整体到局部、从系统到要素的意义创构逻辑的“现实”事物创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基于3D打印的信息物化环境创设、基于虚拟现实的虚化情境预设等,都属于信息性创造的范畴。人工智能的信息性创构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整体性的创新观照,实现了教育活动从实体创造到意义创构的升华。

(五) 智能交互激发交往的智能形式变革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交往的内在属性。交往是相对于生产而言的社会实践活动,有着主体性、交互性、意识形态性、普遍性、世界性等特征。交往以人的需要和利益为连接纽带,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变革了交往的传统形式,不仅推动交往活动从现实走向虚拟,而且使其更具智能性,即实现了智能交互。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交往活动的展开主要表现为“现实与现实的交互”,其通过教育双方的本真共在与教育介体的及时出场得以实现。由于教育主体主观意愿的低迷与客观能力素养的缺陷,加之教育环境、方法、情境等的不足,教育活动极易陷入“异化”状态。

人工智能的数据化、可视化、即时化等实现了信息的精准对接、内容的感性吸引、介体的及时出场,其在寻求教育双方共同需要的基础上,能够在智能适应的环境建构中实现教育双方的

本真性对话。智能交互不仅强化了“现实与现实的交互”,更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现实与虚拟的交互”与“虚拟与虚拟的交互”等交往方式变革。在“现实与虚拟的交互”层面,人工智能通过教育对象的虚拟认同建构、教育关系的虚实调节、教育内容的虚实沉浸以及教育方法的虚实互补等,推动虚实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和谐共生与智能循环。在“虚拟与虚拟的交互”层面,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实现了思维、感知、心理、信息等层面的深层交互。具体来讲,教育主体可以通过意向性链接教育关系、通过潜意识信息需要的激发建构对话关系、通过感性的数字化共鸣形成心理交流、通过数字想象建构学习空间、通过虚拟创构将思维设计转化为虚拟场景等。

四、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内容呈现

人工智能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生成与运行提供了变革基础与范畴支撑,而且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信息供需、教育时间、教育空间、教育系统及教育交互等维度呈现出新的规律内容,集中延展为供需矛盾律、智能助推律、沉浸育人律、智能创构律、智能互动律等。

(一) 信息智能供给与共同需要的矛盾律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开展中,人工智能不仅促使教育主体愈来愈以信息的方式存在,而且使其在信息使用和共享中的类特性得以最大程度激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3]56}。在自由的类特性整体观照下,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共同需要甚至类需要叠加性呈现,信息智能供给与共同需要的矛盾成为驱动教育开展的核心动力。

一是信息智能供给基础上的共同需要激发。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是感受性的信息关系,建立两者共同需要基础之上的感受性关系是教育活动有效开展的基本前提。人工智能在教育双方感受性关系的搭建中扮演着连接中介与中介客体的双重角色。作为连接中介,人工智能依托其智能反馈、个性对接以及智能预测优势,不仅强化了教育双方的共同需要挖掘,而且使得作为信息体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社会关系总和”本质日益彰显,即促使两者在娱乐体验、信息认同、情感共鸣基础上的共同需要呈迭代增加之势。作为中介客体,人工智能一方面通过惊奇的悬念议题抛掷、偶然的图像信息创构、反复的涉身信息展现、共时的身心沉浸体验等实现了信息增强基础上的共同需要激发;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内容的精准化、泛在化、实时性传播,实现了教育内容的及时出场,推动了教育的感受性关系建构。

二是共同需要激发基础上的信息智能供给。共同需要的激发迭代不仅需要源源不断的信息供给,而且需要信息的高质量生产。在信息供给层面,人工智能不仅实现了教育内容的信息化,推动了教育意义的生产与扩展,而且依托广泛性、相互性、共享性等信息化优势实现了教育信息的跨时空采集、深层挖掘与泛在传播,为教育内容的丰富优化提供了稳定的知觉后勤。在信息生产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 等不仅能够精准对接教育双方共同需要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的信息生产服务,还能够高效率训练算法模型的基础上实现生产信息的增强优化。具体来讲,通过满足教育双方共同需要的文本智能生成、音频智能生成、图像智能生成以及视频智能生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实现了信息的量化生产与智能整合,在量上提升了教育内容生产效率,在质上实现了教育内容增强。

(二)“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智能助推律

人工智能不仅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内驱力,更在“事”“时”“势”层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提供了外推力,即实现了“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24]378}的智能化赋能。

一是智能推动“因事而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事”关涉社会现实、教育现实与主体现实。在社会现实层面,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对各类社会现象做出系统收集、个性分类、智能选择与精准考察,而且能够深度挖掘各类社会现象背后的问题本质以及现象间的规律关联,为置身社会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提供素材资源、规律遵循与问题靶向。在教育现实层面,人工智能实现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个的“事”的全时空、全维度、全生态的智能化追踪、分析、研判与评价。其中,全时空意味着错时与实时的统一、在场与缺场的结合,全维度意味着教育要素、过程与结果的全维赋能,全生态意味着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教育系统赋能。在主体现实层面,人工智能不仅能够通过对教育对象思想状况的信息整合高效能地回应其内在需要,而且能够通过教育规律与思想品德形成规律的智能遵循而契合教育目的与人的发展需要,还能够通过教育对象日常生活“具体问题”的泛在分析与预测分析提升其理论认同与价值认同。

二是智能推动“因时而进”。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时”表现在生理时间、教育时间与自由时间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变革了传统的时间格局,实现了生理时间的智能适应、教育时间的智能分配以及自由时间的智能转化。在生理时间层面,人工智能通过对教育主体的身心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够依据其智能与体能情况适时性开展个性化教育,真正实现教育开展的“恰如其分”。在教育时间层面,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开展彰显人的积极存在的时间调节,即实现教育的时点科学设置、时段智能分配、时机精准捕捉、节奏和谐调节等,而且能够通过时间智能调配基础上客观时间和虚拟时间的有机结合、闲暇时间向教育时间的精准转换、教育注意力时间的视觉增强等提升教育时间效益。在自由时间层面,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对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且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背景下开展彰显人对自由追求类特性的时间规划。

三是智能推动“因势而新”。“势”即形势或态势,有着外势与内势之分。其中,外势表现为时代状况、社会形势与教育态势,内势表现为教育开展态势、主体思想情感变化情势、教育关系和谐态势等。在外势层面,人工智能通过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置身其中的时代要求、社会要求以及内蕴思想政治教育其中的教育要求和主体要求做出智能化的时势分析与整合。在内势层面,人工智能通过对教育对象知情意信行方面的态势追踪、教育双方认同关系、信任关系和对话关系维度的态势研判以及对整个教育系统的运行态势分析,能够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发展、内在开展及系统运行的数据综合、计算模拟和实验分析。在外势与内势的合力下,人工智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势谋、势动与势为的有机结合。

(三)“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沉浸育人律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消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与心理边界、时间与空间边界以及虚拟与现实边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开展创造了沉浸空间。作为智能沉浸变革基础上的空间育人规律彰显,沉浸育人律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基于沉浸变革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机理。

一是全员沉浸育人。全员沉浸有着泛在性、整体性与相互性。其中,泛在性沉浸实现了教

育信息的泛众传播,消弭了大众传播与分众传播的边界。整体性沉浸实现了“全员”活动的涌现生成,产生了个体活动所没有的新效应。相互性沉浸实现了“全员”与智能沉浸媒介的有机融合,深度整合了“全员”的价值理念、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等。

二是全程沉浸育人。沉浸于数字化的教育时间主要以虚拟时间为主要形态。虚拟时间作为数字化的产物,是网络时间与社会时间的融合,打破了传统物理时间“过去—现在—将来”的线性逻辑,以其自主性、实时性和增强性实现了全程沉浸育人。在自主性层面,感知的深度沉浸激活了教育对象的能动性与自觉性,从动机和需要等方面奠定了全程沉浸的身心基础。在实时性层面,沉浸的瞬间切换速度实现了融通事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教育内容实时展现,从时间宽度维度奠定了全程沉浸的时间基础。在增强性层面,强度展现的图像逻辑以其刺点内容、惊人形式等增强了教育对象的注意力,从时间强度维度强化了教育内容的感染效应。

三是全方位沉浸育人。智能沉浸技术打破了现实与虚拟、人与媒介、情境与身体的界限,融通了课内与课外、线上与线下、环境与情境等育人空间,带来了虚实融合、人机共生、境身合一的沉浸新境界,真正实现了沉浸育人的去中心化与去边界化,达到了“处处育人”的效果。具体来讲,智能沉浸技术不仅使得教育活动的开展摆脱了空间的束缚,真正实现了“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而且使得人本身成为与媒介合二为一的“沉浸人”,还使得人的沉浸“随心而动”。

(四) 教育系统整体性创生的智能创构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开展并不是个别要素环节的叠加呈现,而是在复杂性环境中的整体性系统运行。在遵循系统整体涌现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智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能够实现整体性创生。智能创构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信息性创构规律,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性创生的根源、关键与基本旨向。

首先,信息不守恒与大数据相关关系是教育系统创生的根源。从信息不守恒维度看,不同于物质的不生不灭与能量的守恒,信息始终处于可生可灭与不守恒状态,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可能。例如,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互信息”和“交叉验证”增强了教育主体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判断和分析。从大数据的相关关系来看,其克服了过去数据驱动方法的“死穴”——基于概率统计的模型难以覆盖全部概率事件的“黑天鹅效应”,依据其整全规模、开放结构、实时流动基础上的相关性分析,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分析。

其次,人的需要与主观设置是教育系统创生的关键。在人的需要维度,教育系统的创构不再考虑现存对象,而是考虑创构物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即“主要基于面向预想中的可能结果,创设和调控因素体系,根据新探索出来的‘为什么’,创构新的‘是什么’”^[25]。在主观设置维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教育中存在的前提性预设(规定)与任务负载的藩篱或者将其直接纳入创构活动之中,使得教育系统的数据承载更基础、智能开展更科学(如计算、模拟、实验)。

再次,未来性与整体性是教育系统创生的基本旨向。教育系统的创生不是面向过去与现在的系统还原,而是面向未来、面向可能性的整体筹划。具体来讲,教育系统在日趋整全的大数据与日益进化的智能算法赋能下,通过教育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教育结构的差异性整合以及教育信息的智能化运作等能够实现整体性涌现。

(五) “注意力对接—高阶需求激发—去中心化交流”的智能互动律

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的核心在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智能交互实现。作为教育双方

智能交互的机理揭示,智能互动律集中展现在注意力对接、高阶需要激发以及去中心化交流模式变革层面,对于教育关系的生成优化、教育系统的有机激活以及教育活动的个性化开展有着积极的效益。

一是注意力对接与教育关系的结成、稳定与优化。在教育关系的结成层面,人工智能通过丰富的内容生态、流行化的呈现形式、实时传播的速度实现了对教育对象的注意力捕捉,并因直接接触及教育对象的内在需求而使其自发自愿地与教育者甚至自身结成教育关系。在教育关系的稳定层面,人工智能通过“实时时间”与“错位时间”以及“强度时间”与“延伸时间”的互补互促^[26],不仅实现了教育信息及时出场与高质更新基础上的教育关系激活,也在此基础上再造了教育对象的注意力。在教育关系的优化层面,人工智能通过数字孪生与数字原生基础上的虚实视觉信息互动、区块链与 NFT 技术保护下的视觉信息流动以及数字通信中的视觉信息实时全景展现,能够为教育对象注意力的保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

二是高阶需要的激发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激活。一方面,人工智能使得教育对象拥有了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身份,并在虚拟的时空交互中实现了新的认同与体验,进而激发了更高阶的内在需求。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对象的虚拟身份呈现多元化,身份的多级链接可能引发多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嵌套,其高阶需求由之亦呈现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激发了教育对象内在的元价值,包括“对除自我之外的召唤的全心投入、对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的追求,以及对存在价值(the value of Being)的坚守”^[27]¹⁷¹。这些元价值既是教育对象高阶需求的外化表现,又作为目的本身契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助推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扩展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三是去中心化交流与教育活动的个性化开展。人工智能变革了传统的教育关系与教育模式,不仅赋予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对等的主体地位,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即实现了从临摹性学习、流程化学习与量化性评价向自主性学习、定制性服务与个人能力认证的转变。其中,自主性学习不仅要求教育对象提升主动学习能力、能动反馈能力以及积极创造能力,而且要求教育者提升自主引领、科学判断与智能评价的能力。定制性服务要求在去中心化的教育开展中实现“掌握学习”、私人定制与精准服务。个人能力认证要求扬弃传统的重结果和重效率的静态评价方式,在教育过程、教育系统的运行中开展动态的个人能力认证。

五、结语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不仅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思维更新与智能范畴革新,也在此基础上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并使其呈现出新的规律。其中,智能供需律深入解析了教育信息智能供给与主体内需智能对接的辩证矛盾运动,智能助推律系统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智能调节原理,沉浸育人律多维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智能调配机理,智能创构律微观描画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智能整合及其创生性效应,智能互动律客观勾勒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间智能化交互作

用的实践图景。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深层诠释不仅有助于新时代教育工作者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也有助于全面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需要指出的事,本研究虽初步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开展的基本规律,但对特殊背景、情境以及环境中的规律研究尚未触及。例如,关涉可见的视觉文化与不可见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教育张力规律、自上而下的社会要求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心理之间的教育调控规律、微观层面的自尊自信自爱心理与自卑自负自杀心理冲突之间的智能调节规律等。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开展规律研究不仅要基于智能技术、教育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拓宽问题域,更应立足思想政治教育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推进研究,如日益复杂的数字意识形态困境、虚拟社会心理谜题、网络社会舆论困局以及网民数字素养难题等。

参考文献:

- [1] 杨东杰,李奕璇. 人工智能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变革:逻辑、取向与路径[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6):50-59.
- [2] 李怀杰.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论析[J]. 思想理论教育,2020(4):81-85.
- [3] 吴满意,景星维. 精准思政:内涵生成与结构演化[J]. 学术论坛,2019(5):133-139.
- [4] 陈联俊. 算法技术的新挑战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举措[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4):126-130.
- [5] 魏华. 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J]. 理论视野,2021(12):70-75.
- [6] 武东生,郝博炜.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利用人工智能的分析[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3):103-112.
- [7] 张瑞敏. 人工智能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论析[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81-89.
- [8] 彭丽. 智能时代思政课教师话语权嬗变与重置[J]. 中国电化教育,2021(10):57-64.
- [9] 徐徐,郑秋伟. 人工智能时代思政理论课教师发展的现实与未来[J]. 江苏高教,2022(5):100-104.
- [10] 杨仁财.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5):54-59.
- [11] 宫长瑞,轩宣. 数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图景展现及其实践策略[J]. 思想教育研究,2021(11):21-26.
- [12] 隋灵芝,徐铭泽. 智能思政:内在逻辑、矛盾境遇及实施策略[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26-34.
- [13]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4] 吴军. 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15]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计算思维教学改革宣言[J]. 中国大学教学,2013(7):7-10.
- [16] 赵培. 数字记忆的困境——基于斯蒂格勒技术观对数字记忆的反思[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2(8):43-50.
- [17] E. 布鲁斯·戈尔茨坦. 认知心理学:心智、研究与生活[M]. 张明,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0.
- [18] 卢岚. 从互联网到 ChatGPT: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塑与建构逻辑[J]. 探索,2023(2):163-174.
- [19] 黄欣荣. 计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及理论建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3-72.
- [20] 陈万柏,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21] 张以哲. 沉浸感:不可错过的虚拟现实革命[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 [22] 王天恩. 描述和创构——关于数字时代哲学走向的两点思考[J]. 江西社会科学,2004(1):9-14.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5] 王天恩. 大数据和创构认识论[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05-114.
- [26] 赵建超. 视觉机器:知觉自动化时代的新型义肢[N]. 社会科学报,2022-01-06.

[27] 焦娟,易欢欢,毛永丰.元宇宙投资[M].北京:中译出版社,2022.

The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O Jianchao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Advent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ot only realized the intellig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made it gradually show new ru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In the aspect of the generation of educational laws, based 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the basis for intelligent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thinking, cognition, evaluation and practice. Among them, the thinking basis is reflected in the innovation of big data think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immersive thinking; the cognitive basis is reflected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ttention enhancement, computing model-based perception automation, information enhancement based on digital memory and discourse visualization based on digital image. Evaluation basis is reflected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 systematic evaluation methods, the precision of evalu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dynamic evaluation results. Practice foundation is embodied in the data, real-time, visu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t the support level of the law of education,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ateg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activated its supporting role in the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mong them, information computing realizes the computational turn of thinking, virtual display brings the external digital innovation, digital immersion activates the immersive function of the situation, information creation enriches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on, and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stimulates the intelligent form change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law of education level,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for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supply and common needs of contradiction law, “for business, for time, the potential and new” intelligent booster law, “three-entire education” immersion education law, stimulate education system integrity and intelligent structure law, “attention docking-higher demand excitation-decentralized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law, etc.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presentation

责任编辑:陈卓

《探索》2024年主要栏目重点选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新概念新判断新理念新思想研究
4. “两个结合”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研究
5.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研究
6.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政治学研究

1.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2. 国家安全治理研究
3.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5. 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变革研究
6. 乡村全面振兴与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7. 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

政党治理

1. 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2.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3.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
4.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研究
5.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6. 大党独有难题研究
7.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公共治理

1. 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2. 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3. 数智时代公共治理创新研究
4. 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5.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
6. 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政策研究
7. 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研究
8.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研究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1.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2. 文化强国与文化软实力研究
3.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4. 数字技术、数字文明与文化治理研究
5. 政治传播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6. 网络治理与网络强国建设研究
7. 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

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1985年创刊

第1期（总第235期） 2024年1月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邮编地址：400041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60号

电 话：（023）68593010

网 址：<http://www.tszszs.net> 或 <http://suta.cbpt.cnki.net>

总 编 辑：金华宝

副总编辑：王 慧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单位：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011153

PROBE

Philosophy and Soeial Sciences Edition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5)

No.1 (Sum No.235) January, 2024

Competent Authorities / Sponsor: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Edited and Published: Journal Press of Probe

Postcode and Address: No.160, Yuzhou Road, Jiulongpo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400041

Tel: (023)68593010

URL: <http://www.tszszs.net> or <http://suta.cbpt.cnki.net>

Editor-in-Chief: JIN Huabao

Vice Editor-in-Chief: WANG Hui

Distribution Range: Public offering at home and abroad

Printed: Chongqing Guofeng Printing CO.,LT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ongqing Postal Service Corporation

Distribution Abroad: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Advertising Business License: 渝工商广字 011153

ISSN 1007-5194
CN 50-1019/D

国内发行代号：78-84
国外发行代号：BM4024

定价：每册15.00元 半年价：45.00元 全年价：90.00元

ISSN 1007-5194



9 771007 519246